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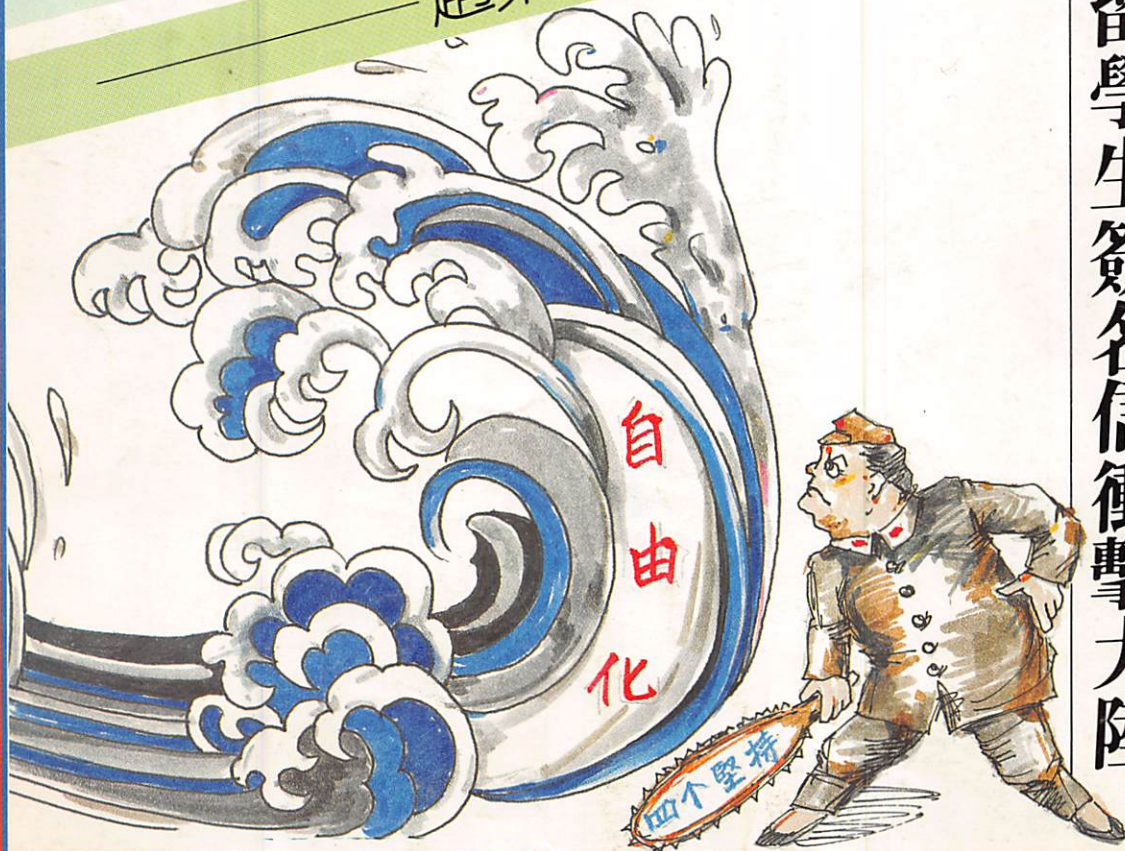
6月號 總48期

No. 48 JUN. 1987

內情報告
反自由化運動的前奏：

鄧小平六中全會批中春

趙紫陽政治改革揭祕



專論

蛇口：成功的試管改革

報導

留學生簽名信衝擊大陸

中國之春編輯部就組織中國新型民主政黨

舉辦徵文活動並徵集新政黨黨綱黨章草案

中國之春自發起時起，就充分意識到中國大陸成立反對黨的必要性。此後為了推動工作的需要，我們成立了推展民運的壓力團體——中國民聯。

當前，根據中國政治局勢的發展，很多人士認為現在是討論成立中國大陸新政黨的時候了，像民聯這樣的團體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新政黨應該喚起大陸、台灣、香港、海外每一位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中國人更多的使命感和參與感，讓大家都來關心國家大事，為在中國建立民主政體，為中華民族的起飛而奮鬥。

中國目前的形勢令人憂慮，海峽兩岸和香港充滿了危機。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十年，也是歷史再一次賦予中國人民以振興起飛機會的十年。不少人士認為，不管中共改革是否成功，成立新政黨都是情勢所需，歷史必然。如果中共政治改革成功了，中共應該發生質的蛻變，新政黨將作為一個合法反對黨而登上政治舞台，成為反映民意、制衡執政黨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中共改革徹底失敗了，統治者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勢必激化，那時新政黨將同全國人民一道，為收拾中國大陸的政治殘局而努力。

一個政黨的成立，一般而言，應具備如下條件：

- (一) 有一批決心奮鬥到底的骨幹份子；
- (二) 有一個適應國情的黨綱和黨章；
- (三) 有一個支持政黨活動的財力。

有志組建中國新政黨的人士，應在這三方面下一番功夫。

為推助中國新政黨的成立，本刊編輯部現舉辦徵文活動。徵文活動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 一、有關新政黨成立的時機、組織形態、理論基礎、運作方式的探討。本刊將出專輯選登優秀稿件，稿酬從優；

二、徵集新型民主政黨的黨綱黨章草案（參考各國民主政黨之黨章并結合中國國情）。凡提供行文嚴肅、字數超過一萬字的黨綱黨章草案者，本刊將贈全套中國之春雜誌（個別缺期除外），并將列為本刊永久性榮譽訂戶。

破除無力感

一天，昆明醫學院的一位職工接到一篇中國之春上的短文，這是海外留學生寄給他的。很快，這篇短文就在校園不逕而走，大家爭睹為快。最後，院黨委不得不出面查禁。

人們爭相傳閱，驚動了公安當局，大批人員調查了半天，一無所獲。這，只是海外留學生和華僑所做的大量工作中的兩件小事。我們在這裡一提，是想對破除某些人的無力感有所啟示。

當前，國內政局進入了撲朔迷離的霧期，中共高層保守派與改革派達成妥協，形勢不死不活。面對這種局勢，很多人產生無力感。產生無力感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把中國政局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兩派的鬭爭上。似乎是，改革派占了上風，中國就有了希望；守舊派占了上風，中國就沒了希望。兩派僵持，自己則束手無策。

原因之二，是某些人覺得專制力量過於強大，自己無能為力；另一方面，又覺得新興政治力量尚處萌芽階段，不足依靠。在這種無力感的支配下，一些人對中國的政局只是被動地靜觀其變。這種無力感是應該破除的，也是可以破除的。

要破除無力感，首先是要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自身人性的覺醒上，寄托在自己的主動努力上。決定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並不是中共內部兩派之爭，而是人性尊嚴與反人性的專制制度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個矛盾決定了，在當前，以人性解放為標誌的自由化浪潮是中國政局發展的主流，誰也擋不住這個潮流。打掉專制圍牆的一塊磚瓦，就給自身的人性解放增添了一分機會，自由化的浪潮中就增添了一個浪花。專制大廈已經腐朽，但是，再腐朽，也難以自行塌毀，而只能在自由化浪潮的衝擊下傾覆。俗語說，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了駱駝。你的參與，說不定就是壓垮駱駝的那根必要的稻草。

其次，要認識到，新興政治力量雖然處於萌芽階段，但在一天天成長起來。這次國內政局的回潮，使中國民聯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我們承認力量尚小，但正因為如此，你的參與，才能顯示出份量。

自己孤單時，最容易產生無力感。當你滲入洪流，就會發現合力的作用。

不要小看我們自己的力量，運用得當，四兩可以撥動千鈞！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每個讀者每月向國內大學寄上五份「中國之春簡訊」（根據我們的統計，絕大部分可以收到），全國的大專院校，就會受到地毯式的民主轟炸。

做一兩件實事吧，它是祛除無力感的最好辦法，你不妨一試。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議論：「國內沒什麼希望了，可是，我能做些什麼呢？即使參與了，又能有什麼用呢？」

幾年來的民運經驗告訴我們：不是沒有事情可做，而是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而且，只要用心去做，就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這裡列出幾項工作，看諸位能做什麼：

- 一、往國內郵寄「中國之春簡訊」（本刊提供「簡訊」和郵寄名單），并把此做為經常工作；
 - 二、親自或託人（尤其是託外國人）往國內攜帶「中國之春簡訊」及其它印刷品；
 - 三、在你所在的地區和學校舉辦內部座談會和情況交流會，也可以邀請中國民聯的代表或其他學者前往演講、交流；
 - 四、給剛出國的留學生、各種出國代表團送「中國之春」雜誌和其它印刷品；
 - 五、為海內外報刊撰寫提倡民主之稿件，盡可能占領多一點的輿論陣地；
 - 六、向外國朋友推薦「中國之春」英文版，爭取國際輿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
 - 七、遊說中外人士、尤其是大財團捐助中國民運；
 - 八、組建留學生的各種專業學術團體或跨學科的學術組織。在各地組建大陸新移民的聯誼團體，做為民運組織的外圍；
 - 九、給民聯總部收集各種資料和信息；包括使領館在留學生中的活動；
 - 十、組織各種簽名信活動，包括呼籲營救楊巍和反對迫害國內遊行的大學生的簽名信；
 - 十一、組織留學生、國內大學生、工人、農民和幹部的民意調查活動；
 - 十二、在你所在地區和學校組建民運小組；
 - 十三、回國組建民運據點；
 - 十四、設計未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民主政體結構，等等。
- 只要我們有滴水穿石的精神，不尚空談，而是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就會產生效果。如千名留學生簽名信活動、營救楊巍的活動，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和政治學會的活動，都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 中國的希望在哪裡？就在自己身上！
- 想想看，上面所列出的活動，你能做哪些？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總四十八期

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總四十八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社論●

3 ■ 破除無力感！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讀者●作者●編者

6 ■ 破壞團結·想吃羊肉不沾腥等 (中國大陸留學生) 方秋禮等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

11 ■ 民主縱橫談之一：民主的「硬件」與「軟件」 (中國民聯) 王炳章

●兩岸風雲●

12 ■ 訪蘇受挫，李鵬前途透陰影·徐四民仗義執言大開政協·蘇聯擬談消除「三大障礙」·李洪林再度遭革職·阮崇武被摘烏紗帽，李鐵映掌管體改委·澳門將於九七年交還中國·立法委員吳德美的卓見·查禁出版物更上一層樓·台灣外匯存底破五百億大關·胡啓立大揭胡耀邦(三十二頁) (中國大陸留學生) 彌文君等

本期專題 留學生對中國政局的影響

19 ■ 留學生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日漸增大 (本刊評論員) 李蒙杰

20 ■ 反自由化運動的前奏——鄧小平六中全會批中春 (中國大陸留學生) 馬臻燕

24 ■ 刺向國內倒退勢力的利劍——中國大陸留學生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散記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 馳遠

28 ■ 化作秋風掃落葉——記留學生簽名信對國內政局的沖擊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帆

32 ■ 民聯活動已經奏效——評福州市公安局絕密文件 (本刊評論員)

32 ■ 附：福州市公安局絕密文件

33 ■ 為大變局到來做好準備

——中國大陸留美學生座談會紀要 (本刊編輯部整理)

●專論●

40 ■ 蛇口：成功的「試管改革」 (國內) 張綱

47 ■ 中國經濟改革與民主展望 (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 張俠

52 ■ 談如何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澳洲) 李樸實

編者的話

留學生千人簽名信運動已過三個多月。這個大事件對中國政局到底有何影響？讀者們一定異常關心。本刊對此有初步報導。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在神州大陸開展，知識份子再次成了整肅對象。本刊的內情報告揭示：這一倒行逆施的反自由化運動，早在去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就已演出前奏。在那次會議上，就反自由化問題，曾有一場激烈的內爭。最後，鄧小平拍板定案，還批了中國之春：

張綱的第三篇專文，詳細披露了蛇口的成功改革經驗，對中國的改革頗有借鑑意義。

部分留美文科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的座談會，不但大量揭露了大陸內情——包括趙紫陽政治改革的內情，而且對民運方向提出了忠告和建言，可讀性很高。

下期預告

本刊自下期起，將對中國組織另一個新型政黨的問題，展開專題討論。討論分數期進行。組織新型政黨，是關係到中國未來走向的大事，本刊希望大家踴躍參加討論，為這個新政黨催生。

下期將刊載國內魏桑莉關於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專題詳述、政論家鄒泰關於分析台灣民主進程的專題文章以及著名年青學者孫隆基關於剖析中國人性格的論著。每篇都極具理論水平。

當然，還有很多及時而活潑的時事報導與評論。

特稿

- 55 步步設防 (國內) 王若望
- 56 釋「落後份子」 (國內) 王若望
- 78 方勵之最後一次公開演講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向海峽兩岸建言

- 59 如何貫徹「在國外也要遵守中國法律」的建議 (中國大陸留學生) 項守法

- 61 寫在教師增加工資之後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 示真
- 58 學生運動感言——重提「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國大陸新移民) 曲元

- 64 從「思想大訟案」到控告人民日報 (中國大陸留學生) 羅井

報導

- 60 「郭城加油」俱樂部成立 (本刊記者) 雪映
- 51 張俠文章後記 (中國之春編輯) 林樵清

人權論壇

- 65 中共勞動教養規定嚴重踐踏人權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綠綺
- 71 中共的勞動教養政策 (國內) 先梅

台灣專欄

- 75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可能導引 (台灣研究生·美國) 楊農
- 77 勿讓時間蹉跎——打開死結重返國際社會 (台灣留學生·美國) 王新奉
- 79 對台灣「四·一九」事件的雜感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鄒國仁
- 82 請化被動為主動
——談台灣民眾團體及學生請願事件 (台灣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文藝園地

- 18 詩二首 (國內) 林泉
- 23 政治笑話二則 (美國) 泰恒
- 63 留美雜拾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瀝青
- 74 五個太陽開天空 (遊記) (中國大陸新移民) 春曉
- 76 詩二首 (國內) 海林
- 84 看軍艦 (散文) (美國) 鍾開之
- 86 憶阿翠 (小說) (中國大陸留學生) 楊漫克
- 89 孤獨者——山區記實之二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雪城
- 98 再死一次 (政治笑話) 哈公



月旦人物，並非易事

拜讀貴刊總四十七期七十一頁漁夫先生所寫的「台灣政局使我不耐煩」一文，覺得整篇文章主觀太強，對客觀的事實並未能充分了解而遽下斷語，只會給人太急躁的印象，從而影響到此文的說服力。

文中所舉的宋楚瑜先生的例子，說宋氏表面看似冷靜溫和，骨子裡蠻有急躁之氣，又說他喜歡搞形象，是「國民黨的電影明星」等等。其實，這與事實並不相符。

宋楚瑜是有名的開明派，為人文質彬彬而又眼光遠大。蔣經國這一兩年着手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其中幫助他最大者，當為宋氏。蔣經國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免不了受到黨內保守的壓力。而抒解這些壓力的中間人物，首推宋楚瑜。其手法和涵養已有目共睹。今天他能當上國民黨副秘書長，實在是「實至名歸」。假以時日，當能接上秘書長的位子。

由宋氏此例，可知漁夫先生對其他諸人的評價也是有所偏差。在此奉勸漁夫先生：月旦人物，當非易事；非有數十年人生經驗及對人

物的透徹了解，是難克奏全功的！

台灣留學生 王克強於紐約

太輕浮

看了貴刊總四十五期二十頁宋凡先生的「蔣緯國將軍的話」一文，覺得宋先生並不了解蔣緯國將軍這個人。

蔣緯國將軍是眾所周知國民黨內的開明派。他也是著名的戰略家，他的戰略思想深受專家們的好評。他同時也對易經有著深刻的研究，故此，他所評析的太極圖解說，也有其一定的學理基礎。

宋凡先生自稱對太極圖並無研究，是以既無研究，又何來對蔣緯國將軍的太極圖說驟下批評？這樣豈不是太輕浮了些？

台灣新移民 張承德於加州

破壞團結

看完了中春四六期許、林兩位的文章，我是完全站在許偉雲教授這邊。對共產黨一定要堅強，就是用暴力手段也是應該的。因此我不但贊成要徹底改變中共的性質，而且還贊成推翻它；不但贊成推翻它，更要把它剷除殆盡，讓其永世不得翻身。

中共不是鐵板一塊，就是鐵板一塊又怎麼樣？只要民主國家和中共內部的反共人民能團結起來，這塊鐵板再強，也可把它融化！問題是民主國家和中共內部反共人民不易團結罷了。再加上海外有像貴刊一樣專門破壞反共團結的刊物，要團結反共真是談何容易！難怪共產黨幾十年不垮！

美國華僑 張鐵勝 於加州

也非鐵板一塊

看完了中春四六期許偉雲教授的「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令人肅然起敬。我立刻影印了五十份，到處分發給我認得的來自大陸的學人和海員。我相信它的影響力假以時日是無遠弗屆的！

至於林樵清先生那篇致許偉雲教授的文章，對不起，我一份也沒有影印。我自己雖是中共成員，但我並不支持林樵清先生。我只想告訴許偉雲教授，中國之春也不是鐵板一塊。

華僑 王士生 於夏威夷

畫蛇添足乎？

中國之春雜誌經理林樵清先生：

讀了貴刊四十六期登載的許偉雲教授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以及您的文章「不同的看法，相同的方向」，我有一些看法，提出來與您商討。首先，我覺得貴刊在發表許教授文章的時候，專門發表一篇代表貴刊編輯部的不同意見的文章，似乎是畫蛇添足之舉，至少是不必要的。中春雜誌每期發表幾十篇文章，其中多數都不能說是代表中春編輯部的觀點，而且其中不少文章的一些觀點也與貴編輯部有所不同。貴刊對這些具有不同觀點的文章，一般都沒有以編輯部名義發表文章來澄清貴部的觀點，有什麼理由要對許教授的「公開信」作「特殊對待」呢？如果貴刊認為許教授的觀點與「中春」的基本政治立場出入太大，不發表就行了？何必既發表了又來一篇「澄清立場」的聲明？

其次，從您的文章來看，貴刊與許教授並

無嚴重的立場分歧，只是在一些提法上有不同意見。這是完全正常的。但從大作對這些不同提法的闡述來看，似乎也有些小題大作。通觀許教授「公開信」全文，其中並沒有「鼓吹暴力革命」的字句。至於「應當在黨內發動革命，徹底地改變中共的性質」，以及「推翻這個專政的集團」等語，我認為應聯繫許教授文章的全文內容來理解，不應單獨抽出「革命」、「推翻」等字眼作孤立的解釋。許教授也沒有把中共當作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否則何必給中共黨員大眾寫公開信？「革命」並不一定是「暴力革命」，「推翻」也不一定指「武裝推翻」。退一萬步說，即使許先生有號召「暴力革命」、「武裝推翻」之意，作為一種觀點，「中春」也未嘗不可發表，以便引起討論。

我希望貴刊發表一些不同觀點的文章。只要其基本立場是希望中國繁榮富強，希望中國人民過好日子，甚至贊同「四個堅持」的文章也可發表。要是每篇文章都與「中春」編輯部的觀點一模一樣，這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對於中春雜誌本身的可讀性，顯然是有害無益的。

對於大作的觀點，我是贊同的，只是覺得沒有必要把許教授文章作為對立面。大作中關於「暴力革命」的分析，似乎沒有抓住本質。「暴力革命」並不一定達不到民主或解放的目標，美國的獨立戰爭就是一例。我不主張不看具體歷史、社會條件，鼓吹「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革命手段。一般來說，「暴力革命」在革命過程中，給廣大人民帶來的苦難比「和平革命」要大，這才是我傾向於後者的根本原因。但革命的方式與目標並無必然的關係。

我很欣賞王炳章先生的一個觀點，「革命不是作出來的」。任何一場革命，其方式是「

暴力」還是「和平」，取決於統治者和人民雙方的態度。如果雙方都想採用暴力手段，則必然爆發「暴力革命」。鑒於中國一百多年來無數次革命和反革命的暴力行動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考慮到中國目前所處的複雜國際環境，我衷心希望中國的社會進步採用和平方式而非暴力手段達到。

上述意見，未必正確，僅供貴刊編輯部參考，並希望指正賜教。

中國大陸留學生 容敏於德拉瓦市

做出必要的澄清， 重申「中春」的主張

容敏先生大鑒：

謝謝您的來信。現受林樵清先生委託，由我代為回答您的來信。

首先要指出，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哪一個刊物、一份報紙不帶任何傾向性的。因為任何出版物都有其辦刊（辦報）的宗旨、方針、目的。儘管它有時可能發表一些帶有不同觀點的文章，但總的來說，都離不開它的既定宗旨和目的。就「中春」這個刊物而言，它的主要讀者對象是海外的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它的辦刊宗旨雖然總的來說是宣傳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但就目前來說，它最迫切的任務是「支持大陸的改革，反對倒退」，團結中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爭取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向中共一小撮頑固保守勢力做鬥爭。只有堅持這個方向，我們才能爭取到黨內外最大多數人的支持，逐步達到我們的長遠目標；也只有堅持這個方向，我們才能團結廣大海外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現在我們不宜於，不能夠，也不應該提出「打倒中共」、「

推翻中共」、「剷除中共的暴政」以及諸如此類較為激烈的口號。因為一方面中共不是鐵板一塊，中共也在變，中共黨內也還有改革派；另一方面這麼做的結果也不利於團結廣大留學生。我想，這一點，只要稍加思索，都會理解的。

但如果有人因此而得出結論說「中春」把希望都寄託在改革派身上，那就錯了！如果人們每期都仔細地讀中春的文章，就會發現「中春」並沒有把根本的希望寄託在改革派身上。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是不智的。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看法和做法。除了支持改革派外，我們一直在發展獨立力量，為中國民主的前途做出不同的準備。我們一直喊出的口號是「支持改革，批評改革，超越改革」。

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視許教授的文章，是因為許教授是一位知名的學者，自他的訪問錄「分權富中國」在中春二十六期刊出後，在中國大陸留學生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我們深知其影響力，故我們特別重視他的文章。

縱觀許教授那篇文情並茂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許教授是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贊成徹底改變中共的性質。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刊登這篇文章呢？因為在這篇文章中許教授更多的是批評了中共專制主義的那一面，而這一點正是中共保守派在最近的倒行逆施中所充分表現出來的。所以說，就批評中共保守派的專制本質這方面，我們和許教授是同路的。所以我們決定刊登許教授的文章。但考慮到許教授的一些提法我們不敢苟同，在勸說不果的情況下，只有採取編輯部出人寫篇說明附後的辦法。我們認為這一作法是非常必要的。雖然「中春」所發表的文章並不代表編輯部的觀點，但像許教授這樣非常公開地提出的「推翻中

共」的說法出現在「中春」雜誌上，我們認為是不妥的。如果任由在雜誌上刊出，會在留學生中造成不良影響。我想這一點，讀者也是會理解的。

您在來信中說，如果認為觀點與中春出入太大，不發表不就了嗎？的確，我們曾考慮過不發表。就在林先生打電話給許教授要求改動而遭到拒絕後，我們的確曾打算把文章寄回。但商量的結果，考慮到現在國內正是保守派猖狂的時候，同時像許教授這樣站起來大聲批評中共專制性質的非黨派人士還不多，所以我們認為還是發表的好。

我們認為，目前的處理方法是一種折衷的方法。這種作法不是畫蛇添足，而是一種必要的澄清。這樣，一方面發表了許教授提出的我們認為可取的一面，也一方面發表了一些我們不贊同的觀點以供大家討論，同時也借機再次重申了「中春」的觀點。

還有，林先生那篇文章並沒有把許教授的文章作為對立面。縱觀全文，只見理性探討之跡，毫無兩軍對立之意。何況林文的題目標明是「不同的看法，相同的方向」，既然方向相同，又何來對立面？

我是一個有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我相信這也是林先生讓我來回答您這封信的原因。因為許教授這封信是寫給我們黨員的，所以我較知道黨員們會如何看待這封信，也知道如何改動才能達到它的最大的作用。不單是我這樣想，「中春」內其他具有黨員身份的成員也大多如此想。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確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大家來探討的原因！

中國之春編輯 李磊

好遙遠

拜讀貴刊四十六期許偉雲教授「給中共黨員大眾的公開信」一文，真會令人覺得是出自肺腑，頗具說服力，接著林樵清先生的文章，更具說服力，更吸引人，更有民主魅力。但看完之後，我個人內心突然覺得中國之春離我們（講究實際的）好遠，好遠，好像遠處中的一座理想樓閣。每次看到中國之春被攻擊、被造謠，就覺得中國之春離我們好近，好近。一直為你們的勇氣，也因你們有常人最難擁有的容忍心深感佩服與敬仰。

我是學工的，一切講求實際，只要是好的，就是我所要的，正如一位大陸留學生向我說，這就是我所要的——台灣留學生出來能結匯一大筆錢，寒暑假回國省親、度假，來去自如。——這是最實際的，最接近人民所需的，相信也是中國之春所推動的民主運動目標之一。然而此次大陸民運的夭折，令我感覺到中國之春的理想好遙遠，好遙遠。大陸民運只是要求開放一點自由、民主，並不像台灣街頭高喊打倒國民黨，爛罵總統（最後仍能出國活動），如此基本要求都被捕，更不要想推翻共產黨。的確，推翻或革命一定會付出相當高的代價，而且不見得就會走向民主道路，中國之春能循此原則為中國民主前途努力，相信一定為全中國人民所支持與贊成，甚至中共當局有一天也會容許中春的存在。就如台灣當局也歡迎以和平手段爭取民主、自由；而以暴力革命手段的台獨已走入死胡同。今天的中國之春能日益茁壯，個人相信此為最大原因。

台灣留學生 周大展

不遙遠

大展先生大鑒：

不遙遠，只要大家齊心合力去往同一方向努力，成功遲早會到來的。理想的樓閣如果大家一齊去建造，遲早會造成的。

遙遠，只有當大家都覺得它是遙遠的時候，它才真的遙遠。

起碼，今天，中國之春並不覺得它遙遠！

中春經理 林樵清謹上

爾虞我詐，何能談判？

讀罷中春四十六期方秋禮君之「俞國華先生的老生常談」一文，感覺是「畢竟是喝中共奶水長大的，完全是一副替中國共產黨作說客的調調。」

目前台海兩岸體制迥異，縱勉強接觸談判，實令人懷疑會有任何結果產生。何況談判要有成果必須建立在互信的基礎上。至於「三通」問題，兩岸的間接貿易、台灣人民輾轉進入大陸探親、轉信，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中共當局敢放人到自由地區來和他們的親人會晤嗎？

台北對大陸的政治反攻，或許消極，但如果說台北與中共接觸談判，可有助於大陸政治民主化，想法未免天真。在一個被封鎖的社會，僅允許有中共獨唱的調子存在。從這次大陸學生要求民主、自由與人權的運動，已可得到答案。

因此，與其談判接觸而達成統一，讓中共更肆無忌憚地專制統治，還不如不接觸談判，留下台灣一個永遠的希望。

程 思於麻州

國共談判 應取決於雙方的表現

讀過中春總四十六期方秋禮先生的「俞國華先生的老生常談」的評論後，深感方先生未從台灣人民的角度來看國共談判這一個問題。國民黨政府是否會和中共進行面對面談判，除了國民黨本身意願外，還要看台灣人民是否支持。而台灣人民支持談判的程度，又取決於對國民黨的信賴和中共在大陸上的作為。

台灣民主固有進步，但離全民政治尚遠，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未必有信心。同樣的，祇要中共內部還為鳥籠的大小而鬥個你死我活，又怎樣去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妥協呢？中共要取信於台灣人民，必須先在大陸做出實際行動。

我認為國民黨當務之急不是與中共談判，而應向全民政治努力。若現在進行談判，未能助長大陸民運，反倒動搖了台灣民心。到時候，中國民主的前途肯定更加黯淡，更加渺茫。

讀者 呂正瑜於加州

敬答程、呂二君

尊敬的程思、呂正瑜先生：

你們自麻省、加州的來信已拜閱。感謝你們的指教並敬答如下：

筆者確是喝中共奶水長大的，但這不應成為探討問題的障礙。

俞國華先生的老生常談充分體現了台灣當局故步自封、不思進取的心態。面對中共一波接一波的凌厲攻勢，死抱着「三不」政策而欲自保，難矣哉！須知，中共高層內無論開明派

或保守派，在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一點上並無分歧。如果有一天，中共以其堪稱世界第三的軍事力量強行「溝通」海峽兩岸，台灣的結局將是極其可悲的。如果此種情況發生，多年來奉行「牙刷主義」的國民黨人所受的損失較小，而台灣人民承受的犧牲最大。

政治自有其冷酷無情的法則，政治鬥爭是以實力為後盾的。台灣搞得再好，也只是中國的一省而已。倘若「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諸葛亮「出師表」），那是極不現實的。中共有能力吞下台灣，而台灣無力反攻大陸。這是不以口舌之爭為轉移的事實。說句笑話，既便中共拱手讓出大陸，歡迎二千萬台灣人士統統（童叟婦孺包括在內）來大陸為官為宦，只怕人派光了，官職還剩下許多呢（在大陸，從幼兒園到火葬場都有共產黨人在那裏當官）！

中共是強大的，能夠降伏它的，只有大陸人民！大陸學潮導致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下台，而台灣當局哪怕想搞跨一個中共基層黨支部書記都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中共的專制制度之所以尚能為大陸人民所忍受，是與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政績更為惡劣分不開的。時至今日，大陸老一輩人提及國民黨和中央軍仍然心有餘恨，而「國民黨作風」一詞，在老百姓口碑中仍然意味着「打人、罵人、調戲婦女、抓壯丁、搶東西……」，這並非中共的「洗腦」所致，而是老百姓從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昨日的國民黨腐敗統治乃是今天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前因。

依筆者的愚見，台灣當局唯有以毒攻毒，以變應變才能自保。「三通」將使大陸人民有機會接觸一個與當年迥異的國民黨，進而迫使中共向開明方向進行改革，放棄武力攻台。這

是中國大陸所能發生的最好情況。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仍將是中國大陸的統治力量。所謂「打倒共黨」、「鏟除暴政」等等只是說說而已的空話。

「三通」也罷，談判也罷，只不過是一種政治鬥爭的手段。毛澤東曾說過：「針鋒相對，要看情況。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偏安一隅以不變應萬變的國民黨人，真該虛心叩拜老毛為師才是！

順致

敬禮

（大陸留學生）方秋禮 敬上

想吃羊肉不沾腥

中國之春總四十六期張綱先生的長文「改革死了，改革萬歲」對我個人有重大的啟發與震撼。張文提供了豐富的訊息，診斷了改革暴斃的病因。做為一個台灣來的留學生，從沒有認真去思考改革派的具體策略及方法。張文拓展了我的視野及關懷，使我看到宦海浮沈及個人坎坷際遇後面那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的底流，以及改革的悲劇。我有幾個感觸想與貴刊讀者分享。

1. 我看到「改革」做為一個「情緒性的願望」的貧血及危險，從熱情的支持改革聲中，智識份子要常回到冷靜的思考和學術的紮實上來。支持改革派的同时，也要批評他們。這是支持改革不可缺少的「第二種忠誠」，沒有針砭，改革往往是走上冒進，沒有批評，支持只是盲從。改革的風險在於失敗之後給保守派可乘之機，造成全面倒退，比不改革還糟。

2. 學生運動反映了改革的失敗，而非導致失敗

。城市經濟改革缺乏理論架構，沒有模型分析，發動之際已種下敗因。一九八五夏天種種改革症候羣的病相已露，九一八、一二九及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基本上是對經改失敗、期望落空的反映。敏銳的大學生只是扮演了社會的溫度計。大學生及民運份子不必有「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罪惡感，中了保守派嫁禍栽贓，一石二鳥之計。

3.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約是暢想曲了。套句台灣高希均教授的名言：「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想拿資本主義的好處，又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一種天眞算盤，天下好處讓鄧記共產黨一口吃盡。鄧、胡、趙體制中的這種「想吃羊肉不沾腥」的機會主義，「一國兩制我當家」的一廂情願是改革派錯失了改革的「黃金時機」的主要原因。中國民聯暢談「改革」，避諱「革命」。用意可佳，用心可取，小心不要墜入一樣的如意算盤。

4. 中國大陸沈疴之疾，在我想像之外，什麼良法美意，改革宏圖一執行就停頓、變形。三信危機後的真空裏有「向前看」和「改革」的希望來填補，現在呢？因改革派勾起的理想又再被現實的冰雪掩埋，剩下的大約是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哀莫大於心死」，以後的道路更艱難了。

5. 保守派會將改革派的失敗歸因於經濟政策的失敗，而避體制問題不談，是這樣嗎？為什麼台灣及南韓的加工出口區能成功，而大陸一敗塗地呢？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為什麼總要出錯呢？在西方國家追究起政治責任來，不是二個人下台就能了事的。老百姓會用選票表示：換家做莊吧！

台灣留學生徐石 於新英格蘭

我們想知道

貴刊總四十四期「中國民主盟約啓示」一文，對「民盟」的歷史有詳盡的敘述，至為佩服；但其對中共加予「民盟」的殘酷批鬥，却嫌蜻蜓點水。本人僅簡略提出下列二點，求教於該文作者：

一、所謂「章、羅聯盟」的章伯鈞、羅隆基，外加儲安平多人，都是在「反右」鬥爭中被秘密鬥死的。其過程究竟如何？未見隻字提及；中共也迄未透露一絲消息。這是我們極為關切的。

二、鄧小平復出後，曾對當年「反右」定下基本調子：「反右」只是「擴大化」了，仍然是「及時的」和「必要的」鬥爭。這是殺人有理論。鄧小平的理由是：「右派」充滿了「殺氣騰騰」。這就注定了「民盟」一類「民主黨派」只能充當尾巴黨和應聲蟲到底。其實，所謂「右派」，都是一羣手無寸鐵的白面書生，他們反對共產黨的「黨天下」（儲安平語），僅是動嘴不動手。「殺氣騰騰」是鄧小平硬加上去的。這是為什麼？我們也極想知道。

大陸訪問學者鄭安毅於紐約

鄧公好龍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故事叫「葉公好龍」。講的是有個人叫葉公，非常喜歡龍，屋中到處畫的是龍，甚至在柱子上都雕有龍。有一天真龍得知此事，想看看這個愛龍愛得如痴如醉的人，便來到他窗前窺視，哪知葉公見了真龍嚇得魂不附體。其實這樣的人不但中國古代有，今天也有。鄧小平就是其中一個。

在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裏，鄧小平一再表示決心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曾不止一次提到

不但這代人要進行改革，下代人還要繼續改，並鼓勵知識分子進行探討，提倡百家爭鳴。可是當知識分子真的探討起新的思想的時候，當學生們不滿舊的政治體制，要求加快改革步伐的時候，鄧公却一反常態，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連領導改革的趙紫陽也不得不強烈批評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相繼開除黨籍，進行整肅，政治權力大換班。這與其說是改革，不如說是倒退。

最後奉勸鄧公，也包括其它中共的領導人一句話，請你們不要再「葉公好龍」了。若你們真願改，就不要懼怕封建和保守的勢力，更不必怕「資產階級自由化」。

民運的孫子兵法——經濟贖買

王炳章在什麼樣的改革才能成功（中春總四十六期第九頁）一文中，探討分析中國的政情，槍槍中靶（bull eye），令人喝采。他歸納出改革要對共產黨官僚們「給壓力」和「給出路」這兩條金科玉律，特別是後者，可以稱為民運的孫子兵法。

觀察西方文明，英國人不但在工業改革、科技研究上手腕高明，他們以「贖買」手段來收買英國皇室，顯示出英國人的政治手腕同樣高明。同樣為了反對專制，達到民主的目的，英法相比，英國人少了許多「人頭落地」。

所以，我主張重視王炳章在中春裡反復強調的「經濟贖買」，以避免流血鬥爭。改革派和保守派互相接受，保守派被「贖買」成改革派，社會進步的力量就會愈來愈大。鬭爭的雙方以人道、人性、人權來互相公平對待，專制這個見不得和平的魔鬼才會被逐出中華大地。

（大陸留學生） 加拿大 阿昆

民主縱橫談之一

民主的「軟件」與「硬件」

●王炳章

編者的話

本刊自本期起開闢「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縱橫談專欄。該欄徵稿要求有：

- 一、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進行系統的理論闡述，也可以只談一得之見；
- 二、以自己的親身體會闡述民主之涵義；
- 三、字數由數百字至數千字不限。

民主的爭論

民主已經成爲當代中國最時髦的字眼。甚至連共產黨也不得不口口聲聲地說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民主的版本繁多，使人產生一個疑惑：到底什麼是民主？怎樣才能達成民主？這個問題不僅在普通民衆中，就是在從事民主運動的人當中，也有許多爭論。

比如，有人說，民主是一種理念，是一種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強調，民主是一種制度，是一種權力分散而制衡的體系。這是爭論之一。爭論之二：部分人士認爲，現在搞民主，最重要的是進行啓蒙工作，即傳播民主的觀念。然而，另一部分人爭辯道，要爭取民主，必須組織團體，集合力量，才得以制衡共產黨。我們認爲，上述兩種論點其實並不矛盾，其爭論猶如電腦的軟件與硬件之爭。

我們知道，電腦解決問題，需要軟件和硬件的相互配合。民主好比解決人類各種紛爭的

一部社會電腦。只有在其軟件和硬件互相搭配時，民主電腦才能行使功能。

民主的「軟件」——理念

民主理念主要有三個要素：

- (一) 主權在民。即政府權力來自人民，統治者只有在被統治者授權而表示同意被統治之後，才能行使統治的權力；
- (二) 政治上人人平等與自由。在該理念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有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 (三) 多數人裁決，少數人權利。即多數人的意願得以行使，而少數人的權利受到保護，哪怕這個「少數」僅有一人。

民主的「硬件」——制度

民主的硬件結構大體上有：

- (一) 政府最高權力的分散和限定。其中，以司法權的獨立最爲重要。只有司法權獨立出來，才能在「民主理念是否已經實施」的爭論發生時（無疑這是涉及最多的爭論），做出相對公正的裁決。只是司法權分開，叫兩權分立。司法、立法、行政都分開是三權分立。如果是司法權分開，立法權和行政權部分重疊，叫兩權半分立。無論是那一種分法，最高權力一定要分開，而且，最少要分做兩權。在這裡有個規律：權力分散得愈多，在決策過程中出現錯誤的機率就愈小，但做出決策的速率却相對減慢。權力愈集中，做出決策的速率就愈快，但產生錯誤決策的機率就愈高。

(二) 多黨制和自由競選制。黨內多派合法并

存、競爭，其情形和多黨的功能類似。無論黨大、黨小，應一律平等。執政黨應有被反對黨取代而下野的心理準備；反對黨應有取得政權而允許下台黨東山再起的胸襟。執政黨只有在野黨的監督、制衡之下，才能善用權力。

(三) 新聞自由制度。新聞自由制度不僅應視爲人民說話權利的保障，而且應視爲民意對執政者制衡的一種體現。獨立的新聞界應該是一個「民意政府」。

(四) 軍隊國家化。軍隊國家化的目的是使軍隊不得干政。也就是說軍隊不得參與其他權力機構的運作。所以，軍隊之於國家，相當於電腦的外殼，在於保護而非參與其功能的行使。

軟硬件的搭配

設計得最好的軟件，用在不適合它的硬件之中，也是不能工作的。同理，知識份子縱然具有再好的民主理念和修養，但如果沒有相應的硬體結構，這些觀念還是無法實施。比方說，在現今中國大陸一黨專制和一元化的權力結構之下，民主「軟件」是無法工作的。反之，在美國、日本、西歐這些具備民主「硬件」的社會裏，專制的理念則難以實現。

啓蒙、組織兩相配合

民主運動需要從事啓蒙工作和從事組織工作的兩派互相合作，因爲，前者在設計「軟件」，後者在製作「硬件」。啓蒙側重的是傳播民主理念的工作，組織則是籌劃政治實體，爲多黨制的運行鋪路。實際上，大家參與的是一個整體工程——中國的民主電腦工程。只有兩派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攻訐，民主電腦才能建成。

看官，你有何喜好？願選修「軟件」，還是「硬件」？

訪蘇受挫，李鵬前途透陰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臨時換馬外交舉動突兀

四月十五日，據中國官方正式透露，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將於下月率領一個官方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會議。前不久，曾由北京正式宣佈——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的訪蘇之旅，遂告取消。

中國領導人正式出國訪問，是國家對外事務最重要的部份，安排亦十分鄭重其事。而在短期內，將已正式宣佈出訪的領導人臨時換馬，實在是一次罕有先例的舉動，不由得引人作種種臆測。中蘇關係近年來若即若離、風風雨雨成爲國際輿論長期關注的焦點之一。而此項外事更動，恰恰發生在有留蘇背景而受人物議的副總理李鵬身上，則更令人感覺其中大有玄機。

人們知道，李鵬副總理冠爲八五年成立的中蘇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故今春五月，該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由李鵬率團前往，乃是情理意料中事。不想此次節外生枝，中國方面突然宣佈改由姚依林代表團團長，替代該委員會中方主席李鵬，實予人以越俎代庖之感，亦反映出中國領導層在處理中蘇關係時舉棋不定的微妙心態和中蘇關係的雲霧波詭。在解答國外記者對此項安排的提問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說，李鵬副總理此次旅蘇未克，乃由於「國內工作的需要」之故。五

月份李將留在國內，但他仍保留其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這種說辭顯然不能消除人們對此敏感問題的種種疑猜。「工作需要」就像以往慣常使用的解釋——「健康不適」一樣陷於簡單化和令人懵首。當然，對中年的李鵬是不能用後一種說辭來推諉的。

老美尊俎意挫李鵬晉升？

李鵬的訪蘇之旅遭挫，可能有各種未張幕的緣故。據了解，中共領導人出訪和會見外賓，當由中央政治局的幾個至高人酌定。作出這樣唐突的、引發外界議論的外事更動，可能有深刻的政治權力鬭爭和制衡的背景在後面。曾有一種說法認爲，鄧小平在外交上傾向於西方，對蘇聯有戒心，故對晉升李鵬十分謹慎。於是，鄧決定不讓有親蘇傾向的李鵬作重要的外交曝光，可能是此事件的原因之一。

另一十分重要、或許導致了李鵬訪蘇不克的主因，是美國的外交壓力。三月初美國國務卿舒爾茲訪華時，代表美國國務院對中國政局變動後，同蘇美兩國外交的距離可能出現變動，表示嚴重關切。

據報導，舒爾茲和美國訪問團其它成員還就趙紫陽之後的總理人選和李鵬可能接任總理一事表示關切。美國訪華官員雖然基於外交禮節，不能直言對李鵬的存疑，但從美國國內朝野輿論中可見，此種態度十分昭然。留蘇派在

中共權力中的角色問題，已引起國際間的注目，因爲此事可能導致中蘇、中美三邊關係的變動，從而會對國際社會的政治平衡與穩定，造成巨大影響。

就個人素質而言，李鵬年富力強（相對於中共領導層平均年齡而言），而且受過專業教育、有多年的行政管理經驗。在某些領導人眼裡，李鵬被認爲知識全面，爲人卑允適度、能擔大局、具有周恩來式的士大夫風範。儘管如此，李鵬的留蘇背景和有時流露出的計劃經濟的思想模式和親蘇傾向，爲他的政途樹置了重重障礙。此次訪蘇未能成行，使之問鼎總理的宿願，佈滿了不祥的陰影。

對李鵬及留蘇派之我見

在中國的第二代領導人中，五十七歲的李鵬副總理一向是前程看好的接班種子。無論從那個方面的標準評定，李鵬都具備得天獨厚的實力。他是中共早期革命烈士李碩勛之子，後被周恩來總理收作養子而一直得到黨和國家的重點培養。李於五十年代赴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攻讀電力工程專業。回國後在電力部門做技術工作，並長期兼任過該部門的行政領導。文革後被破格地迅速提拔到今日的副總理高位。在「年輕化、專業化」的口號下，和幹部子弟接班的風尚中，李鵬理直氣壯地進入了第三梯隊。然而，在中共黨內的權爭暗伏的仕途上

得以迅速晉升，絕非易事，李鵬的成功亦不是偶然的。除了自身的條件外，實因李鵬擁有在權力結構中的雙重基礎，才得以青雲直上。這雙重基礎為：在上層，由於周恩來養子的關係，李鵬深得中共元老層諸如陳雲、鄧穎超等人的器重；在基層，五十年代留蘇的一大批青年精英，經過二十多年的歷煉，已日漸成熟，在各行各業中當仁不讓地躍居領導崗位，並逐步向中共的權力上層移動。他們在心理上，視李鵬為同僚和出色代表人物，在未來最有可能從老一代共產黨人手裡接棒，從而形成中共黨內

●兩岸風雲●

李洪林

再度被革職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秦俠



李洪林先生

實力雄厚的權力派別。這就是目下被廣泛議論的留蘇派。

所謂留蘇派和其存在與否的問題，一直引起廣泛爭論。因為憂慮留蘇派掌權會使中國的對內(推行蘇式計劃經濟)對外(奉行親蘇外交路線)國策發生演變，人們自然地會對這些人存有戒心，筆者亦然。就中蘇關係而言，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論，中國都應與蘇聯這個危險的鄰國保持某種距離。當然，中國亦應當理性、審慎地維持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這樣做符合中國的利益和外交需要。基於此種認識

被左霸胡喬木、鄧力群視為眼中釘的中共改革派著名理論家李洪林先生，三月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料峭寒風中，被鄧力群革除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一職，受留黨察看處分，他現在只是一位普通研究員了。

李洪林先生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因堅決抵制制守舊派吹鼓手、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對「清除精神污染」表示不遜而遭革職，被謫福建，靠着胡耀邦的近臣——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的保護，才得以倖安。于今在被稱作「第二次文革小演習」的反自由化中，李洪林因其大膽的政治言論而再度遭到革職。雖說在這場極左派大回潮的運動裡，受到衝擊的也不止李氏一人，但他兩度遭革職，真是「既躲不過初一，又躲不過十五」，實在是倒霉至極了。有人說，中共現在有進步了，比文革時代好多了。好在那裡呢？

像劉賓雁一樣，李洪林也是中國政治氣候的風向標之一。去年年中，政治改革呼聲扶搖直上的時候，李在北京的許多朋友想把他再送回北京來，以給鄧力群一點難堪。于是有一段

，任用對蘇聯情況有切身體認的留蘇背景的人，改善同蘇聯的雙邊關係，也不是件壞事。此外，當年留蘇的一代人，已成爲中國目前國家建設的主要技術人才，更因其空前(戰爭)絕後(文革)的斷層現象，而顯得珍貴。況且，技術官僚治國，將是中國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第三，留蘇派是因留蘇傾向於計劃經濟還是因深知其弊害而厭惡之，尙屬未定之天，不應以出身論定這個問題。在此提出三點粗淺異見，以期引出朋友們對此問題有見地的看法。■

人們曾經議論，李洪林要回北京接任「新觀察」雜誌的總編輯一職。但由于鄧力群的百般阻撓，未能成行。如今，別說再回北京了，沒把你李洪林和方、劉、王三人一起開除黨籍，已算給你個面子。

李洪林也是一個海內外知名的人物。他的著作「理論風雲」在海外出版，很得好評。去年春季李洪林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之邀來北美訪問，曾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了一次演講，題爲「四種主義在中國」(刊登於「中國之春」總四十三期)。儘管李的演講不像方勵之先生那樣尖銳、明快，但亦可說是入木三分，痛貶時弊。他說「資本主義在中國被重新認識，『恐資病』已沒有市場了……」「社會主義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極左的社會主義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災難，在世界範圍內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在新時期，那種廉價的共產主義已經沒有市場了。」而「封建主義在政治上的影響，主要是專制主義。」講了這些話，李洪林還沒有被開除黨籍，幸甚！幸甚！

中蘇關係進一步靠攏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彭秋野

近年來，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在順利發展，兩國間的雙邊經濟貿易，已從一九八二年的不到三億美元增長到一九八六年的二十六億美元。自去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講話願改善中蘇關係後，中蘇之間的合作領域在不斷擴大，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往來日益頻繁，且接觸的級別在漸次提高。

但是，儘管中蘇兩國在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而在改善政治關係上，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礙。中國政府一再表示，改善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是：蘇聯駐兵阿富汗，蘇聯支持越南出兵佔領柬埔寨，以及蘇聯在中國邊境集結重兵。長期以來，蘇聯領導人幾經更迭，但一直都拒絕討論中國方面提出的撤除三大障礙的問題，這是阻礙中蘇關係改善的癥結。最近，蘇聯領導人作了重大讓步，表示同意在中蘇兩國關係正常化談判中討論三大障礙問題，這是中蘇兩國談判局勢的重大突破，為改善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邁開了一大步。

為了履行自己的諾言，蘇聯於十一日宣佈，它已開始從蒙古撤出部分駐軍，這些軍隊是從六〇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起就駐在蒙古的。蘇聯駐在蒙古的軍隊約有三萬八千名，現今蘇聯從蒙古撤走的是一個機械化步槍師，約一萬二、三千人，蘇聯開始自蒙古撤軍，顯示莫斯科願意解除北京的憂慮，表現出改善對華關係的意願。

據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已於四月十三日啓程前往莫斯科，進行第十四回合政治正常化談判，冀望結束中國與蘇聯在二十五年長時期存在的緊張關係。錢其琛在北京機場對記者說，這次中蘇談判將集中討論消除雙邊關係的熱點，諸如高棉問題，蘇聯佔領阿富汗以

兩岸風雲

阮崇武被摘烏紗帽 李鐵映掌管體改委

中共保守勢力持續進攻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王明威

在今年四月十一日閉幕的六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公安部長阮崇武被免去職務，調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原電子工業部部長李鐵映被任命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接任趙紫陽），掌握全國經改方針。此項決定被認為是以彭真為首的保守派蠶食改革成果，向改革勢力進攻的又一重要步驟。

曾幾何時，以「橡皮圖章」、「舉手機器」著稱的「人大」竟然一反常態，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對着幹」。當然，按理說，人大若真能獨立於黨和政府之外，起到制衡作用，實為實現民主政治所必需。但非常遺憾的是，當極左路線橫行、極需制衡力量時，它完

及蘇聯在中蘇邊界的軍隊集結問題。又訊，蘇聯駐華大使特羅曼夫斯基最近在接受日本新聞人員訪問時說：「我認為中蘇共將來是會修好的，思想分歧已不再是我們對立的原因。」還說，對於改善兩國關係的步伐，蘇聯是會順從中國意願的。這些，都顯示出中蘇關係有修好的跡象。

中蘇關係開始修好，對中國未來政治經濟的發展，對世界局勢的動向，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會發生什麼變化，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全仰承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的鼻息，甘心充當極左路綫的幫兇和應聲蟲。但到了應該順應民意，努力推動改革時，它倒「叫起真章」來，非要來一下「制衡」不可。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無情地嘲弄人；中國的政體就是這樣叫人啼笑皆非。

此次彭真操縱的人大，又向改革勢力發動進攻，阮、李二人的職位變動就是保守勢力整個進攻計劃的一部分。

阮崇武在一年多以前與賈春旺一起被胡耀邦委以重任，安插進彭真等人控制的勢力範圍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當時即被人指為「外行領導內行」。隨着胡耀邦被免職，阮崇武等人

能小孩兒糖吃的手法

被免職也是人們預料中的。

據傳，當上海學運處於高潮時，阮崇武曾親臨上海處理。但他不知中共上層意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曾請示胡耀邦主管的中央書記處，但胡耀邦本人也不知鄧小平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因此不敢輕易表態，所以當時公安部門內並未採取什麼果斷措施阻止學潮。當時只是由教育部發言人發表了一篇調子溫和的答記者問。現在阮崇武也背上「反自由化軟弱無力」的黑鍋，被拉下了馬，實在是冤枉的。從這裡我們也看到，專制政體發展到一定程度，各

●兩岸風雲●

澳門將於一九九九年交還中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婁穎

自從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塵埃落定、一九九七年成爲定而不移的大限之期以後，澳門這塊擁有四十五萬人口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命運似乎同時被決定了——回歸「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有期。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發表聯合公報宣佈：澳門將於一九九九年交還中國。

據信中葡關於澳門的協議將遵循中英香港協議的模式，即允許澳門回歸中國後，在「一國兩制」下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中國方面也曾表示不會關閉澳門的賭場。澳門的賭場每年吸引四百多萬名遊客，佔當地稅收的四分之一。

公報發表後，台北的國府外交部發出了微弱的、不能引起世人注意的抗議之聲：「我們視澳門問題的協議爲無效。澳門應該交還給在

派勢力都在窺視對方，尋求對方的漏洞，但誰也不敢輕易地邁進一步。

李鐵映所接管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是非常重要的部門，它負責制訂全國經濟改革的方針大策，歷來是趙紫陽親自掛帥的。此次趙紫陽讓出位置，是改革派一大損失。李鐵映曾留學東歐，進京前曾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在思想上與李鵬接近。

從最近大陸發生的事件來看，保守勢力仍處於節節進攻之中，對此彭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次人大代會中，彭真甚至揚言「人大常委

台灣的中華民國。因爲中共是一個叛亂團體，無權代表中國和全體中國人民。」自然，這一聲明不可能對澳門的前途產生任何影響。

至此，澳門已成爲第二個香港。然而，據報導，澳門居民對前途的展望並不樂觀。這種憂慮自然有其理由。如果說，較多地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繁榮、發達一面的香港尚願慮「五十年不變」保證的可信性，那麼較多地體現資本主義社會腐朽、沒落一面的澳門能否見容於「社會主義祖國」，更在未定之數。

隨着澳門的回歸中國，存在於神州大地長達數世紀的殖民統治亦將同時消失。中國大陸將出現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的統一。中國第一大島台灣的前途更加引人注目。儘管目前台灣當局與一般大眾普遍認爲澳門回歸中國既無戰略意義，也無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台灣當局繼續一味堅持所謂「以不變應萬變

會正考慮如何加強人大對政府的監督功能」。由此看來他們認爲人大現在做的還不夠，以後還要更多地對政府進行「監督」。

最近有消息說鄧小平已有意讓趙紫陽只擔當總書記，讓出總理一職，儘管趙在一些場合一再宣稱自己幹總理可能更合適。如果趙紫陽真的讓出了總理一職，而總理的職位被李鵬或哪個彭真所看中的人擔任，中國經濟改革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的既定政策，那麼他們在中共統戰攻勢面前，只能居於被動的劣勢地位。

中葡聯合聲明雖以「香港模式」作爲藍本，但一度成爲談判重大障礙的數萬名澳門籍居民的未來國籍安排，却沒有清楚確切的說明，雙方在備忘錄中自說自話。對此，人們仍會予以關注。



澳門掠影

台灣立法委員吳德美的卓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葛芳

台灣立法委員吳德美女士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向執政者發出倡議，建議僑務委員會設立「晤親小組」，規劃在澎湖列島設置「晤親特區」，供台灣海峽兩岸失散的親人相聚。吳德美女士的這一建議，實在是高于眾生的灼見！如若中國大陸億萬同胞能夠得悉這個信息，定會大加讚賞！而那些骨肉離散數十年而淚盡、心碎的人們，更會奔走相告，推崇吳德美女士之積德行善之舉！

國共兩黨相爭，黎民百姓遭禍。政治鬥爭的是非、刀兵相見的高低，暫不去置評，無論如何，骨肉離散的痛苦不應再繼續下去了！人

生苦短，這樣拖下去真不知還會製造多少永遠無法彌補的人間慘劇！

多年來，儘管台灣當局嚴令禁止民眾前往所謂「大陸匪區」，却是「抽刀斬水水更流」般地無濟于事。台灣人士轉經香港或其它國家、地區進入大陸探親，已成爲公開的秘密。血濃于水，那些渴望在有生之年與至親骨肉一敘天倫的人們，通常對當局的警告置若罔聞。毫無疑問，隨着台灣政局的逐漸鬆動，中共假「三通」而行的統戰攻勢的不斷升級，當事人因而產生的絕望心情等等主客觀因素的變化，潛往大陸探親者的數目將會與日俱增。

查禁出版物更上一層樓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劉海

新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三月在一次黨內宣傳幹部會議上宣佈，有五種涉及「不健康活動」和「不負責任」的出版物應該被查禁，使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來就已開始的查禁出版物活動更上一層樓。

這五種出版物是：一、未能起到中共所規定的教育作用，刊登有害於公眾的報導及文章，包括宣揚色情及類似作品。二、進行「不健康活動」的報刊。如河南省「農民消息報」出售記者證以牟利（因爲憑記者證可優先購買車、船票及影劇票等）三、「不負責任」的報紙。如「深圳青年報」，今年年初刊登消息說鄧小平

「一定會辭職」，可後來據說又要求鄧小平辭職。四、刊登「荒謬」文章的出版物。例如長春市的「第三行」周刊，曾報導聖母瑪麗亞已在外國復活。五、經營有困難和讀者日減的報紙。即，國家現在僅津貼一些重要的官方報紙，對一些較不重要的報紙，將逐漸停止津貼。

根據以上五種應被查禁的刊物，可以想見大陸上一般出版物的命運。如果你的刊物涉及到人們所關心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就有可能因犯「不負責任」的罪名而遭到查禁；如果你盡量迴避敏感的政治問題，而只注重於人生的婚姻、愛情等方面，也將可能因「未起到正當的

蔣經國先生在其文告、演講中多次重復「仁者無敵」一語。若果如此，就應認真考慮吳德美女士這一建議的可行性。開放澎湖列島爲「晤親特區」這一中國歷史上尚無前例的創舉，必將舉世注目，並爲以「仁者」自詡的國民黨領袖提供有說服力的宣傳機會。一舉多得，何樂不爲？

幾年來，中共頻頻向海峽彼岸搖動橄欖枝，並對因國家分裂而造成的骨肉離散狀況流了許多鱷魚淚。翻開中國大陸發行海外的報刊，常見婦尋夫、子尋父之類的啓事，閱之令人鼻酸，並對台灣當局有悖常理的「三不政策」產生本能的反感。如果台灣當局能夠順應時勢，在力量對比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出一着棉裡藏針的妙棋，則不僅大得人心，更有可能進而影響中國大陸政局，獲得始料不及的反統戰奇效。

教育作用」、「誨淫誨盜」等罪名而遭到查禁。至於打算辦一個知識性、趣味性的科技小報、月刊之類的，後果也不見得更好，因爲你將冒「宣傳荒謬的東西」的危險。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你的刊物在內容上必定受到極大的限制，因而發行量必將愈來愈少，以致入不敷出。如果你打算活動一下，尋求財政支持，更可能會因「從事不健康活動」而被封殺。最後你的經營必定愈來愈慘淡，讀者必定日減，經費來源愈來愈困難，結果只能是——關門大吉。

至於「人民日報」之類官辦報紙，只要緊跟黨中央（現在是人大）的「偉大戰略部署」，牢牢把握鬥爭大方向，指那打那，那末不管你的文章可讀性如何，也不管你的讀者究竟有多少，都是不愁拿不到津貼的，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徐四民仗義執言鬧政協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馳遼



徐四民先生

多馬

五七年反右以後，中國的「政協」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花瓶擺設。但在六屆政協五次會議上，竟有人跳出來替「壞份子」(鄧小平語)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說話，提議讓這三人進入政協，真讓人擔心得捏一把汗。更有甚者，此人要與中共左王胡喬木、鄧力群在電視上作公開辯論，真是大膽狂徒、想入非非矣！

這個敢言的「政協義士」是誰呢？他就是香港地區政協委員、香港「鏡報」月刊社長、並一向被視為「左派」的徐四民先生。

當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出現有目共睹的挫折、外匯資金明顯短缺的時候，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却是另外一種景象：外匯存底業已突破五百億美元大關。有消息指出，到一九八七年元月已超過五百三十億美元，且仍然以每月盈餘三十億美元的速度增長……

！當年，國民黨初到台灣也是一窮二白。美國對台援助固然功不可沒，但自一九五零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美援總額也不過十五億美元而已，不及今日台灣外匯存底的零頭。

福兮禍所伏

——台灣外匯存底破五百億美元大關

●兩岸風雲●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彌文君

「中國人民不會再上當」。他又謂，如反資的鬥爭繼續發展，定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政策有影響。他大聲警示，「有人想推翻趙紫陽總理的經濟改革方針」。徐先生的仗義執言，為那些不敢造次的國內政協委員們出了一口氣。

徐四民先生在北京提出要求與中共保守派權威理論家胡喬木和鄧力群，就文化大革命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擺電視擂台，作面對面

辯論。徐先生大概忘記了中國是共產黨國家，言論自由都沒有，豈能讓你公開叫號黨的政治局成員辯論？所以，歷來氣勢汹汹揮舞大棒的「棍師」胡喬木和鄧力群，一個拒絕了要求，一個不作答覆，也不管會讓天下指為縮頭烏龜了。

徐先生除了提議讓方、劉、王三個「壞份子」進入政協外，還要求與老百姓的喉舌劉賓雁見面，以便對他此次遭極左派整肅，表慰問之情。無奈劉賓雁自由有限，以暫時要「整」一下為由，也拒絕了與徐先生會晤。

我們敬佩徐先生寧要正義感、不怕丟烏紗帽的風骨。徐先生的「鏡報」曾經數度歪曲、攻擊「中國之春」的立場，目下既然觀點不相上下，看來今後大可不必了。

廠商因出口賺取的外匯只能由中央銀行統一結存、統一支出。這種保守的金融政策，令許多民間企業無法獲資更新工廠設備，妨礙其進一步的發展。

台灣豐厚的外匯存底，說到底還是全體台

灣人民的辛苦錢。多年來，台灣人民賺取外匯，却沒有持有外匯的自由，這是不公平的。現在，改革金融制度的呼聲迭起，希望變國家銀行為民營，解除外匯管制以配合民間海外投資的需要……

台灣經濟在登臨新的水準後已到了十字路口。如果當局不因勢而修改經濟政策，則必會對內對外形成危機。看來，改革已是今日世界之潮流，台海兩岸勢在必行，唯在不同意義上進行而已。

沒樹，連草
也不生，走過去的，
跟倒下去的，都該是
勇士

說不清楚，我怎麼
落荒山谷，是碰上龍捲風，
還是白日做惡夢，反正
大不了，把二百另六塊骨頭
奉還上蒼

烈日當空，巖岩
在曝曬中，許已烤焦
山崖上，騰起一圈圈昏黃的
煙塵，崩塌了

我呀，嗓子冒火，整個肌膚
像在龜裂，血液就要凝固
渴、渴、渴，這一剎
若問我，世界上什麼寶貴，
水，是水
什麼花最美
水仙

朦朧中，真的
來了，滿頭露水，素白的
衣裙，帶着一股水濕的風
水濕的手臂，提着一個水淋淋的
瓦罐，怎麼還長着一層
水淋淋的苔蘚，打那兒來

很遠麼，再遠也遠不過
創世紀的春天

生命的構成，少不了
氨基酸，可沒有水呢
有機也變為無機

水，甜，真甜
湖水麼，有個日內瓦湖

河水麼，有道尼羅河
江水麼，有條長長的江
長江水，故國的
水，真甜

哦，花中姊妹
水仙，是妳呀，一身縞素
兩眶淚光，呆在病床前
守護着，極度高燒死過去

又活過來的我，妳
手上正端着一杯水，
一杯似水的柔情
柔情，水，都來自
愛之泉

泉湧，水不斷
沒草，生草，沒樹
植起樹，只要能拓出一條

綠色山谷，勇士呵
縱然最終倒下去，合上
那只色彩分明的
眼，睜著那只
還有光感的眼

在藍天下
泉之畔



● 文藝園地 ●

(國內) 林泉

漆黑的小辮

真愛，才敢
敞開靈魂的窗子
矯情，寶石般的瞳仁
也會暗淡，在
相互的凝注中，妳的
眼白，格外藍、藍
藍得像是湖，我願
變成一輪月亮，沉入湖底
尋持，那個透明的世界
哭什麼，別、別
很緊我，很緊
那浸沉在苦海的胸膛
多少年了，狂瀾
與創傷都結成了
浮雕，可心
和風情依然
五彩斑斕，假如
妳還想重溫童稚的夢
我的，也是屬於妳的整個軀體
頃刻間，還會爛慢地伸展
在晨曦中，伸展成一片金光閃閃的沙灘
哦，有個女孩
兀自檢貝殼，瞧她
赤着腳丫，兩條
漆黑的小辮，也
蹦蹦跳跳

留學生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日漸增大

●本刊評論員●李豪杰

本期下面發表的幾篇文章，報導了海外留學生運動對於國內政局的某些影響。當然，這幾篇短小的報導，列舉的事例極為有限，只是滄海拾貝而已。

說到海外留學生運動，不得不首先提到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中國之春雜誌是大陸留學生創辦的民運刊物，四年多來，已由簡陋的民刊形式發展成專業水平。現在，留學北美的每三、四位留學生中，就有一份中國之春，是留學生最普及的刊物。一位北京政府官員訪問北美後曾驚嘆：「中國之春基本控制了留學生的輿論陣地，我們低估了它的實力了。」

在中國之春基礎上組建的民運團體——中國民聯，匯集了不少海峽兩岸優秀的留學生和僑界新秀。中國民聯不僅在世界各大洲建立了分支機構，也在大陸內部建立了相當堅實的據點。由於中國民聯對大陸有組織的民運活動不斷增強，北京政府的國安部和公安部等單位，曾數度下達文件欲與應對，連鄧小平本人也數次聽取匯報，下達指示。

在鄧小平的心目中，中國之春正是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如果說，中國之春剛剛創辦時，還是少數留學生的舉動，那麼，今年初千名留學生公開信的創舉，則標誌着留學生民主運動已形成廣泛的群眾基礎。對於千人簽名信影響國內政局的情況，本期有專文報導。

一個總的趨勢是，自一九七八年底北京政府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以來，留學生對北京政局的回饋效應正在增加。

現在，留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團體逐漸增多。我們希望，留學生們做好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以便在未來中國政局的動盪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o?z x^!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前奏

鄧小平六中全會批中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馬臻燕

■今年初全國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其實，反自由化運動蓄謀已久，它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就埋下伏筆。在那次會議上，鄧小平批了中春，也定下了胡耀邦的命運……



▲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主席台。那時，胡耀邦尚不知自己的命運。

鄧點了六個人的名

鄧小平共點過六位帶頭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他們是：

魏京生（前民刊「探索」主編，現在青海被押）；

王炳章（前北京政府公費留學生，現任「中國民聯」主席）；

郭羅基（前北大校長辦公室副主任，現任教南京大學）；

方勵之（前中國科大副校長，現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員）；

劉賓雁（現任中國作協副書記）；

王若望（現任上海作協理事）。

對於後三人被點名的情況，海內外均已熟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大規模學運掀起之後，鄧小平在家中接見胡耀邦、趙紫陽、胡啓立和李鵬等領導人，斥責方、劉、王三人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並勒令將他們開除出黨。此後，一場不得人心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六中全會為反自由化鋪路

其實，鄧小平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乃蓄謀已久，其正式的前奏，為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二十八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中明文規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關於這段話，曾在六中全會上引發了中共黨史上罕見的一場爭論（詳情見後），最後，說一不二的鄧小平拍板定案，並在全會上發表了一篇為什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此講話收錄在新近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續篇）之中）。

就在這篇十二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鄧小平把魏京生、王炳章、郭羅基三人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鄧的這篇講話和全會「決議」，是今年初整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前奏。

所以，鄧小平把魏京生、王炳章、郭羅基三人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乃在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之前。

關於反自由化的爭論

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曾經過中共各派反覆辯論，字字爭奪。對此，本文沒篇幅贅述。但須指出，爭論的焦點是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段內容。

原「決議」草稿中，關於反自由化言論的內容是這樣的：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根本違背人民利

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前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副總理萬里、前中宣部長陸定一和很多開明人士都曾主張刪掉這段話，因為「自由化」定義不明確，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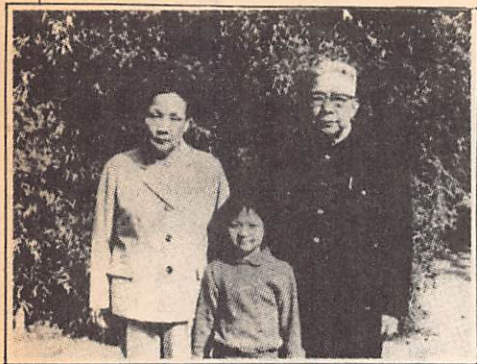
但是，鄧力群、薄一波、彭真、胡喬木和楊尚昆等，堅持寫上這段話。最後鄧小平建議，把「自由化」定義為「主張資本主義道路」。於是，這句話經過馬拉松式的爭論，最後變為：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陸定一據理力爭

九月廿八日，「決議」定稿了。當全體中委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坐定之後，主持會議的胡耀邦對與會者說：「『決議』就要表決了，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這時，在台下座位上，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把手舉了起來。他，就是老共產黨員陸定一。



一九七九年，陸定一和夫人嚴慰冰在中共監獄坐牢十四年後獲釋。這是釋放後與孫女合影。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胡耀邦叫陸老上台來講，陸定一表示在原地就行了。陸定一語重心長地說：「鑒於我黨歷史上的沉痛教訓，我建議還是把『決議』中『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刪去，以防有的人把它當作打人的棍子。」

陸定一講完這段擲地有聲的話，會上靜了片刻，隨後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並持續一分鐘之久。掌聲反映了大多數共產黨高級幹部的顧慮——怕再次挨整。

掌聲過後，胡耀邦一時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應對這種黨史上從未見過的場面。他看看「掌舵人」鄧小平，再看其他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常委們——陳雲、李先念和趙紫陽。

鄧小平的反資講話

鄧小平不愧為「掌舵人」，他看胡耀邦沒了主意，隨即發表了如下講話（編者按：以下講話為全文，該全文乃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出版的資料。鄧小平文選增訂本「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收錄這篇講話時，若干關鍵句子刪掉了）：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

這種自由化實際上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自由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這股思潮就是把我

們往資本主義的方向引。魏京生、王炳章和郭羅基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們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

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你應該記住，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全國人大在一九八〇年通過一個議案，取銷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

因此，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我認為，無產階級自由化也應該反對。實際上，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

我認為，任何形式的自由化都不應存在。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股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我考慮，既然自由化實際上只存在於資產階級，所以，應該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

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此時胡耀邦插話：經過反復考慮，我們起草班子認為，寫上這句話是有政治上的好處的。）

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要求放魏京生，說我們沒有人權。都是這些問題。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以上，就是鄧小平的即席講話全文。

大家長開口了，主席台上的胡耀邦、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先後發言，主張「決議」中放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話。接着，台下彭真、薄一波、胡喬木也發言，強調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

會場上鴉雀無聲了。

於是，與會代表「一致」舉手表決，通過了「決議」。

胡耀邦自食惡果

在鄧小平發表「一言定尊」的講話中，胡耀邦插話是同意把反自由化寫進「決議」的。在舉手表決時，胡也高高地舉起了手。

然而，就在這個「決議」通過的三個月後，胡耀邦自己在「懲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之下，被第一代共產黨人趕下了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再次成爲打人的棒子，陸定一的擔憂成了事實。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在九月廿八日的會議上，胡耀邦、陸定一以及那一大批用掌聲



中共開會向來舉手一致通過，但會下鬭爭十分殘酷。

支持陸定一的人，能夠聯合起來，堅決抵制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寫進「決議」，今天的局勢可能會有不同。

我們不由得想起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的情況。本來，劉少奇等是同意彭德懷的萬言書的。可是，毛澤東表態反對後，劉少奇等都翻了臉，一起炮轟彭德懷。後來，彭德懷被圍死，劉少奇也未逃脫被整死的厄運。

歷史就是這麼公平：說違心話的人，往往自食其果。

十二屆六中全會告訴我們：今天的共產黨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沒什麼兩樣——都是家長式統治，只不過家長換了個人罷了。

鄧小平打擊郭羅基

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的講話中，把三個人打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即魏京生、王炳章和郭羅基。

對於魏京生，大家都已熟悉，本文不再介

紹。我們要略談一下郭羅基。郭原爲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副主任，周培源的秘書，是一位理論家。一九七九年六月，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名作「誰之罪？」，對張志新案提出了很多尖銳的問題，啓發人們對社會制度的詰問。此後，他在「紅旗」上發表了「思想要解放，理論要徹底」，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等文章，還爲「教育評論」寫過特選評論。在一系列文章中，郭羅基衝破不少禁區。尤其在魏京生被捕後，他還敢大聲疾呼不要以言治罪，在當時殊爲難得。他在「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一文中，明確指出：「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專制政治。」

郭羅基的一系列言論，觸怒了鄧小平。在鄧的指示下，中共不但壓制他，還把他調到南京大學，做了一個普通教員。郭羅基到南大後，一直小心翼翼地教書。南大黨委懾於「上面」的壓力，停止了郭羅基的黨組織生活。然而，郭羅基深得廣大群眾、包括共產黨員的愛戴。在南大評選優秀共產黨員的活動中，被停止過正常組織生活的郭羅基，竟然被評上南大的優秀黨員。

今年三月份香港「動向」雜誌報導，郭羅基因老鄧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又點了他的名，備受新的壓力，已有精神失常的表現。

鄧小平為何批中春

鄧在講話中點了王炳章的名，實際上是在批中國之春。平心而論，鄧把中國之春打成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並不過分。因爲，中國之春一直在鼓吹自由化。只不過，自由化就是自由化，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無

產階級自由化之分。

鄧小平從中國之春成立一開始就一直批中國之春的自由化主張。一九八二年底中國之春剛發起時，鄧小平就在中央工作會上點了中國之春。他說（大意），我們有個留學生，叫王炳章，在美國「叛逃」了，辦了個「中國之春」，鼓吹資本主義。這種事是難免的，資本主義對我們的留學生是有腐蝕作用的。我們要加强留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說到這裡，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點了王炳章的名之後，連累了當時河南省負責外貿工作的高幹王秉章（與王炳章同音，但有一字之差）。這位老幹部在中央工作的老戰友，聽到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為河南的王秉章出國後「叛逃」了，立即給王秉章打了電話查詢。王接到電話嚇了一跳，心想：「我還沒有出國，老鄧怎麼知道我要叛逃？」原來，河南的這位老

政治笑話二則

（美國）泰恒

長脖子漢毛澤東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大約半年前，考古學家在發掘一座秦代古墓時，發現了兩片毛澤東的頭蓋骨。而後又在漢、唐、宋、元、明、清歷代古墓穴中發掘出毛澤東的牙齒和頸椎骨碎片（一個十分有力的證據是，所有這些出土骨片都留有帕金森氏病的痕迹）。此一考古新發現，轟動了全國。

不久，這批「聖骨」被送往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吸引了大批的人群前來觀看。觀者無不嘖嘖稱奇，紛紛向在場的考古學家提問，氣氛甚為熱烈。

觀者甲：毛澤東的頸骨會在千年古墓中出

現？真是一千零二夜的天方夜譚！

考古學家：這有什麼不可思議的？難道你已忘却彭（真）老先生說過的話：「現在有種人，脖子特長；身子進入社會主義，可腦袋瓜仍留在遙遠的封建時代。」毛澤東還能不在這「長脖漢」之列？

觀者乙：妙哉！彭公之言。我建議考古工作者不妨再仔細清查一遍那座已被發掘的秦代古墓。說不準也能找出幾片彭老先生的頭蓋骨來呢！

六個代表人物的意義

鄧小平九月廿八日點了三個人的名，十二月卅日又點了三個人的名。鄧小平把這六個人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他們代表了不同的方面：

魏京生是青年工人中自由化的代表；

王炳章是留學生中自由化的代表；

郭羅基是理論界自由化的代表；

方勵之是科技界自由化的代表；

劉賓雁是新聞界自由化的代表；

王若望是作家、文藝界自由化的代表。

反自由化運動的前奏

哪一位是草包？

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常令智者捧腹。人們在聆聽共產黨大亨的「宏論」、「高見」之前，宜先加固一下自己的門牙。

——摘自「徐公日記」

從上面的報導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實際上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前奏，全會上通過的「決議」，為今天的反自由化運動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法律」依據。

現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在神州大地開展。美好的河山、善良的人們，仍在遭受中共老頑固們的蹂躪。一位有良知的共產黨員痛心地说：「這個黨折騰了三十多年，現在還在胡折騰，看來，他們非要把整個民族的元氣折騰完了為止。」

這位共產黨員氣憤地問道：

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能要求自由化？

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能享受自由化？

為什麼鄧小平有批自由化的權力而人民沒有宣傳自由化的權力？

為什麼鄧小平一句話，就可把魏京生、郭羅基打入冷宮？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出版局黨委熊書記將負責編纂「俄華大辭典」的編輯們召集在一起，對他們大發雷霆，厲聲訓斥：

「瞧你們這班草包編輯，編的什麼鳥辭典？！竟然把X條目列在Y條目之後。（註）如此重大錯誤，居然無人察覺。不學無術到這種地步，怎麼能搞好社會主義出版事業？」

編輯們對書記大人的「博學多才」無不「由衷敬佩」，於是聞風而動，糾正了「錯誤」：把X條目與Y條目交換了位置。

辭典出版後往市內新華書店試銷。你猜怎麼着？辭典沒售出一本，地板上大牙却掃得一大堆——全是顧客們笑掉下的。

註：Y和X分別為俄文第二十和第二十二個字母，X列於Y之後。

刺向國內倒退勢力的利劍

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聲援國內民主運動散記

●本刊記者
馳 遼

一九八六年和八七年初，在中國大陸民主潮和胡耀邦辭職等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中，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們，在中國政壇各種力量較量中，發揮了特殊的影響力，湧現了很多動人的事蹟。

留學生的光榮傳統

這次，海外留學生大規模地投入爭民主的運動，與國內進步力量同呼吸、共命運，並令人感到奇怪。追溯自滿清洋務運動以來向外派遣留學生的歷史，留學生們在促進中國進步的關鍵歷史時刻，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一個光輝的歷史傳統。滿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和西方國家，最後反由這些留學生結束了滿清帝國的統治。而本世紀中國政治和科技的發展，與留學生回饋祖國更是密切相關。中共建黨早期的主要活動家，絕大部分是留法、留蘇、留日的學生，這批人構成了中共高層領導的胎股。在未來的歲月裡，留學生們更將發揮他們獨特的作用。

金觀濤夫婦首先站出

八六年十二月國內學生民主運動從安徽合肥開始後，美國各地的大陸留學生便行動起來。同學們非常關注這場運動，紛紛向國內的同學寫信表示聲援。去年學運剛興起時，在賓州大學進修的中國著名的年輕思想家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在接受美洲「華僑日報」訪問時公開表態，認為國內學生示威遊行的動機和願望是好的，是與改革的步調一致的，表示了對國內民主運動的同情和支持。

到了八六年十二月底，留學生們的各種實際聲援活動開始展開。如路易維爾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等校園內出現了支援國內民運的大字報和傳單，號召留學生們響應國內民主運動，積極參與這場運動。

今年元月初，參與支持活動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同學們自發聚會討論形勢，紛紛向國內打電話了解情況，傳閱國內來信，研究聲援國內民運的具體措施……

自元月初，國內大學生示威遊行活動遭到鎮壓，北京市政府通過一個「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阻止大學生上街遊行。中共高層改革派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民主運動歷來有兩個戰場，一個是國內的戰場，一個是海外的戰場。當國內戰場受到壓

制，保守派力量猖狂反撲時，海外戰場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海外戰場保守派是控制不了的。故國內戰場的人們通過各種渠道，給海外帶來信息，希望海外同學和民運力量立刻行動起來，對國內的艱苦鬪爭進行聲援。

「國內告急！我們不能再坐視了！」在西部，聖地亞哥加州大學動起來了，加州理工學院動起來了。

在南部，奧斯汀德州大學動起來了。在東部和東北部，普林斯頓大學動起來了，哥倫比亞大學動起來了，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動起來了。

在中部和中北部，肯塔基大學動起來了，愛荷華州立大學動起來了，密西根大學動起來了，明尼蘇達大學動起來了。

串聯會、座談會、小字報、公開信……，該用的，大家都用上了。

方勵之播下火種

正當大家最需要信息的時候，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於元月初到加州進行訪問。方勵之帶來了方勵之被壓的信息，也帶來了國內民主運動對海外留學生的期望。同學們向方

昇詢問國內情況，徹夜長談，氣氛熱烈。大家對國內民運受到壓制的情況十分氣憤。加州理工學院和聖地亞哥加州大學的部分同學草擬了公開信，聲援國內民運，徵集海外留學生和華

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大陸研究生（左起）李少民（社會學博士候選人）、楊小凱（經濟學博士候選人）、于大海（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接受「紐約日報」採訪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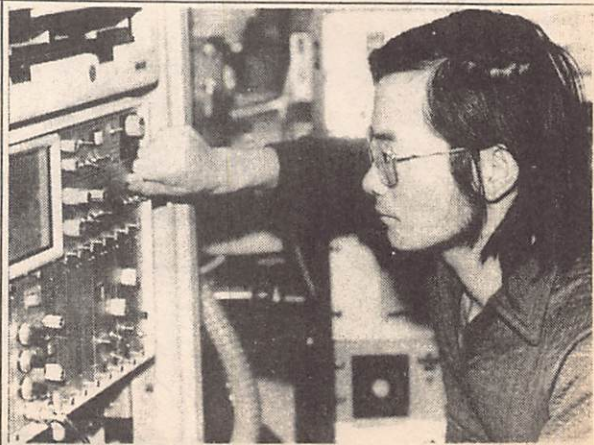


人教授簽名（該信發表於「中國之春」總四十五期五十六頁），這是一封發起較早的簽名信。此信先投寄到「人民日報」，得不到發表，遂再寄給「中國之春」。他們動作快，態度明確，對國內民運表示了鮮明的支持。

胡耀邦地位受到威脅，即將被迫辭職的消息傳到海外後，南加州的留學生們就已經做好準備，包括上街遊行示威的準備。據大家反映，在動員學生們的活動中，加州理工學院應用物理系的白崗同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他日夜活動，徵集簽名，感動了很多同學。

奧斯汀德州大學的怒火

在美國南部，擁有二百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奧斯汀德州大學，很早就行動起來了。這裡的同學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八六年四月初旬，正在美國進行研究的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風塵撲撲地從普林斯頓來到奧斯汀，與留學生們舉行座談。方勵之在座談中不僅講到改革存在的種種問題，而且預示了國內政治形勢隨時會出現反復的可能性。方勵之教授對留學生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他和同學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使同學們受到很大的鼓舞。方在德州的講話被同學們記錄下來，很快傳到其他大學，也越過大洋傳到國內。當鄧小平指斥方勵之為壞分子，並要把方開除出黨的消息傳到奧斯汀時，同學們義憤填膺。方的夫人、北大物理系教授李淑嫻的學生——奧斯汀德州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聯誼會會長陳平，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不顧自己患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連夜起草公開信，聯絡同學們簽名。這封公開信中說：「近一個月來，中國國內事態的發展，引起海外同胞極大的焦慮和外國朋友的



加州理工學院應用物理學博士後選人白崗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攝。他說：「如果我們坐視事態發展，政府就可能以為留美同學們都同意他們的所做所為了。」

嚴重關注。我們心憂如焚，不能不出來大聲疾呼。……」

「我們沉痛再進一言：有何用，事後再評說那治亂反覆的千秋功罪？為何不，今天就抓住這百年不遇的歷史機會？再不能重演一九五七！再不能重演一九六六！」

此信定稿於元月十四日，發表於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的「國際日報」上。陳平同學同時接受了「國際日報」記者對他個人的訪問。

普林斯頓三劍客

與此同時，美國東部的中國留學生也紛紛行動起來。普林斯頓大學的同學，與方勵之之

授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方勵之在美國時，就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進修，他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很多中國學生進行過座談，方還在普林斯頓大學作過公開演講。當方勵之被撤職受壓的消息傳到該校後，與他友情甚密的于大海、楊小凱、李少民同學，首先積極行動起來，草擬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明確表示罷掉方勵之的官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該信登在中國之春雜誌總四十五期四十三頁上）。

方勵之講話錄音鼓舞同學

在美國東北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元月初便拿到了方勵之教授去年十二月在上海同濟大學和復旦大學演講的錄音帶。大家組織起來，反覆聽方教授的演講，並展開了討論。同學們說，聽方教授講話真痛快，方勵之教授說出了我們大家心裡要說的話，他是我們中國知識份子的代言人。

同時，美國中西部和北部的中國同學也行動了起來。愛荷華州立大學有中國大陸留學生二百來位，大家自發收集了關於大陸民運的各種報導，以及海外報紙的各種評論，然後，將材料拷貝後發給所有同學。他們還每週定期舉行一次集會，討論國內的政治形勢。每次集會同學們的出席率都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們組織集體收聽方勵之的講話錄音，讓剛剛出國的留學生報告國內的民運情況，宣讀國內親屬和朋友們的來信，以互通消息。他們的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引起了其它學校同學們的好評。再如威斯康辛州的馬凱大學，大部份同學來自北京和上海，他們對京、滬兩地的學生遊行十分關切，大家組織討論，經常徹夜不休。這時，國內形勢日益惡化。元月十日前左右

，胡耀邦受壓、彭真保守勢力大回潮的消息傳到海外，留學生們怒火中燒。

各地的留學生都感到，各校自發搞起的各種活動顯然不夠聲勢，未能造成巨大的衝擊。一個全美範圍的中國留學生自發的統一行動，在暗中醞釀著。

第一次碰頭會

元月十四日，在紐約某地，美東、美西和美中北各校的留學生代表們舉行了一次秘密集會。同學們日夜兼程從各地趕來，從十四日上

午開始，一直討論到十五日凌晨，決定發起一場全美中國留學生大規模的聯合簽名請願活動。這次會議是在緊張、嚴肅和保密的氣氛中進行的。

會議後，代表們分赴各地，一場轟轟烈烈的向國內倒退勢力反攻的活動展開了。

敢以真名記春秋

在元月十四日紐約會議上，同學們便起草了一封公開信草稿，由代表們帶往各地徵求意見。經過反覆討論和十幾次的易稿，廣泛徵求

世界是我们的
事情要大家做

國內新近出版了“某大學要委人”的黑活集，該集長達九十一頁，供全國批判。

為配合上述活動，我們向大家解讀方勵之去年底在上海文大的講話。“誇大其辭，疑文相與析”錄音長達九十分鐘，定于下列時間准時播放。

二月十四日下午一時
A114 Gilman Hall
(星期六)



愛荷華州立大學中國大陸留學生貼出佈告，號召留學生收聽方勵之講話錄音。

了多方面的意見，終於產生了最後的定稿，交報界發表。

因為哥倫比亞大學地處紐約，這裡的中國同學和華人報紙保持着直接的聯繫。於是，各地留學生紛紛把簽名名單向哥倫比亞大學集中。哥大同學王波明、謝文、史天健等人的電話從十六號開始，日夜不停。爲了匯集名單，他們連續工作了整整四天四夜。大家以非常認真的態度核實姓名，願意公開一定要以真名字公開，不願意公開的就不公開。元月十七日簽名活動正在進行中時，胡耀邦被迫辭職的消息正式傳出，頓時群情鼎沸。公開信再次易稿，公開簽名者也迅速增加。元月十九日，全美各地幾十所學校的同學參與了簽名活動，徵集到的簽名達到千人，作爲第一批簽名向報界公開。

不怕挨槍的出頭鳥們

在第一輪簽名信發表之後，全美各地同學都知道了此事，紛紛要求繼續簽名。但是，誰能夠充當第二批簽名的聯絡人呢？大家展開了討論。有些人害怕公開充當聯絡人會引起中共的輿師問罪，不敢出頭。在此情況下，普林斯頓大學的于大海、加州理工學院的白崗、王尤崎，布朗大學的馬戎、王啟進等人，勇敢地站出來，繼續作公開聯絡人，徵集第二批簽名，克服了中國人槍打出頭鳥的心態。

追求民主的集體行動

在公開信中，留學生們表達了他們對民主自由等權利的強烈要求。更可貴的是，無論一千人簽名信，還是全美各地的中國同學的各種公開信，都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與中共最高當局

截然不同的政治觀點，這在中國民運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中國向海外派出的留學生們，已經與中共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公開決裂，他們將在未來成爲專制制度的掘墓人，他們的行動，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持不同政見的集體行動！

乘風借勢海外輿論

簽名信在美國中、英文報刊發表後，經過輿論的放大，很快傳到了國內，對國內的民運力量和改革派起了巨大的聲援作用。

國內由於胡喬木、鄧力群的大棒封殺，萬馬齊瘖，民主派的聲音已經聽不到了。這時，留學生的民主力量，決定借用海外輿論陣地，透過「空中大字報」，向國內傳遞聲援。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楊小凱和李少民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大膽地談出了自己鮮明的政治觀點。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博士生唐德明接受校刊訪問時，也對國內形勢表達了獨立的想法。剛剛從國內出來，現在哈佛攻讀的胡平，公開在「中報」上面撰寫文章，爲中國人表達異見的權力辯護。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生、來自北大學生李三元，也在「中報」上撰寫文章，對國內倒退勢力猛烈抨擊。這些例子表明，中國海外留學生已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獨立之路。

以上情況只是一小部分留學生的活動。現在，在全美各地，留學生們已經不再沉默。如俄亥俄州大、肯塔基大學、杜克大學、明尼蘇達大學等校的同學，後來都組織了討論活動，會上有人還散發了「中國之春」登載的方勵之講話。有的同學自己掏錢拷貝了幾十份方的講話，送給大家。這些場面令人感動。

領事館不了了之

在留學生簽名信活動傳到國內後，李鵬的教育委員會，立刻下令給中國駐外機構，要它們阻止海外留學生的自發活動。中國駐紐約的總領館、華盛頓大使館都派出了大批人員，到各個學校巡迴檢查，調查簽名活動的帶頭學生。留學生們不僅不怕他們，還主動地、針鋒相對地作領事館人員的「工作」，讓他們站到留學生一邊來。實際上，領館工作人員在內心中何嘗不對中共保守派開倒車的行爲憤怒呢？他們很同情留學生的活動，但由於職務的關係，又不得不打起官腔、敷衍了事。只有個別人，如紐約總領事官的官員馬敬平，是個極左份子，在留學生中進行卑鄙的威脅利誘活動，還讓各學校的黨員學生恢復黨組織活動和政治學習。他的官職雖不大，但在總領館內却是一霸，人們懷疑他是國家安全都安插的人，故都畏他幾分。這種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受到人們的厭惡和冷落，他們終究會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架上。

霧期過後呈豔陽天

在八六、八七年之交，中國新舊勢力進行搏鬥的時候，海外留學生掀起的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對國內政局起了巨大的衝擊作用。這在中國民運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目前，國內的守舊與革新兩種力量，正進行着撲朔迷離、難解難分的鬭爭。有人把它叫做「霧期」。但這種局面只是暫時的。我們堅信，當新舊勢力的總決戰打響時，海外留學生們，已經做好了思想和組織的各種準備，他們將會勇敢地投入到激流中去。

化作秋風掃落葉

——記留學生簽名信對國內政局的衝擊

(剛出國的留學生) 楊帆

波瀾壯闊的中國留學生千人上書運動，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中國的政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一個問題早已引起普遍關注，那就是，海外留學生的公開信，對國內政局有沒有影響呢？這影響到底有多大？想必大家都很希望知道一些情況。我是剛剛出國的留學生，在國內同上層有某些接觸，了解到一些關於這方面的內幕情況。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情況告訴海外的同學們。我的總的看法是，留學生和海外民主運動對國內進步力量的聲援，對國內的政局走向，是有影響力的，它將在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歷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

七人倒胡集團

要想弄清楚留學生千人簽名信的意義和作用，必須先談一下胡耀邦辭職的某些內幕。在去年十二月底，即軍委擴大會議剛開完，也就是全國各地學生民主遊行搞得如火如荼

的時候，中共黨內和軍內守舊力量進行會串，對國內的進步力量進行了瘋狂的反撲。十二月廿七日，以彭真為首（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串連一波（中顧委副主任、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副組長）、王震（中顧委第一副主任）、胡喬木（政治局委員）、楊尚昆（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余秋里（政治局委員、總政治部主任）、鄧力群（中央書記處書記）共七人，來到鄧小平家裡遊說。這七個人，北京人稱之為「七人倒胡集團」。他們向鄧小平施加壓力說：我們的無產階級紅色江山不能改變顏色，學生娃娃這樣鬧下去不行，再這樣下去，軍隊就要介入。因為這是一場威脅到我們黨的前途、威脅到社會主義政權的運動。他們點胡耀邦的名說，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學生遊行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把事情鬧大了，會出現像過去波蘭、匈牙利那樣的局面。現在已經有許多工人參與，將來工人會罷工，便會影響經濟發展和安定團結的局面。如果農民也捲入的話，那我們黨就控制不了中國了。

彭真把學生運動稱作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把責任完全歸咎到胡耀邦的頭上。他說，胡耀邦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源，他要對學生鬧事負責任，要讓他下台。胡喬木和鄧力群也幫腔說，方勵之在上海作演講，中央書記處也拿到了錄音帶，本來應該嚴加禁止，可是胡耀邦並沒有採取果斷措施。這種姑息的态度，就是在間接鼓勵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鄧力群還特別指出，胡耀邦的錯誤是一貫的，從五七年到現在，尤其是在清除精神污染時期，公開包庇「苦戀」的作者白樺、包庇王若水、王若望和劉賓雁，在八六年作家會議上，胡還公然安慰白樺，等等。

鄧小平聽完這些，特別在聽到軍隊要出面干涉時，就下定決心「壯士斷腕」，讓胡耀邦辭職。他知道再不罷黜胡耀邦，黨內保守派和軍方結合，是夠他老鄧瞧的。

這「七人倒胡集團」對中國政局起了促進作用，歷史將會審判他們的。



胡耀邦：中國的青年人支持我

子女們力勸鄧小平

綜上所述，老鄧罷胡、忍痛斷臂，乃迫於「七人倒胡集團」的壓力。耐人尋味的是，在一個月前老鄧還誇胡耀邦工作做得好，而在一個月之後就發生這麼大的態度轉變。老鄧還說過，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天塌不下來。現在老鄧罷胡，是否要冒天塌的危險呢？

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彭真一伙遊說老鄧的第二天，鄧小平的子女鄧樸芳和鄧琳等，聽到「老爺子」要罷掉「胡伯伯」，就心憂如焚，一起向鄧小平苦勸。想改變老爺子的決定。據說鄧的子女同鄧小平整整辯論了一天，他們對鄧講，現在就急着罷胡沒啥子好處，會引起政局動盪，會影響改革事業。要罷胡，也要等到十三大，通過合法手續。他們也不同意對學生運動進行嚴厲鎮壓，以防造成不良影響。不管出於何種動機，老鄧的子女們要比老鄧清醒得多，接受自由思想也多。比如鄧樸芳辦的「三月風」雜誌，曾邀劉賓雁做其編輯顧

問，還刊登了許多很開放的言論。但鄧小平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大腦神經系統開始僵化，已顯出一些老年期的偏執狂。所以子女們的話並不能讓老鄧清醒些、開竅些，其實老鄧也沒法改變初衷了，因二十七日他已向七人集團作了承諾。

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家裡召見了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田紀雲、李鵬、喬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們。老鄧當着衆人面，把胡耀邦大大批評了一通，讓胡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這樣，罷胡的大局已定。

生活會變成了罷胡會

可是，怎樣罷胡呢？總要找個場合和藉口吧！我這裡要披露的是，罷胡會簡直是一場鬧劇。

元月十六日，中央高層照規矩召開生活會，由胡耀邦主持。這種會，原本是高層巨頭們話家常、聯絡感情的。開會那天，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紀委書記等高層領導，聚在一起。有的還有子女和秘書陪同。在「七人倒胡集團」的事先串聯、安排下，生活會變成了倒胡會。後來，中央發佈的所謂「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指這次非正式的生活會。會議公報上指的「其他有關同志」，就是暗指某些高幹的子女和秘書。

據說，會上薄一波等對胡耀邦大加鞭撻。最不能令胡耀邦忍受的，是胡耀邦的私人朋友王鶴壽（中紀委書記）對胡反戈一擊，把胡對他的很多私人談話端了出來。例如，胡會對王私下說，十三大時爭取把更多的老人從關鍵職務上請下來，胡還向王點了不少人名。沒想到，王鶴壽一下子出賣了老朋友，把悄悄話統統

揭發了。聽完王鶴壽的話，胡耀邦不禁痛哭失聲，後悔自己看錯了人。這時，會議已無法由胡耀邦主持，鄧小平便指定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總結了胡的「六大罪狀」，後來做為中央二號文件發下來了。

平常，老百姓總以為「宮庭」裡的事有多麼「神聖」。其實，這批垂垂老朽，簡直是一批政治老頑童，他們把改革大業當做兒戲。在罷胡一舉上，他們連自己制訂的章法——共產黨黨章都拋到腦後了。

可是，別小看這批老朽，就是他們，倒轉了中國歷史的車輪。

海外戰場日見重要

當國內的學生運動遭到強暴鎮壓、胡耀邦改革派嚴重受挫的時候，國內的改革派和民運力量，不得不暫時採取守勢，以保存實力。但在這種局勢下，還有一個戰場顯得格外重要，那就是海外戰場。當國內戰場沉寂時，各種信息通過所有可能的渠道輸向海外，希望海外的民主力量站出來，造成國際反響，向國內反饋，形成抑制國內倒退力量的陣勢。

一張及時的王牌

這時，海外中國留學生們迅速行動起來。一月十九日，海外留學生發表了一千人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聲震國內外。中國留學生是中國的精英分子，在十億人中是天之驕子，他們素有參與時政、肩負道義的歷史傳統，將成為未來中國政壇的主要角色。

當他們被派遣出國時，教育部就會經向他們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國未來的前途，在你們

這些留學生身上，將來上天安門的是你們，將來的部長要從你們當中產生。當然這是中國領導人對留學生的誘惑，怕他們去而不返，但這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實際上不必等十幾年以後，現在他們已經對中國政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留學生們的千人公開信在海外發表時，他們的行動等於向國內的進步力量遞出了一張王牌。這張牌一亮出來，突然使整個牌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使改革派方面扭轉了頹勢，穩住了陣腳。

在公開信發表後，新華社駐外機構向中央呈報的內參中，兩次專文講到此事。第一次是講公開信的內容、參加人數和影響等；第二次是講留學生簽名信是怎樣產生的、它的進一步影響以及某些重要的組織者等。

當國內進步力量與保守力量進行殊死搏鬥時，當國內改革派面臨八方圍剿、束手無策的時候，海外千人上書，經過電波，越過太平洋，在中共高層和民間引起了巨大反響。

趙紫陽藉機限「反資」

元月中下旬，趙紫陽主持了一個全國省長工作會議。會議正在進行中，海外留學生發表公開信的消息，傳到了北京高層，也傳到了趙的耳朵裡。趙紫陽立刻意識到，這是向守舊派施加壓力的有力王牌。趙在會議上立刻就簽名信問題發表看法。他說，國內局勢已經引起了外界強烈的反應，連我們派出去的學生們，都在外面公開說話了。所以，我們要注意，不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搞得太過火。趙紫陽隨即提出了反自由化的「六個不要」：不要上揪下連、不要揪小方勵之、小劉賓雁、不要擴大到黨外、不要擴大到經濟領域……趙還特別

強調，批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定要掌握政策，弄不好我們派出的留學生都不敢回來了。他們是我們從各行各業選拔出來的精英……。

趙紫陽：「反資」有「六個不要」。



會後，趙紫陽和田紀雲專門找了鄧小平反映情況。田紀雲剛剛訪日回來，他也把日本朝野的不滿態度講述了一通，也提到了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情緒很不好，不信任國家了。他還說，日本商人現在都不敢投資了，對中國政局感到憂慮。趙紫陽建議老鄧趕快收縮一下運動。老鄧聽了，也感到了局勢的嚴重，他表示要掌握分寸，不能再搞大了。

趙紫陽在全國省長工作會議上表示要收縮運動之後，胡喬木和鄧力群等人就氣急敗壞地跑到老鄧那裡問，運動還沒有開始，怎麼立刻就收場了呢？反對自由化不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嗎？鄧小平對他們講，外國人和留學生的反應很大，運動要平穩進行，如果不注意政策，很可能造成反效果。鄧此刻也在利用海外留學生這張牌，來抵擋保守派的糾纏。鄧小平自己也感覺到，他的一些講話和作法，已經大大失策了。

胡耀邦準備捲土重來

我亦特別打聽到胡耀邦辭職後的一些情況，和他對於海外留學生反應的感想。胡辭職後，傳說很多。有人說他閉門思過、精神萎靡。有人說他住進醫院等等。但通過我的朋友與胡的公子胡德平以及他在貿易部的大公子劉湖的來往，打探到一些內情。確實，胡在開始被老鄧叫去痛斥後，非常難過，曾與他的兒子抱頭痛哭一場，覺得共產黨和老鄧對他不公。

胡耀邦在聽說到海外留學生簽名信出來後，感到一陣安慰。他沒想到，還有那麼多學生為他打抱不平。據說，留學生簽名信一事，是由胡德平告訴他父親的。胡德平現任統戰部秘書長，工作中要接觸海外政治動態，且有不少知交在國外。他也是胡耀邦最倚重的公子。據說胡耀邦聽到此事時，興奮得竟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臉上的晦氣頓消。胡當時說，我要讓老頭子們知道，我是有群眾基礎的！

據說此後，胡耀邦便恢復了往日的精神。前不久，他參加大會談，便是在聽到這個消息後，重新振作的一種表示。當然，保守派們安排胡出場，目的是演戲。但胡耀邦也有心來個假戲真唱，顯示一下自己並未垮下來。現在，胡耀邦認為，有了青年們的支持，就等於有了未來，他決心同守舊派再做一搏。

鄧小平的矛盾心態

此次中共政局的逆轉，在海外造成了一種奇觀，那就是，左中右一起反，簡直是「反了反了！」

海外的右派反了，並不奇怪；中間人士反了，也不足掛齒；令中共惱火的是，中共在文

革後花了巨大本錢統戰過來的全部左派、和一貫支持中共的親共人士、報紙、商人，都反了！許多以往對鄧小平抱有反感的人，這次反得最徹底。他們就像小孩子受了大人的騙一樣，怒不可遏；海外每隔三五天，就會有一批人發表簽名信，包括作家、藝術家、學者等。鄧樸芳收集到這些情況後，向鄧小平反映說，這次國際反應太大了，我們失去的太多了。鄧在元月時還說，我們抓了魏京生，也沒有怎麼樣嘛！這次鄧也發現自己失算了。但老鄧現在悔之晚矣！

鄧小平的子女曾說，老鄧是個川驢子脾氣，性格倔強。他是不認輸的。有人分析說，鄧正處在一種矛盾心態中。他看到了罷胡是嚴重錯誤，特別是對他個人聲望的否定。他雖然看到這一切，但又不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可以這麼說，如果一個人犯了錯誤，雖發現了但不承認，反而去掩蓋錯誤，就有可能再犯十個錯誤。譬如像毛澤東，在五九年時明明犯了冒進的錯誤，又不敢正視之，於是為了掩蓋這種錯誤，做出了發動文革除掉劉少奇的決定。可見這種矛盾心態是多麼可怕，會讓一個人陷於瘋狂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一種精神病狀態，對一個來日無多的老年人是極其可悲的（據中央高幹保健小組透露，鄧小平已有相當程度的老年性腦硬化症，這對老鄧做出決策十分不利）。

民間感到鼓舞

千人簽名信發表後，新華社報了內參上去。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許多報紙在海外的記者，都報了內參上去。這時，這些報紙在北京的大樓裡好像聽到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一樣，欣喜若狂。特別是年輕人，互

相奔走相告，大家說，這回好了，海外終於動起來了。

國內人民的這種心情不難理解。一方面，他們在國內對守舊派的淫威無能為力，只能寄望海外；另一方面，中共諸公們也是只怕洋人、不怕家奴。同樣的話，一個外國人講，頂一萬個中國人講。

國內的大學生們，從海外同學、親戚的來信等各種渠道知道了這件事，他們受到了巨大鼓舞。北大的一名學生說：「我們以前對出去喝洋水的同學不抱任何希望，現在才知道，大家的心是相通的，我們互相都能理解。他們把火炬接過去了。」北師大歷史系的同學說，留學生在歷史上發揮過巨大作用，現在是他們再次發揮作用的時候了。有的學校的同學半夜從美國之音聽到消息，徹夜難眠。

消息傳到留學生家長那裡後，他們既擔憂、又光彩，紛紛寫信用暗語表達心裏話。有位母親在寫給兒子的信裡這樣表達：「兒在外，母命有所不授。走自己的路吧！」我不知道教育部是否向簽名的同學家長傳達過通知沒有？但從許多家長迅速知道消息上猜測，中共是作了一些安排的，大概是個別通知或以文件的方式傳達，讓各單位領導作留學生家長工作，再讓這些家長勸海外的子女和中央保持一致。

李鵬跳腳，王震大罵

現任副總理兼國家教委主任的李鵬，二十日下午就從外交部接到了關於留學生簽名信的簡報，當時嚇得汗流夾背。他急得直跳腳，立刻找來下屬，通知中國駐外使館教育組，立刻採取措施，防止事態擴大。故聽說海外總領館派出大批小組到各學校去安撫。李鵬知道，留

學生們出了事，是要怪罪到他頭上去的。

七人倒胡集團的諸公們，聽到消息後，更是氣急敗壞。據說王震聽到消息後，破口大罵，「他媽的，這群娃娃中了資產階級洋水的毒了。這不是造反嗎？」老奸巨滑的胡喬木則說，我們要抓住機會，重新制定留學生政策。可以看出，他們都像晴天裡聽到一聲霹靂一樣，震得懵頭懵腦。

三月，美國國務卿舒爾茨率代表團訪華時，也提到千人留學生簽名信事件。特別是舒爾茨還向中國領導人暗示，不希望李鵬接總理。他們深知李鵬與蘇聯的淵源，並認為李鵬是保守派。「中國之春」在八五年一月就指出，李鵬接權是中國最大的災難。現在回憶一下，這份雜誌是有先見之明的。那是第一篇系統分析中共黨內留蘇派的文章，對美國國務院，產生了很大影響，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中國之春在海外的民主運動，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未來屬於我們

據一位副部長的孩子講，這次如果沒有海外的聲援，保守派會繼續衝刺下去，改革派的大廈可能不僅僅坍塌掉胡耀邦這一角，很有可能整個大廈都會傾倒。

在中國政局千鈞一髮的轉變時刻，海外留學生千人簽名信，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其實，中國政局的未來是很清楚的。儘管保守派的老朽們迴光反照，得逞於一時，但他們已經大半個身子入了土了，他們是不會萬壽無疆的。未來是屬於青年一代的，是屬於那些勇敢的、鐵肩擔道義的、為民主而搏的大學生的。讓我們鼓足幹勁，化作秋風掃落葉，把那些倒行逆施的老朽們，通通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吧！

民聯活動已經奏效

——評福州市公安局絕密文件

●本刊評論員●齊望春

最近，中國民聯獲得一份福州市公安局絕密文件，內容是檢扣中國民聯香港分部在國內散發的支持大陸學運的傳單。

這份文件顯示，我中國民聯在國內支援學運的活動，已引起北京當局的強烈關注，以致公安部不得不通報全國，查尋中國民聯的宣傳品。

大陸去年十二月學潮爆發前後，中國民聯在國內做了大量工作。民聯不少分部、支部、聯絡站及很多盟員，向國內攜帶、轉送、郵寄了大量宣傳品。很多不是盟員的熱心朋友，也協助民聯對大陸開展民主播種工作，把大量「中國之春簡訊」等資料傳入國內。民聯香港分部在國內散發、郵寄的傳單，僅是我們整體工作的一部分而已。

我們要強調的是，絕對不要小看往國內傳送、郵寄傳單的工作。一份傳單，就是一粒種子，將來就有可能開出一朵意想不到的民主花朵。至少，一份公開的傳單可以牽制幾位公安人員的力量，公安人員亦可從中獲得民運信息。今後，我們要加强往國內運送傳單的工作，希望各界給予我們更大的協助。

福州市公安局把民聯香港分部的傳單打成「反動傳單」，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支持國內學生運動也稱之為「反動」的話，那麼，海內

外大批中國人都可被扣上「反動份子」的帽子了。

據我們從國內獲得的消息，全國其它一些省市也接到了公安部的通報，可見中國民聯活動的影響之大。

我們要繼續加強向大陸的民主宣傳攻勢，讓各種民主傳單像天女散花一樣，撒在神州大地的各個角落。

各界有心人士如願協助我們做此工作，請與本刊後面通訊地址聯繫。

附：福州市公安局文件

絕密

關於注意發現檢扣中國民聯散發煽動學生鬧事的反動傳單的通知

各分局、派出所：

接公安部通報，最近發現中國民聯香港分部派人入境，散發或郵寄題為「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聲明」的傳單。「聲明」煽動說：「人民不會永遠忍受專制統治」、「我們中國民聯（香港）堅決支持國內的學生運動」等。落款為「中國民聯（香港）」。這種同樣內容的傳單共兩種，分八開及十六開版面，均鉛印。請各地注意，一經發現上述傳單，即收繳檢扣，並加強監控情況，及時上報市局。

福州市公安局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五日

●兩岸風雲●

胡啓立大揭

胡耀邦

（國內）婁穎

最近，中共中央又發出一份內部重要文件，繼續批判胡耀邦。該文件列舉胡的主要罪狀，是他搞派系活動。其派系人物包括：政治局委員胡啓立、外交部長吳學謙、國家安全部長賈春旺和公安部長阮崇武（已被免職）等。

這份內部文件的主要根據，是胡耀邦的「親密戰友」胡啓立的揭發材料。胡啓立在胡耀邦倒台的關鍵時刻（尤其是今年元月份十六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反戈一擊，大揭特揭胡耀邦，使胡耀邦備受打擊。以此，胡啓立暫時保住了位子。胡啓立還在私底下向鄧小平報告了胡耀邦拉幫結派的主要內幕和主要成員。

該文件指出，胡耀邦曾說過這樣的話：「當毛澤東同志在五〇年代接見外賓時，他曾帶着我，向人介紹我是他的繼承人，但後來他就把我給忘了。」該文件批判胡耀邦說，他最近幾年來，總是向人介紹胡啓立是他的接班人。文件指出，這種指定接班人的方式是錯誤的。這份文件是倒胡運動的繼續，預示着胡耀邦將在十三大上失掉政治局常委一職。

北京的一位高幹子弟說，從胡啓立大揭胡耀邦一事可看出，共產黨內部仍然是極為黑暗殘酷的。只要專制性質不改，權力轉移就不會平穩進行。

暴風雨前暫寧靜 鄧死才能見真章

永遠不被招安去 建立獨立新力量

——中國大陸文科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座談會紀要

● 本刊編輯部整理 ●

編者按：一九八七年三月底和四月初，中國之春編輯部分數次邀請了一些中國大陸赴美文科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就中國政局和民運策略問題舉行了深入座談。參加座談者當中，有的剛剛出國，目睹了學運和胡耀邦倒台事件；有的長期思考中國民主化問題；有的前不久回國訪問，獲得了第一手的資料；有的即將返國參加實際的社會變革……。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對祖國熱愛、對局勢憂慮、對專制憎惡、對民主渴求……。他們對本刊暢所欲言，觀點並不一致，但每種觀點都可能代表了相

當一部分留學生的看法。他們對本刊的要求是：觀點可以發表，但不用真實姓名，原因是……。

他們的化名及專業如下：

趙敏章（以下簡稱趙）：訪問學者，專業：國際關係；

鄭雄（以下簡稱鄭）：博士研究生，專業：國際關係；

田力平（以下簡稱田）：博士研究生，專業：哲學；

陳君凌（以下簡稱陳）：博士研究生，專業：政治學；

張西全（以下簡稱張）：博士研究生，專業：政治學；

水志雲（以下簡稱水）：博士研究生，專業：社會學；

汪者（以下簡稱汪）：博士後研究，專業：經濟學；

劉永烈（以下簡稱劉）：博士研究生，專業：政治學。

以下座談會紀要乃根據錄音整理，若與原講者有出入，由本刊負責。為讀者閱讀方便，本刊對零碎發言進行了歸納、調整。

第一部分：當前國內政局 令人憂慮的痲痺情緒

趙：我是剛出國的訪問學者，目睹了學運和倒胡事件，也體會了人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抵觸。然而，我首先要提出警告的是，很多人（包括國內和海外）對國內形勢的嚴重性認識不足，他們有一種痲痺情緒。

如果現在你到國內基層走一走，你會發現「舞照跳、歌照唱、生意照做」，似乎倒胡事件影響不大。實際上，根據我從北京的關係了解到的內幕得知，現在是表面上風平浪靜，水

下面却是魚蝦大鬪。各方勢力都在為今秋召開的十三大做奪權準備。比如：

▲鄧力群有意問鼎總書記，並領導着一個理論班子正在為十三大起草一份權威性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內進一步實行專政的理論文件。

▲李鵬正在使出渾身解數，爭取總理寶座。李鵬如不晉級總理，他的政治仕途就可能封頂，他會干休嗎？

▲彭真進一步聚攏起一批老一代共產黨人，其目標是加強黨的領導和加強計劃經濟。

▲胡喬木、鄧力群不斷抱怨趙紫陽的「利

車」政策，他們問鄧小平：運動還沒有開始，怎麼就結束了呢？

以上表明，黨內守舊勢力並未罷休，但他們表面上做得很策略。

汪：你講得很對，我剛回國探親因來，感覺黨內保守派學得聰明多了，他們很會做戲。比如，這次六屆人大五次會議，特別把胡耀邦安排到台上。北京有人說：「這是要猴嘛！」之所以這麼做，是要給人們造成一個天下太平的假象。我回到海外，聽到一位朋友說：「看來我們反應過度了，北京的局勢似乎並不像我們原來想像的那麼嚴重。趙紫陽的權還是穩穩的，有趙在，改革還是有希望。」這位朋友的意見，說明了保守派的痲痺戰術已獲得了相當

不少人有嚴重的麻痺情緒，認為風平浪靜了。實際上，黨內守舊派正竭盡全力為十三大奪權做準備，最終目的是改變胡趙的改革路線。如果目的達不到，他們會幹些什麼？

的成效。

趙：何止海外有麻痺症？就我所知，連趙紫陽的班子、甚至趙紫陽本人也有麻痺思想。我出國前，曾見過趙紫陽幕僚班子的人。他們似乎很樂觀，認為大風大浪已過，小河溝不會翻船。他們一再強調：「不要低估紫陽同志的政治手腕。」我承認，趙紫陽的政治手腕要較胡耀邦高明。但是，在政治較量上，最重要的還是實力。我在北京政治圈子裡滾了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在中央高層，改革派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胡耀邦有一大批人，說倒，一夜之間就倒了。胡的倒台，是改革派地位脆弱的明證。

趙紫陽的兩難境地

張：我認為守舊派的目的，是要改變路線，按他們的意志行事。如果趙紫陽繼續其改革路線，必遭守舊派的抵抗。在這種情況下，趙面臨兩難境地：硬把改革往下推，則必定觸怒守舊派，鬧不好，守舊派會把趙的班底連鍋端掉；或者是雙手投降，放棄改革。

對趙來說，較可能的選擇是：不斷試探，小心翼翼，走走停停，小打小鬧一番。可是，如此一來，不只是貽誤戰機，也拖住了整個民族前進的後腿。

汪：如果趙紫陽這樣做，就等於保守派的勝利。

社會矛盾日趨擴大

趙：我出國前對國內民間反應有意做了一番調查。結論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後，人民與執政者的矛盾擴大了。幾個現象特別耐人尋味：

▲中央派滕藤、彭佩雲進駐中國科大。他倆不敢住進學校，只住在省委招待所。兩人一進校門，學生們就喊：「鬼子進村了！」於是統統迴避。

▲北京天文台一位汽車司機違了規，交通警察攔住他要罰錢。知道他是北京天文台的司機後，警察問：「你們那裡有個方勵之嗎？」司機答：「是啊，剛來的。」警察跟他說：「你是方勵之一個單位的，不罰你了。」說完，警察就把這位司機放走了。你看，連司機都沾了方勵之挨批的光！

▲聽說劉賓雁去人民日報大樓時，人們不敢不向前跟他握手，因生怕別人譏笑與保守派站在一起。

▲中央印發的批判方勵之等人的材料，被個體戶搞到後大量翻印，到自由市場上散發，十分搶手。可見人們渴望學習之情。

一方面，當局軟硬兼施地進行壓制；另一方面，人民對被壓制者公開表示同情和支持。人們的畏懼感少多了。這與過去的政治運動形成了鮮明對照。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愈拉愈大，這個矛盾早晚會爆發出來。



方勵之深受人民愛戴。

▲留蘇派周光召被官派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代替民選院長盧嘉錫，科學院的群眾甚為不平。在三月份召開的物理學會上，「上面」指令選周光召為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可是，群眾就是不信邪，選了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黃昆為理事長，搞得周光召灰頭土臉。其實，周光召是頗有成就的物理學家，如果官方不硬行指定，說不定他可以選上理事長。群眾偏偏不選他，就是要和官方作對。

▲方勵之、劉賓雁接到不少明信片，上面寫着支持方、劉的話，有的還寫着罵胡喬木、鄧力群的話。寄明信片的大學生說：「我們寄

明信片的目的，是至少讓郵電局和公安局的人能聽到我們的心聲。」奇怪的是，方、劉能夠接到這些「反革命」明信片，公安局也未做追查。要是在前幾年，公安局一定要對這樣的明信片追究到底。

這些都說明，老百姓已經覺悟了，他們對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深惡痛絕。把方、劉、王開除出黨，把胡耀邦搞下台，觸發了大危機，不但沒有緩解社會矛盾，反而加深了原有的矛盾。這個矛盾總有一天爆發出來，群眾的怒氣一定要尋機發洩。一句話：早晚要出事。

暴風雨前的寧靜

劉：我有一個政治直覺：當前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中國的政治特點是：越寧靜，就越可

怕，越會出大事。

田：我看，當前「舞照跳，歌照唱」的假象以及方、劉、王處境尚可的情況，是由於高層領導忙着搶權，顧不得整下邊。保守派一旦得手，是不會放過大大小小的方勵之的。

汪：我不完全同意田的看法。我認為，這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不下去，主要是人民覺悟了，人民的畏懼感減少了。大家都反，就達到了「法不治眾」的效果。

陳：趙剛才說：「保守派這次做得很策略。」我不敢苟同此說。我的感覺是，共產黨這個老人已進入垂危階段，他已無能為力了，他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他的氣數快到了。

張：我擔心共產黨的這種「彌留期」會延續好多年，從而拖垮了我們整個民族。

第二部分：今後政局演變

●保守派力爭掌握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大權，而趙紫陽正在加緊制訂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十三大時，兩派都要拿出「真傢伙」。一般相信，十三大之前，甚至在老鄧辭世之前，中國政局會這樣不死不活地僵持下去。然而，鄧小平之後，什麼怪事都有可能發生。

●中國政局演變的總趨勢，是個性解放的總趨勢，這是人性與反人性的制度之間的基本矛盾所決定的。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的聞爭，不管多麼激烈，都不會從根本上逆轉中國政局的發展。因為，兩派的聞爭，乃從屬於上述基本矛盾。黨內任何一派，或者說，整個共產黨，都無法阻止人性解放的潮流。

保守派控制十三大人事權

陳：我聽高幹子弟的同學講，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大權都被保守派控制了。王震這個「大炮」已辭去高級黨校校長職務，跑到中央來，主持「中央整頓小組」的工作，實際上就是清理門戶。另一個保守派大將薄一波，則主持十三大代表的遴選及十三大人事的安排工作。如果這些消息屬實，則十三大的結果是極其令人悲觀的。

趙：王震這種老紅軍，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的典型代表。他們現代化的概念絲毫沒有，滿腦子裝着封建思想。可是，鄧小平偏偏就喜歡王震這種人，因為，王震對鄧小平極為愚忠。一九七七年初，鄧小平尚未復出，就是王震在華國鋒面前連連放炮，要求鄧出來工作。因此，鄧一直對王震存有感激之心。王震是個出名的炮筒子，這次對胡耀邦開炮，他是先鋒之一。學運起來之後，王震在高級黨校一次講話時，大罵學生「造反」，一句一個「他媽的」，一篇講話罵了一百多個「他媽的」。這種粗魯的土包子，却代表着「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怎麼有資格領導現代化運動？



炮筒子王震——
這樣的人也能領導四化？

汪：按道理說，趙紫陽應該是十三大籌備小組組長，因為，「籌備」就是等於抓實權。趙如果連這個權都沒抓過來，他應該不抱樂觀態度。

陳：聽說，王震、薄一波搞了好幾個黑名單，送到鄧小平那裡。有一個黑名單是要撤十幾個省市書記；另有一個黑名單是整二十三十個人，包括于光遠、李洪林和劉再復等。這些都屬於保守派「一月奪權」的範疇。後來，由於國內外反響太大，鄧小平沒有同意大搞，只同意中搞。

趙紫陽的最後出擊

汪：趙紫陽現在的工作重點是籌劃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趙紫陽成立了一個五個人小組，專門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這五個人是：

鮑同：趙紫陽辦公室負責人；

高尚全：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嚴家其：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蘇紹智：社科院馬列毛研究所所長；

陳一咨：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

這五個人日夜忙碌，以便早些拿出具體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據說，中心內容是政企分家和企業單位的黨政分家。另外，基層單位（縣以下單位）的人大代表可能開放競選。

趙紫陽的策略是：不做輿論宣傳，只拿出具體方案，然後讓老鄧拍板，十三大時在老鄧護駕下通過。使用這種策略，目的是避開保守派的注意。

趙紫陽的設想是：政治改革（企業黨政分家）往前跨一步——給經濟改革再造一個較好

人類社會是有很多死胡同的，共產黨的制度就是一個死胡同，我們應該承認這個死胡同。問題是，共產黨自己走進死胡同是它自己的事，他不應該強迫全國人民也跟着它一同進入死胡同。一切有良知的共產黨員，不管為了民族的前途，還是為了自己的前途，都要勇敢地回過頭來，走出這個死胡同。

的環境——城市經濟來一個發展——趙的班子取得更大政治資本——趙的班子加強內閣地位。

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是趙紫陽的最後出擊，也可視為最後的一場政治賭博。如果成功了，可以建起趙紫陽所期待的上述良性循環。如果碰上釘子，可能全盤皆輸。

趙將專任總書記

水：我始終認為，趙紫陽班子的策略是有問題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守舊派的力量。有時，身在其中反而不容易看清問題。我出國前也和趙的班子的某些人很熟悉，聽他們講得的確頭頭是道。但是，出來一段時間，從另外一個視野看看共產黨



嚴家其：政治改革方案設計者之一。

的問題，感覺就大不一樣了。我覺得，誰也救不了共產黨，至多是延長其壽命而已。

現在，如果我是趙紫陽，我會把權統統交出來，交給守舊派。因為，中國的情形是，只要你幹活，就肯定要犯錯，就肯定會讓你的政敵抓住把柄。更重要的是，在宏觀上，中國的經濟還處於滑坡的過程之中，尚未跌至谷底。無論誰在十三大上接總理，無論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通過與否，中國的經濟還會下滑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不如把總理一職、甚至總書記一職交給保守派，讓他們去搞。等到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趙便有資本說：「你們把經濟越搞越糟，還得請我回來收拾。」

張：我看趙不會這麼幹，他們的策略是寸土必爭。我剛剛接到國內消息：鄧小平的意思是讓趙紫陽在十三大正式接任總書記一職，這一點，保守派表面上似乎已經接受。但是，總理一職，目前各方尚未達成協議，總理之爭，還在繼續。

趙將出掌政改委

汪：我還接到一個消息：趙紫陽可能出任即將成立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趙紫陽已在本屆人大卸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一職，該職由留學捷克的李鐵映接任（

我最憂心當前這種半死不活的僵持狀態。整個民族讓共產黨拖得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成。我們要問一下：我們是否要等到鄧小平死了、共產黨出現大內開時，才做點事？要是鄧再活十年怎麼辦？我們再等他十年？要是鄧死了中共不出現大內開怎麼辦？我們不能讓共產黨的任何一派牽着走，我們要有自己的選擇。

中共元老、前統戰部長李維漢之子。

十三大之後，趙紫陽可能將主要精力移到政治體制改革上面去。至於經濟領域，他能佔領多少就佔領多少，佔領不住就只好放棄了。

惡鬪不可避免

鄭：聽了大家提供的信息，我覺得共產黨內的惡鬪永遠不能避免。十三大之前，如果分權不均，惡鬪可能隨時發生。我不排除十三大前各派攤牌的可能性。但總的看來，最大的可能性是各派僵持到十三大，甚至僵持到鄧小平辭世。鄧辭世時，形勢發展就難預料了，可能是非常戲劇化的。

人性解放趨勢不可遏止

陳：我聽了諸位的分析，認為，以黨內改

革派和保守派的鬪爭為主錢，來分析中國政局的演變，是狹隘的。

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性與反人性的專制制度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決定了中國政局演變的總趨勢——個性解放的總趨勢。黨內兩派，不管鬪爭多麼激烈，都不會從根本上逆轉中國政局的發展。因為，兩派的鬪爭，只是一個表象，它從屬於上述的基本矛盾。黨內任何一派，或者說，整個共產黨，都無法阻止人性解放的潮流。

劉：我基本同意陳的分析。我覺得，我們應該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觀察中國政局。我們應該看到，無論是黨內的改革派或保守派，都無法挽救共產黨。我聽過幾位研究歷史的學者說，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集團，都沒有像共產黨這麼腐敗，它是徹底地爛了，它已無自己新生的能力。改革派只不過把共產黨「死馬當活馬醫」罷了。

搞建築，就一定得建起死胡同。任何一層樓道，都有盲端。同理，人類社會是有很多死胡同的，共產黨的制度就是一個死胡同，我們應該承認這個死胡同。問題是，共產黨自己走進死胡同是它自己的事，他不應該強迫全國人民也跟着它一同進入死胡同。一切有良知的共產黨員，不管為了民族的前途，還是為了自己的前途，都要勇敢地回過頭來，走出這個死胡同。我本身就是一名共產黨員，我已決定走自

己的路。

鄭：一位唸生物化學的同學跟我講，以前說共產黨得了癌症。現在看來，它得的不是癌症，而是愛死症。癌症還有救活的希望，愛死症根本就沒救。

我最憂心當前這種半死不活的僵持狀態。整個民族讓共產黨拖得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成。我們要問一下：我們是否要等到鄧小平死了、共產黨出現大內開時，才做點事？要是鄧再活十年怎麼辦？我們再等他十年？要是鄧死了中共不出現大內開怎麼辦？我自己已經不耐煩了，我準備開始行動。

誰先按動按鈕

劉：值得提出的是，中共高層派別的劃分並非十分嚴格。共產黨內是不能充分交換觀點的，大家都防別人一手。因此，按觀點分派很困難。中國人人情大於王法，有時因為是老鄉，觀點不同也會傾向你。基於各種原因，今天，是同派的人，明天就可能翻臉。盡管如此，在思想觀念上大體分為保守派和改革派仍不失為一種便於分析的簡單分類法，只不過其人員經常變動罷了。

何為保守派？何為改革派？我有個比方：一個老媽媽患晚期癌症，已病入膏肓。她的大兒子主張保守治療，二兒子主張開刀。前者相當於保守派，後者則相當於改革派。但兩派的目的都是救自己的老媽。

中國的政權體系是一架專制機器，開關掌握在最高領導的手裡。誰先按動專制機器的按鈕至關重要。鄧小平辭世之前，估計不會有什麼大動。因為，總按鈕還操在老鄧手裡。老鄧一撒手，大家都去搶着按鈕，場面一定熱鬧。



共產黨的死胡同。

那時，就不可能再召開什麼類似罷除胡耀邦的「高層生活會」了，底下一定動手腳。

共產黨內的政治遊戲無任何規則可言，它的最高明策略是：你還沒上場，就把你打死。這是穩操勝券的策略。因此，鄧小平死後，各種人物一定秉承「先下手為強」的策略行事。

鄧死後大亂的可能性

水：不管誰下手，總要出師有名吧！如古代的「清君側」，「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蔡鐸的「護法」……老鄧一閉眼，大家搶按鈕時，用什麼旗號呢？

劉：旗號是很容易的。如「捍衛馬列」、

「捍衛毛澤東思想」，甚至可打着「實現四化」和「捍衛民主」的旗號。

國內很多人擔憂，鄧辭世之後，中國會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為什麼有這個擔憂呢？因為，不少對中國政局有長期思考的人認為，老一代的保守派們並不可怕，他們還有某種意識形態。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四十五左右的年輕軍官，他們是意識形態崩潰的一代，又是雄心勃勃的一代。據說，北京就有不少年輕軍官的沙龍，他們拉力量、造輿論，做各種準備，好像都在為鄧小平死亡的那一刻做準備。問題在於，中國沒有什麼機制來防止他們的突然動作。這個變數，在分析未來中國政局演變時，一定要考慮在內。

第三部分：民運當前任務

● 中國某些知識份子有一種「欲當奴才而不成」的心態，這種心態是「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基礎。民運的形勢現在是好的，民運最困難的時候應該是共產黨向民運人士招手的時候。要注意，一些人參加反抗運動，是出於對共產黨沒有重用他的痛恨。當權派一旦招手，這種人就會跳槽過去做官。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最困難的道路莫過於獨立的道路。搞民運的人，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是否有「受招安」的心態。民運的領導者，要有眼力省察出具有「被招安」心態的人，不能給這種人以重用。因為，這種人被當權者招安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出賣。因此，民運一定要把保持其獨立性放在首位。

● 民運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在理論、組織、財力諸方面做好應急準備，并對中國未來民主社會的藍圖做出粗線條的設計，在適當時機，向反對黨方向跨躍。民運的重要任務，是在中國建立一支新的獨立的政治力量。

要設計未來藍圖

鄧：民主運動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是不是有「受招安」的心態；第二，一旦國內出現大事變，有沒有應變的能力。

先談第一個問題。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精英現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進入了共產黨當權者的幕僚班子；一部分投入了民主運動。相比之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其處境要比進入幕僚班子的人艱難得多。進入幕僚班子的人已經得到當權者的承認和賞識，他們也比較滿意，感到報國有門，「士為知己者死」嘛！從事民運的人，一直在艱苦的環境中掙扎，他們所做的工作效果難以看出，一時難以被社會肯定，當然，更談不上被當權派所承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民運人士要艱苦作戰。

我認為，要說民運人士當前要做什麼準備的話，最重要的是在心理上要有長期作戰的準備，要默默地工作。

第二，民運要集中一批人，做理論上的工作。當務之急是，要對中國未來民主社會的藍圖作一個粗線條的設計。你只是喊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多元的口號不行，你必須向群眾講清楚，你所主張的未來民主社會大致是什麼樣子，才具有吸引力。具體一點說，你主張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什麼樣的市場經濟模式？政府扮演什麼樣的干預角色？這些都要大致勾劃一下。另外，也要有一個政治設計。你主張什麼樣的民主政府？是兩權分立？三權分立？二權半分立？四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如何劃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通過什麼模式解決？等等。在美國學經濟

的留學生有二百人，學政治學的也有近百人，要發動這批人進行藍圖設計。台灣留美學生也不少，也要動員這批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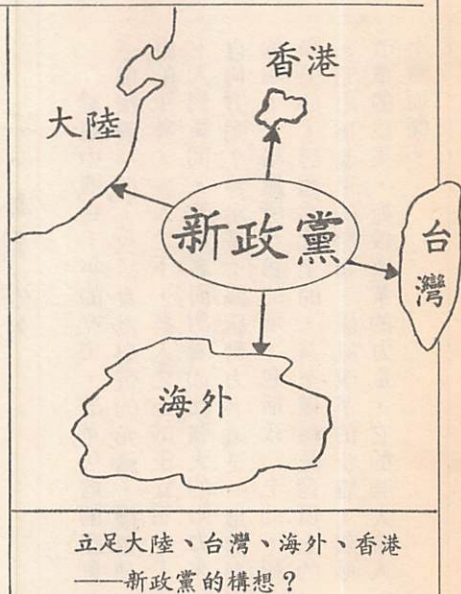
再有，民運還要向人們大致指出如何實現你的民主社會藍圖，給人們指出一條比較實際的道路。

藍圖和通向藍圖的道路，是未來新政黨黨綱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運現在就應着手準備，以便時機一旦成熟時，向正式反對黨的地位跳躍。

知識份子要保持獨立

張：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問題。我很贊成方勵之的一個觀點——知識份子一定要獨立。中國的知識份子太容易被當權者拉攏了。如果我們的知識份子有百分之六十是獨立的，是不與共產黨官方合作的，共產黨的政權就動搖了。

中國知識份子最難做的就是獨立。某些知識份子始終有一種「欲當奴才而不成」的心態，這種心態是「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基礎。就民運來說，當前的形勢是好的，民運最困難的時候應該是共產黨向民運人士招手的時候。那時，可能會導致民運的分裂。要注意，一些人參加反抗運動，是出於對共產黨沒有重用他的痛恨。當權者一旦招手，這種人就會跳槽過去做官。搞民運的人，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是否有「受招安」的心態。民運的領導人，要有眼力省察出具有「被招安」心態的人，不能給這種人以重用。因為，這種人被招安後，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出賣。將來，民運團體擴編為正式政黨時，要集中一批鐵了心不受招安的人。現在，民運要注意篩選出這批人。



一個大政黨架構的設想

田：我和不少台灣留學生有過接觸。我聽到過一種大政黨架構的設想，這個設想分為如下幾個部分：

第一，成立一個新黨，一個主張民主政治和聯邦制度的新黨，從全中國角度看，這個黨在政治上介於國共兩黨之間；

第二，在中國大陸，這個新黨相當於共產黨的反對黨。當然，目前尚不能合法存在；

第三，在台灣，這個新黨在政治上介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她既不同意國民黨的「三不政策」，也不同意民進黨的分離主義；

第四，這個新黨可在香港、日本、東南亞、美國、歐洲設立分支機構；在態勢上，形成「世界包圍大陸」之勢。

具體運作上，要等台灣開放黨禁。黨禁一開，在台灣便可立足。聽台灣同學講，介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政治力量是現成的，只是整合而已。台灣的一成立，海外的對應體便宣告成立。之後，海外與台灣、香港的該黨成員組團回大陸，迫使共產黨讓步，使該黨在大陸合

法化。也就是，用台灣、香港和海外的政治力量衝擊大陸。

這個構想是大了一些，但我感覺不失為一種比較現實的促進中國演變的方法。我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楊：國內很多學者的確希望海外多做點事，海外還是有作用的。國內很多學者也希望台灣國民黨改變僵化作法，對大陸多施加一些正面影響。我不明白國民黨為什麼那麼怕共產黨。現在國民黨若能主動跟共產黨談，大陸人民一定會歡迎的。通過這次反覆，大陸人民對共產黨更加失望了，他們在尋找一個新希望。剛才田提出的設想很有意思。我剛出國，不大了解海外情況。我要問的是：如果這個黨成立起來，並組團回大陸，國共兩黨會有何反應？

張：台灣很快就正式開放黨禁，黨禁一開，我想這個黨便可在台灣合法立足。至於組團到大陸，可能要費番周折，國民黨中保守派會阻撓。但是，國民黨中的開明派可能會贊許，因為，第三黨組團回大陸，至少可起到政治試探汽球的作用，對國民黨不無益處。至於共產黨，則處於兩難地位：接待也不是，拒絕也不是。這樣，政治遊戲就有的看了。

水：我同意民主運動要做好向反對黨升級的理論與組織準備，但要慎重行事。政黨推出過早，就如護理一個早產兒，很困難。

鄭：民主運動應該堅定信心，應該理直氣壯。這次國內形勢的大倒退，證明了中國之春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證明了中國之春的旗幟是正確的。從短程看，中國的情況是悲觀的；但從長程看，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的前途表示樂觀。（全文完）

一九八七年四月廿日整理

蛇口·成功的「試管」改革

(國內) 張綱

一、改革的試管

七十年代末的一天，香港招商局（中共駐港機構）的副董事長袁庚登上了蛇口半島。三十年前，他作為中共解放軍的一名團長，曾親自率兵「解放」了這塊土地。三十年過去了，這塊土地不但沒有因此得到新生，反而變得更加荒涼，與隔海相望、繁榮富足的香港形成鮮明的對照。迫于貧窮，誘于繁華，當地居民紛紛從這裡下水洩向「自由」，扔下一片光禿禿的海灘。面對這一幕，當年的團長感慨萬分，共產黨統治了這塊土地三十年，可是這裡的人民却要冒着生命危險逃向資本主義世界，這怎麼能夠不使這位當年以「解放者」自居的人羞愧？

舊地重遊，使袁庚心中萌生了一個強烈的信念：不改革，共產黨就沒有出路，中國就沒有出路。他要在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內，開闢一個改革的「試管」，中國的改革就從這裡開始。

一九七九年夏，中國大陸第一個經濟特區——招商局蛇口工業區誕生了。

八年來，蛇口的發展引起了國內各界人士的興趣，它可以說是中國沿海各類經濟特區、技術開發區中唯一成功的例子，其人均產值超過南韓和台灣，資金回收率超過香港，人均佔有外資超過亞洲任何一個加工出口區，世界上

最成功的台灣高雄加工出口區和南朝鮮的馬山加工出口區與它同齡時人均佔有外資還不及它的三分之一。一九八六年，在當地投資的外資企業已有一百二十多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產品出口，外匯平衡有餘。

然而，蛇口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完全由于它在經濟上的成功，說實話，這兩平方多公里彈丸之地，在中國經濟中所起的作用猶如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人們對它的關心更多地是由于它的各項改革的成功，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域裡各項改革都是配套進行的，這一點使它幸運地避免了深圳的悲劇。

蛇口工業區真正成了中國改革的「試管」，它的最大意義正在于此。

二、孤懸海外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改革失敗的悲劇一個跟着一個，包括身為皇帝的光緒，權傾朝野的王莽，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安石……人們要問，改革者面對着如此強大的阻力來自何方呢？答案是：傳統勢力。這是一堵無形的牆，一堵無所不包的牆，包括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思想文化上的，甚至僅僅是習慣上的。它阻擋改革的勢頭，擾亂改革的步驟，腐蝕改革的成果，扼殺改革的力量，它的強大令人不寒而慄。

蛇口的改革者明白，以蛇口的彈丸之地，要想戰勝這樣強大的傳統勢力，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與傳統的體制隔離，為自己創造一個理想的試驗環境，在白紙上畫新畫，先站穩腳跟，樹立一個榜樣，用榜樣的力量去推動國內的改革。于是，蛇口建區的一個最基本的方針被提出來了：孤懸海外。

孤懸海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擺脫對國內的依賴，將自己組進國際市場，成為國際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

首先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如何處理。「隔離」並不等於切斷一切經濟交往。但內地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要與它打交道，要麼你去適應它的體制，要麼讓它適應你的體制。實行第一種辦法的結果，無疑最終要被計劃經濟體制同化掉，被組進那張網而無法脫身。蛇口採取的是第二種方式，即：蛇口的企業向國內的訂貨，要國內按出口對待，與參加交易會的外商同等資格；蛇口產品銷往內地按進口處理。在與內地的經濟關係中，最難辦的是貨幣問題。蛇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人民幣自然是法定貨幣，可是人民幣又是內向型的貨幣，它的信貸體制、管理辦法、匯率、利率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而貨幣又是經濟活動的血液，任何經濟交往都離不開它。蛇口面臨的問題是，如果使用人民幣，不但無法擺脫內地經濟體制的制約，而且也無法使自己溶進世界市場。就像兩種血型的血不能相通一樣。蛇口要想獨立于內地經濟，必須換血。于是港幣介入了流通，蛇口的一切交易以港幣結算，海外投資按原幣經營，繞開人民幣的兌換和結算，與國內的交易絕大部分以港幣和外匯券支付。很

多人在參觀特區後往往對港幣介入流通，排斥人民幣的現象表示憤慨，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港幣的功績所在，可以說，若沒有港幣的介入，蛇口，甚至深圳，所有的經濟機器都無法運轉。而且正因為蛇口原幣經營的程度要遠遠超過深圳，所以它對國內經濟的依賴性也大大小於深圳。原幣經營的方式始於蛇口，這一方面是一個在極端特殊情況下的變通方法，但同時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傑出的變通創舉，它是蛇口得以「孤懸海外」的關鍵條件之一。

其次是與內地的行政關係。如果說經濟關係只是軟關係的話，那麼，政治關係則是硬關係了，這種硬關係的脫離比軟關係更加困難。蛇口仍是共產黨所管轄的地方，共產黨的行政機器縱向控制能力很強。每一個基層專職機構都要受上一級專職機構的領導。例如市公安局要受省公安廳的領導，市經委要受省經委的領導。特區建立之後，上面每一個專職機構派人來，下面就必然要設立一個相應的專職機構去應付他們，與他們打交道，其結果就必然要把內地的那套官僚體制照搬過來。深圳就是如此。其實深圳領導人在最初也曾提出過斬斷「一條」，實行「一塊塊」領導的建議，但是在舊行政體制的強大慣性面前，最終也沒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在蛇口工業區管理局（政府機構）成立之初，內地行政網那巨大的章魚爪在征服了深圳之後也向它伸過來。蛇口在行政上是深圳市下屬的一個區，上面每個專職機構來辦事都要找「對口」單位，管人事的，管保衛的，管統計的，管城建的，管衛生的，管教育的，管計劃生育的……鋪天蓋地。蛇口採取的辦法是上面每一個機構派人來，他們就刻一個圖章，兩個管理局長助理掌管十八個大印，專門應付上面來人，管人事的來了，他們找出人事局的

圖章，管計劃生育的來了，找出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圖章，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用圖章與上級行政網銜接，而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設置自己的管理機構和制訂自己的管理辦法。行政上擺脫內地框框的另一個麻煩是內聯企業帶來的。內地在特區的投資企業自然要聽從內地上級機構的領導，這樣就會自然而然把內地那套行政管理辦法帶進特區，深圳被內地行政體制同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內聯企業所佔比重太大。蛇口的改革者預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建區之初，就不歡迎內聯企業投資，將內聯企業拒之門外。所以，至今為止，內聯企業在蛇口所佔比重是最低的，不超過企業數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是不得不與內地合作的商業服務機構。為了與已經淪為內地行政體制翻版的深圳市保持相對獨立性，蛇口的改革者與深圳市的領導人進行了長期的鬭爭，以致使兩地關係極其緊張，「搞獨立王國」，「佔山為王」，「結黨拉派」等大帽子不斷壓來。但蛇口的改革者心裡明白，放棄獨立性就要被同化，同化就將意味着改革成果的喪失。

第三是如何擋住內地傳統思想的侵蝕。蛇口可以從海外引進錢，從海外引進物，但却不可能從海外引進人。當地絕大部分管理幹部還必須從內地調入。人是思想的載體，傳統的經營思想和管理方式，很容易隨着幹部的流入而帶進蛇口。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發生，蛇口在兩個環節上採取了措施，一是選拔幹部的環節，在內地選錄幹部（尤其是管理幹部）的首要條件就是有改革的意識和獻身精神，思想解放，其次要年輕（上限為四十五歲），年輕人樂於也易於接受新思想，不像老年人那樣思想容易僵化並產生慣性。二是培訓幹部，為此成立了「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內地招來的管理幹部

首先要在這裡集訓半年到一年，還要分批到香港接受「資本主義再教育」，培訓中心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還着重介紹國外的新思想。所以袁庚把培訓中心稱為與內地隔離的過濾網，每個幹部都要在這裡「洗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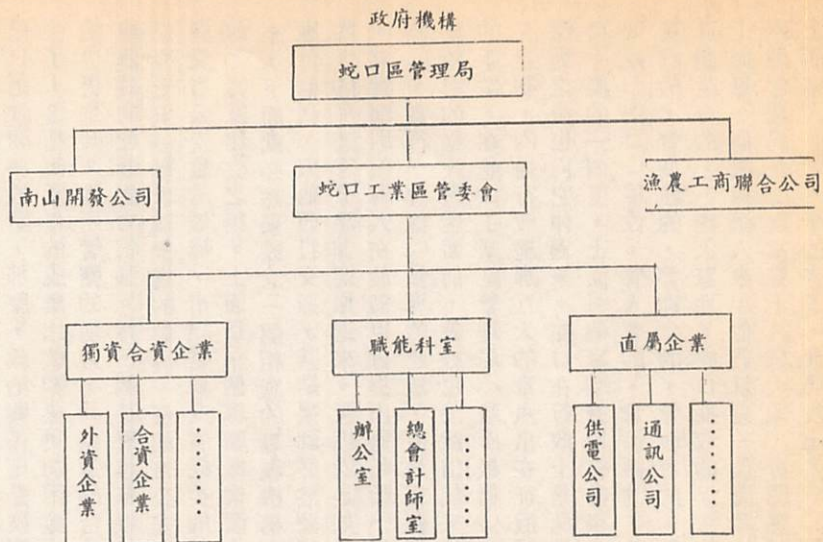
孤懸海外，擺脫內地，排斥內聯，防止同化等一系列作法，乍一聽起來似乎很狹隘，但只有真正理解傳統勢力的巨大危險性的改革者方能深深體會它的含意。當深圳已在舊的傳統勢力包圍中淪陷時，人們回過頭來看蛇口，才能體會到「孤懸海外」的基本決策是多麼英明。

三、權力來自人民

蛇口工業區的行政機構自建立以來經歷了較大的演變。在基礎設施的建設初期，由於區內尚無投資企業，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工業區的領導機構採取了「總指揮部」的半軍事化體制，下屬辦公室、財務室、計劃室。工業區用承包的方式與施工企業打交道。

基礎設施基本建成後，區內有了外資投資企業，「指揮部」式的行政機構已不適合，於是改成「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下面除轄有職能科室之外，還直轄十三個服務性企業，分別在供電、供水、運輸、倉儲、港口、貿易、旅遊、勞務、房地產、通訊等方面為外資企業服務，並回收資金（見下圖）。

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實際上相當於一個執行董事會，在蛇口區管理局成立之前，它甚至代理過政府職能，管理全區職工和家屬的生活和社會問題。蛇口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從管委會開始的。蛇口工業區既然是個孤懸海外的獨立王國，那麼它的管委會的權力是相當大



蛇口工業區行政管理圖示

的，為了使當權者不致被權力腐蝕，必須要有制衡的力量，蛇口的改革過程，就正是這種力量形成的過程。

制衡的力量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選票；二是輿論（輿論問題我們在下章討論）。選票意味着權力來自人民群眾，並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從一九八三年起，蛇口工業區管委會經選舉產生，兩年一任，在兩年之內還要進行一次信任投票，管委會成員中得不信任票達三分之二者，立即罷免。選舉制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

段，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次選舉有資格限制，參加者為所有的機關幹部，企業中經理助理以上管理人員和助理工程師以上的技術人員，以及大專學歷以上或具有同等學歷者。第一次選舉實際上是一次實驗，廣大工人群眾文化水平較低，為防止選票過於分散或出現極端現象，故採用了資格限制的穩妥措施。由此也可以看出蛇口改革者辦事頭腦清醒和有條不紊。管委會委員的候選人可以競選，發表施政綱領，以相對多數票當選。競選的形式，給予年輕人以嶄露頭角的機會，在第一次選舉中，三十六歲的喬勝利當選，成為工業區的二號人物。一九八四年的信任投票仍是有資格限制的，監督對象是兩委（包括黨委），結果是兩委成員所有的人信任票均過半，無人罷免，其中得信任票最低者為百分之五十八，最高者為袁庚（管委會主任兼黨委書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九八五年的第二任管委會選舉改為普選，所有企業職工（包括涉外企業）均有權參加投票。選舉程序改為差額復選制。管委會成員為九名，第一次投票選出十五名候選人，再進行第二次投票復決，以相對多數票當選。在選舉候選人階段可以自由競選。這次選舉無論從參與程度還是選票集中程度來說均可稱為成功。在兩個禮拜的選舉日中，競選會場每晚座無虛席，競選人輪流上台發表十五分鐘競選演說，然後回答選民自由提問。兩輪投票的選舉結果是前任管委會成員有三人落選，而新當選者均為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由於選舉形式令人心服口服，所以落選者也無怨言。其中一名落選者還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退職咨文，對選舉結果表示滿意，對自己的落選表示理解，同時對新任管委會提出希望。

這次選舉的成功是蛇口向政治民主化邁進

的一個里程碑，它的意義有三：第一、是使權力的交接程序化了，把爭權的鬭爭公開搬上了競選場，而限制了拍馬、鑽營等官場惡習；第二、是確立了當權者「權力來自人民」的觀念，防止了他們腐化和專制傾向；第三、培養了群眾參與政治、關心政治的民主意識，使他們真正從自己的選舉中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四、砸爛鐵交椅

管委會是由選舉產生的，那麼它的下屬各職能機構的負責人和直屬公司經理以及合營企業中分經理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尤其是直屬公司經理，他們也是國家財產的法人代表，而且獨立權力是相當大的，可以有權招聘解雇職工，調動留成資金並決定與外資的合營項目，這種權力也需要制衡、監督。在這個問題上，蛇口的改革者們曾產生過分歧。一種意見是所有這類中層幹部均由本單位群眾選舉產生，另一種意見是由管委會聘任任命，罷免解職。

第一種方法從國內個別企業的實踐中，可以看出其弊端在於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由於企業管理者的權力來自職工群眾，必然要對群眾負責，於是容易產生以發獎金、搞福利討好群眾，收買民心傾向，以致消費基金膨脹，不利於企業的積累和長遠發展。這一點從南斯拉夫的教訓中也可看出。

第二種方法雖然可以避免第一種方法的缺點，但由於權力是自上而下授予，又容易落入內地舊體制老套，造成基層幹部巴結上級，拍馬逢迎，弄虛作假，專權濫權的傾向。

經過反復的醞釀，蛇口工業區最終採取了兩者結合的方案。聘用制加群眾監督制。各科

室首腦和企業經理最終由管委會聘用任命，並由管委會解聘罷免，聘用期為兩年。另外在聘用期間也要進行一次群眾信任投票（與「兩委」信任投票同時進行），不信任票超過三分之二者，由管委會罷免。

這樣一來，每一位企業經理和部門首腦都要受到雙重監督。第一是來自上級的組織監督。由專職幹部管理部門——組織幹部處為每個經理建立政績檔案。每個經理每月要填一張表，簡要寫上他這個月幹了些什麼，採取了哪些改革措施，進度如何，下月的打算和計劃。然後再由組幹處在群眾中核實後存檔。兩年之後，二十四張表格一對比，就可以發現哪個是人才，哪個是庸才，碌碌無為者和違法亂紀者給予解聘或降職。第二是來自下層的群眾監督。職工群眾對於基層領導者的貪污腐化和專橫作風最反感，他們手中的選票可以限制這種傾向。

組織監督重點在於保證幹部的能力素質，並保證企業的經營方向；群眾監督在於保證幹部的品德素質，保證他們廉潔奉公和有民主作風。這兩種監督所起的作用正如袁庚所說：讓所有的企業經理戰戰兢兢地慎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精打細算人民財產的每一分錢，在兩年的任期中如履薄冰，不得忘乎所以。

蛇口的這種幹部體制改革砸爛了幹部終身制和鐵交椅，迫使他們能上能下。一九八四年的信任投票後，原四十二名經理主任級幹部中有十四人被免職。其中有的被降職，有的被送到「管理幹部培訓中心」回爐深造，等待重新聘用。一九八六年，「海上世界」旅遊中心的總經理，一方面由於群眾反映其作風專橫，大手大腳鋪張浪費，另一方面由於管委會發現該企業參與違法經營，因而遭到免職處分。經過幾個月的「待業」（「待業」期間和所有「待



蛇口工業區

業」職工一樣領取基本生活費）後，被旅遊公司招聘當一個普通司機。幹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在蛇口已習以為常。

幹部制度的改革同時也和工資改革相配套，與住房制度改革相配套，每級幹部領取相應級別工資，責任和利益掛鉤，降職隨後降薪。住房商品化，房租每平方米為零點九至一點一元，有多少錢住多少房，不講特權。

蛇口的幹部制度改革使當地的幹部廉潔成風，兢兢業業。通訊公司經理最後裝電話，房地產公司經理住普通職工房間，辦公室主任從不敢公車私用，管委會成員的子女入托入學照樣要交一筆基建費用。與深圳市那種「常委樓聳立，經理車橫行」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同時所有企業經理果真如履薄冰，工作拼命，常常連週末也要工作。以至經理的妻子們舉行座談會，大發牢騷，一致要求將星期六晚上法定為經理回家陪伴妻子的時間，不准過問公事。

幹部能上能下同時也消除了論資排輩的惡習，使年輕人、真才實學者得以身兼重任。蛇口的經理級幹部一九八五年平均年齡不到四十歲，百分之九十以上具有大專學歷和同等水平（管理幹部培訓中心畢業可相當於大專水平）。一九八五年，管委會以一萬二千元（含外匯）的重金從中國保險公司「買」來一位三十歲出頭的金融碩士研究生，一到蛇口立即委任為總會計師室主任，而身為蛇口第一批開發者元老的老的副主任也只能屈居其下。這位年輕人一上任就提出三項改革計劃，大刀闊斧果然身手不凡。

與深圳相比，蛇口的幹部能力素質明顯高出一籌。一九八六年一個亞洲加工出口代表團參觀蛇口和深圳，分別與當地幹部座談。蛇口大批年輕幹部外語流利，思維敏銳，提出各種

問題，在座談會上取明顯「攻勢」，咄咄逼人，給外賓留下深刻印象，連聲贊嘆；而深圳市的幹部却只能背誦他們唸了千百遍的情況介紹，面臨外賓的發問結結巴巴，漏洞百出，使陪同的領導幹部大為光火。最終使外賓得出「蛇口大有希望」的結論。

一個地區的興衰最終取決於人的素質，尤其是幹部（社會精英）的素質。然而，人是制度的產物，並受制度制約。好的制度可以聚集人才，挖掘人才，而差的制度可以埋沒人才，浪費人才。仍以深圳為例，雖有大批內地知識分子被特區建設所吸引來深圳，可由於舊的鐵交椅，能上不能下的制度延襲未改，以至使深圳相當部分的中層領導位置被文化水平很低的當地農村幹部先行占居。先占為主，論資排輩，使大批知識分子居于這批低質幹部的領導之下，因而他們大失所望，於是紛紛倒流回內地。由此可見幹部體制改革何等重要。

五、政治的透明度

選舉制的誕生雖然使廣大職工群眾有了參與政治，參與管理的權力，然而這種一年一度的參與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蛇口的改革者提出，為了使當權者的每一個決策都不發生重大失誤，必須提高政治的透明度，把決策由少數人的暗室密謀變成廣大群眾的眾評明議。

另外，如果政治不透明，決策不公開，群眾便無法了解當權者的思想觀點及活動內容，他們的投票就會成爲盲目的賭博，並易于被人操縱。爲此，作爲選舉制的一項配套措施，從一九八三年起，每月一次的「新聞發佈會」制度被確定下來了。管委會的主要負責人每月都要在一個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公佈工業區的一

些重大決策，並作適當解釋。新聞發佈會實際也是「群眾評議會」，所有職工或家屬均可自由參加，並向工業區管委會發言人提出所關心的問題，後者必須給予解答。會議上任何群眾都可以對管委會的決策或其主要負責人提出批評或建議。這種評議會延續至今已成爲慣例。

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作爲管委會發言人的袁庚在列舉某種不良傾向時點名嚴厲批評了一名幹部。「培訓中心」兩名教師打抱不平當場站起來反駁，批評袁庚以大棍子打人的專橫作風，並在爭論中憤然離座，拂袖而去。袁庚雖然堅持己見，但也高度贊揚這兩位教師敢于直言犯上，將問題公開化的精神，並當場提出政治透明化的主張。從此新聞發佈會上的爭論便習以爲常，有人後來建議干脆將它改成「群眾評議會」或「聽證會」。

袁庚有一次在新聞發佈會上向群眾演說道：投入工業區基礎設施的每一分錢都是你們的血汗，所以各位不能掉以輕心，要監督管委會當好家，把每一分錢用在需要的地方。有一次管委會打算在蛇口建一個街心花園並建雕像，但有人在會上提出質疑，雙方意見經過辯論相持不下，於是最後「蛇口通訊報」搞了一次民意測驗式的投票表決。這個方案被以多數票否決。理由是蛇口的資金還很困難，目前還不能奢侈浪費。還有一次，有人認爲蛇口「培訓中心」大樓的投資過高，經過辯論，認爲這個錢值得花的意見占了上風，於是工程按原計劃進行，但門口大廳的「過于奢侈的大吊燈」就沒有裝。

蛇口這種投資決策公開化、民主化的風氣與深圳形成鮮明對照。深圳市的「十大文明」建築以及數十幢高層大廈開始由領導人心血來潮信手批准，結果在金融大收縮時均成爲欲上

不能，欲罷不忍的鬍子工程，壓了數十億人民幣在磚縫裡，白白交了「學費」。

蛇口政治民主化的另一項配套措施是鼓勵利益團體和壓力團體的存在，如工會、青年團、各種讀書會、俱樂部等。由於蛇口以外資和合資企業爲主，所屬工會確實起到了利益團體的作用。代表國家利益的工業區管委會出于吸引外資的總政策，有時在工人與資方發生矛盾時不好出面，這時工會就要出面維護工人利益，與資方交涉。同時在國家利益與工人利益發生衝突時，工會也要代表工人與管委會交涉。例如在職工的工資問題、戶口問題、解雇後的保險問題上，工會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各類壓力團體中，作用最大同時也是最顯眼的是「企業家協會」或稱「企業管理俱樂部」。這個團體是由一群年輕經理于一九八三年組成的，每月聚會一次，交流思想，討論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問題，以及企業管理問題。管委會成員中也有該會會員。這個「協會」後來成了改革者的聚集之地，本文所提的「蛇口的改革者」大部分爲該會成員。它實際起到了改革參謀部的作用，很多重大的改革計劃都是在這裡醞釀、論證的，然後通過其在管委會的成員將這些計劃提到管委會會議上討論，並通過各種渠道去說服工業區最高領導人，如袁庚等，向其施加影響和壓力。以至袁庚後來贈送一項「壓力團體」的桂冠給它。

「企業家協會」的誕生也說明了蛇口企業家集團的誕生。在中國，企業家一向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們要麼從屬上級（當自上而下的任命時）以國家代表自居，壓抑群眾的眼前利益爲國家利益服務，要麼討好群眾（當自下而上選舉時），打着代表職工的旗幟，向國家要福利，挖企業長遠利益的牆腳。這兩種情況對



蛇口工人業餘生活豐富。圖為工人在晨跑

企業發展都不利，使它要麼沒有動力，要麼沒有積累。有人預言，民主化要有一個中產階級作為其基礎，中國真正的企業家集團的誕生將會起到中產階級的作用，成為民主化的領導核心。

所以有人評論說：「在內地是政治家領導企業，在蛇口是企業家領導政治」。

六、輿論自由

一九八四年，蛇口誕生了一份自稱「輿論獨立」的報紙「蛇口通訊報」。這份報紙開始僅以信息媒介為己任，後來迅速發展為蛇口政治評議的園地。

該報創辦不久，一個隱姓埋名的年青人向該報投了一篇點名批評袁庚的公開信，信中對蛇口一些重大決策和重大問題提出批評和建議。該報主編畢竟在內地生活多年，輿論界點名批評黨政領導人的事絕無僅有，風險極大，為了穩妥起見（儘管一再聲稱要發表，不管袁庚是否同意）將信交袁庚過目。袁庚只提筆建議將台頭的「袁庚先生」改成「袁庚同志」，便將信交還主編，並一再表示，今後凡這類點名批評他的文章，一律不必交他過目。所涉及的事實由主編核實並負責，發表權在主編。此信發表後，在蛇口引起震動，從此在報紙上公開批評工業區領導和評論時弊的文章非常普遍，輿論自由之風由此而生。這樣一來，蛇口的幹部頭上又多了一個監督：輿論監督。他們所犯的錯誤，可以在報紙上「見短」，群眾不滿可以寫信到報紙發泄。

蛇口建立以來，成為全國引人注目的模式，記者紛紛前來採訪，報紙上贊口不絕。但蛇口的領導見人總喜歡說蛇口的不足之處。一次

由于失職而造成火災，以及一次由于質量把關不嚴而造成碼頭塌方，袁庚曾主動要求記者「揭露陰暗面」，不要光說好的不說壞的。這種作風與深圳領導人那種只能聽好話不能聽批評，「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作風形成鮮明對照。其實讓人批評，勇于承認錯，在中國歷史上也歷來是一種美德，但不會使人威信降低，反而會使人威信提高。曹操馬驚踏青苗，削髮以示三軍，孔明用錯人而失街亭，降職以謝天下，廉頗誤解藺相如，登門負荆請罪……均傳為千古美談。蛇口袁庚鼓勵批評，反而威望倍增，而深圳梁湘不讓人批評，反而背後被人所指。蛇口提倡輿論自由，不怕批評，所以很少犯重大的決策錯誤，而深圳只能聽贊揚，不准批評（挑起深圳特區大論戰的「深圳向何處去」一文作者陳文鴻就遭到圍攻，深圳領導人還親自召見，勸其不要「損壞對外開放」），屢犯重大決策性錯誤，導致全面蕭條，一蹶不振。

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是相輔相成的，蛇口的經驗和深圳的教訓從正反兩方面說明了這一點。而輿論自由是民主化的最基本條件，沒有它，民主制會被架空，選舉制會被操縱。同時蛇口的實踐還證明，允許言論自由，天下並沒大亂，蛇口仍是全國最安定團結的地方，袁庚作為黨委書記仍得到最多的信任票，沒有人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而且蛇口的道德風尚，社會治安則是公認的典範，凡去過蛇口的人無不承認，有口皆碑。

七、公僕與執法者

蛇口的政府——蛇口管理局是一九八四年正式建立的。一方面是為了應付上級的「領導」，另一方面也是將原來壓在企業肩上的社會

負擔承接過去。

蛇口政府的誕生可謂中國「一怪」。在國內一向是政府「生」企業，可在蛇口是企業「生」政府。蛇口管理局的幹部都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派去的。在國內，企業是政府的傀儡，聽命於政府，可在蛇口，政府是企業的傀儡，聽命於企業。然而，無論是非如何評說，這一現象畢竟是一個重大的改革。

其實按西方人的觀點，政府是企業傀儡並無不妥，因為它要靠企業的稅來養活，在中國，由於企業是靠政府給錢生存的，所以人們習慣於企業聽命於政府。

正是由於蛇口管理局和蛇口工業區這種「顛倒」的主僕關係，所以管理局從建立一開始就把為企業服務作為其宗旨，想辦法解決企業職工的后顧之憂，將原來壓在企業身上的擔子接過去。另外還簡化各種手續，給企業以方便。

然而，這種主僕關係並不意味着政府管不了企業，讓其無法無天，這種管理是靠法制來實現的。例如「蛇口通訊報」曾報導過蛇口第一樁行政訴訟案就是在政府機構與企業之間進行的。

一九八五年初，蛇口管理局下屬建立了統計局，隨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公佈了「蛇口區統計工作獎懲條例」，規定逾期不交統計報表的企業將給予行政制裁。六月，蛇口工業區合營企業華美鋼廠（其大股東為蛇口工業區的投資者招商局）拒交報表，被處于凍結進口物資的行政處罰，但華美鋼廠仍不交報表，又被處以罰款。華美鋼廠不服，拒交罰款，結果統計局向法院起訴，華美鋼廠敗訴，只得向統計局認錯、認罰。

可以說，蛇口的改革恢復了政府的本來面目，既是公僕，又是執法者。

然而，蛇口的改革者對目前的這一政府並不滿意，從一九八五年起，他們就在醞釀民選政府的可能性，要使政府不但成為企業的公僕，而且成為居民的公僕。一九八五年二月，京津穗一批青年理論家應蛇口之邀，聚集在一起商討過蛇口區的政治設計藍圖，當時有人就提出普選地方政府，建立地方議會的方案。但由於蛇口政府的產生程序涉及到與深圳市政府的關係，所以需在條件成熟後才能解決。

八、民主制面臨考驗

從蛇口建立的第一天起，這個孤懸海外的半島就成了改革者心中的烏托邦，全國各地的改革有志之士懷着一腔熱血和美好的願望紛紛麇集于此，希望把他們心中理想的模式在這裡變為現實。於是，中國民主政治體制的雛型在這個「改革試管」中誕生了。

然而，這個「試管嬰兒」現在面臨着兩個嚴峻的考驗：

第一，蛇口的民主體制離開了這個「試管」能否生存，它能在內地推行嗎？

不可否認，民主制能夠在蛇口這個角落裡生根是有賴于蛇口得天獨厚的條件的。首先，這裡是一張白紙，它的居民絕大多數是「移民」，這有點類似於美國的情況。人們在白紙上很容易就可以畫出新畫，他們所要做的僅僅是與傳統勢力的「隔離」，防止污染。可是國內其它地區却不同，強大的傳統勢力已先入為主，佔據統治地位，改革者所面臨的不僅僅是「隔離」，而是首先要擊潰它，因此，正面衝突不可避免。民主思潮能否在這種正面衝突中站穩腳跟，實在是一大考驗。一九八七年初全國

政治體制改革的流產，為這一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另外，蛇口工業區背後有一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招商局作為後盾，這使它的財力得到保障，蛇口開發的基礎設施工程就是由招商局以它的信譽在香港借款一億五千萬港幣而開始的。經濟上的相對獨立可以保證政治上的獨立，使它得以實行孤懸海外，排斥內聯的基本政策。對比之下，深圳同樣也是一張白紙，可是由於財力沒有保障，不得不借助「內聯」，結果被內地「同化」，淪陷于傳統勢力之中。同時又正因為沒錢，才要靠流通聚集資金，大收「買路錢」，以致經濟結構失衡，造成大蕭條。

第二，蛇口的民主體制能否離開「開明領導人」的拐杖而繼續前進。

不可否認，在蛇口民主制的建立中，蛇口工業區的主要開創者和領導者袁庚個人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袁庚無論從個人品質還是從領導藝術上來說，均是國內罕見的人才。很多改革措施開始時即使在領導層內也受到很大阻力，常常是袁庚憑借他個人的威望和傑出的口才力排眾議才推行下去的。所以蛇口的民主制是從「開明專制」中過渡而來的，而至今仍留着開明政治的尾巴。如今，袁庚已過古稀之年，其退出政治舞台之日已指日可待。蛇口這個獨立王國也和任何一個共產黨王國一樣面臨着一個 Number One 身後的問題，儘管袁庚早在一九八五年起就有意地退出實際領導職務，但仍有人預言這一「蛇口總督」的王位之爭不可避免。權力交接的程序化是民主制的關鍵特徵之一。蛇口工業區能否渡過袁庚隱退後的接班危機，也是對它的民主制的一次重大考驗，蛇口工業區管委會的第三任選舉將在今年四月份舉行，人們將拭目以待。

中國經濟改革與民主展望

中國民聯常委 (美國普杰桑大學教授) 張俠

一、前言

自從毛澤東於七六年逝世，鄧小平於七九年掌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一連串令舉世矚目的改革。改革的範圍觸及社會每一層面，包括政治、經濟、甚至人際關係。政治體系現在享有毛澤東統治下罕見的穩定。中國人民現在過着較為自由的生活。但是，迄今最深遠的改革屬於經濟層面。根據「時代雜誌」報導，中國的改革無異於「第二次革命」，因為中國正在「馬克思主義邊緣」進行試驗。

中國的改革使西方產生了激動和期待，西方對中國的印象發生了變化。中國不再是一群狂熱、無所忌憚、無所不在的紅衛兵的天下。西方又開始恢復對中國的傳統印象，把它視為一個迷人的地方。美國一次民意測驗顯示，多至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竟不知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最近更有一次調查顯示，到中國旅行是美國人最大的願望，比上月球還要令人興奮！

美國人有這樣的熱情，當然源於他們的許多認定，其之一就是中國正轉變成資本主義國家。這一認定又激起另層含意更為深遠的臆測，即：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將導致中國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所謂有甲即有乙，有資本主義即有民主制度。我們承認，這種想法不算太牽強。縱觀歷史，多元的議會民主雖不是資本主義有意造成的，却也是資本主義發展下的一個令人愉快的產物。西歐自工業革命後的發展使

是很好的說明。

二、經濟改革

假定資本主義化確能導致民主，那麼我們要問中國的改革確曾導致中國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化嗎？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却是相當曖昧的。

總的說來，中國經濟自七九年後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化和私人企業化。現在的都市個人，可以經營小型私人企業。增加工人生產力的憑藉是工資的提高和紅利，而非意識型態的鼓舞。國營企業的經理在利潤分配上有更大的自主權。最近，中國更決定了成立證券和股票市場，並廢止「鐵飯碗」的制度，現在也有解雇工人的權利了。

迄今，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是在農村。在所謂「責任制」下，農民向國家租借土地，以官價為基準向政府出售定額農產品後，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出售其餘的產品。據稱，在八一年底，六百萬個農村生產單位已有百分之九十七點八參加了承包責任制。

除了以供需作用為特徵的市場機制已在農村運作，農民儘可多做多賺外，「責任制」的某些特點對未來也可能有許多影響。其一是一使用人權利」的概念。土地所有權為國家集體所有，但是透過承租制，農民有使用權。七九年時，承租者的使用權為三至五年，後來鑒於

短期租放，農民傾向濫墾濫種而又吝於施肥，導致土地逐漸貧瘠，乃將租期延長至十五年。何時「使用人的權利」才會變成事實上的所有權？

更為有趣的是，使用人的權利可以轉讓，農民可以將租約賣給其他人。這點方便再加上農民可以僱用幫手，使得某些農家有上百名的雇工，可謂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的一個相當奇特的現象。

以上所說的發展儘管有趣，但我們主要的問題是：是否這就意味着「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定義有兩個概念：其一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其二是政府在市場上盡量減少控制和干涉。

如果使用這一建議來評價中國七九年後的經濟改革，我們就必然得出如下結論：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前景並不樂觀。國家雖然在鄉村方面相當放手，却仍保留着對都市的控制和指導。特別是在主要工業部門，雖有「使用人權利」這一概念，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仍屬國家。其次，農民雖有使用人的權利，並可增減員工，但畢竟這些權利是由國家所賜。既然是國家所賜，國家當然也可收回。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很難說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資本主義式的。斷言改革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更是言之過早。換言之，認為中國現在趨向資本主義的說法，充其量也只是捕風捉影而已。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的，西方世界對

中國的期待是把問題過份簡單化了。也許，一個歷史分析的方法更有說服力。且讓我們看看現代民主國家是怎樣步上民主之途的。它們的經驗對中國很可能是極富啟發性的。

三、民主發展的歷史軌跡

各國走向民主的道路不盡相同。雖然每個國家各有其獨特的經驗，但這些經驗却可歸納為幾種類型。按照時間、地點、民主化的模式，可以區別為三種。它們是：自然演變的民主；法西斯主義演變的民主；獨裁政權演變的民主。

甲、自然演變的民主。這一類型的民主是歷史上最早見的，當今世界最穩定的民主國家皆屬自然演化型。它們是西歐及啟蒙運動的國家，如英、法、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美國、加拿大等。這些國家在十八、十九世紀時即完成了向民主的過渡。

在西歐，民主過程始於舊秩序的解體、新自由勢力的出現。舊秩序指的是羅馬公教，它控制歐洲道德和民政生活幾乎達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舊秩序的解體先發端於教會內的宗教革命，接着又是一種對新觀念的宣傳，終於使歐洲諸國脫離了教會的極權控制，而成為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那種革命性的新觀念就是政教分離，亦即，可以有一個不必附屬於教皇控制的正統而單獨的政治領域。

教會是傳統保守思想的大本營，它的解體為變化與革新提供了機會。此時所需要的是敢於向傳統政治宣戰，革那舊世界的新階級。工業革命正好產生了新的經濟階級：工商界的資產階級。

當這批新興的資產階級經濟地位逐漸穩固

，愈來愈無法忍受封建貴族階級的專制統治時，他們便要求參予政治事務。久而久之，蓬勃成長的資產階級便成功地從貴族統治階級層那裡擷取了政治權力。資產階級推翻君主體制需要思想基礎。既然君王認為他的權力是來自神授，他的子孫都蒙神恩統治一國，那麼資產階級對這種君主自命不凡的思想意識所做的必然反應和駁斥，只有宣傳全民意識一途。什麼是全民意識？全民意識即是代表所有人類宣稱他們都有基本的平等和自由權利，以及人類的尊嚴。這就是自由開明的民主。

不要以為當時反叛的資產階級真正相信政府是有全民統治的民主。他們使用民主一詞只是為推翻少數貴族統治做合理的辯解。事實上，資產階級一旦當權後，他們就不遺餘力地使政府成為他們的壟斷物。他們的方法就是把投票資格僅限於有財產的人，因而有效地把大部份老百姓排除在外。

有趣的是，資產階級隨後也成為全民意識的俘虜。凡人皆平等的原則一旦建立，不論因何理由被排斥在政治權力以外的團體，均可借用此一原則。任何限制公民權利而違反「人皆平等」原則的說詞，統統不能立足。因此，隨着接二連三的團體紛紛要求生而俱有的參政權利，公民權的定義逐漸擴大，更多的團體逐一加入政治實體。財產限制首先被取消，男性成年人都成了公民。接着取消了性別的限制，所有的女性成年人也可投票。最後，正如美國的情況一樣，公民權利擴展到整個先前被排斥在外的整個少數民族，例如黑人。到了這個階段「民治」的理想才算真正實現。

選舉權的獲得雖然緩慢而艱辛，最終畢竟是足堪告慰的喜事。在一個新團體進入政治體制前，它的成員已內含化了民主的規範與價值

，結果便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文化，一個全體成員共同分享、支持和遵守民主規範和價值的社會。這一所謂「公民文化」就是連結共和體制並使其穩定、壯大、持久的「黏合劑」。

從這一類型的民主過程中，我們可以找出一套必備條件，它們證明與後來的民主化有關。它們是：(1)具有傳統傾向的抗拒改革的封建貴族的解體；(2)工業化即經濟發展；(3)一個獨立的經濟階級即資產階級的興起；(4)民主思想理論的形成。這四個條件是民主化的重要先決條件。第(5)個條件是民主式的大眾文化；它雖然不必是產生民主的先決條件，却是一旦民主社會成立後使該社會穩定而持續發展的必備因素。



苦讀未悟

公序良俗

乙、由法西斯主義演變的民主
第二類國家通往民主之途較為曲折，它們

的出現也較慢，其民主的成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告完成。它們是西德、意大利和日本。

這三個國家不同於自然演變的民主國家，前者是由封建主義直接邁上民主的多元化之途，耐人尋味的是，法西斯本是民主的敵對，但它無意中却為民主創造了先決條件，因此也是自己的掘墓人。

我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是採取「機能作用」式的解釋的，亦即把法西斯主義看作一種加速工業化進程的政治運動。根據這一思想，法西斯主義乃是「反應式的民族主義」，是未開發國家對西方工業化先驅國家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威脅的政治反應。日本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公元一八五三至五四年，代表西方的美國海軍提督柏理打破了日本德川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要求日本對美國開放貿易，當時日本所處的危險不亞於中國。但是，日本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却顯然不同於中國。

日本很快就明白，西方的挑戰意味着對自己致命的威脅。德川幕府迅速答應了柏理的要求，隨後便與西方諸國訂立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在一八六二年和六三年，日本會更企圖與西方交鋒，但戰爭使日本當權者迅速體會到抵抗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他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內部，匆忙着手把日本建設為一個能防禦西方侵略的國家。要達到這一目標，日本必須工業化，而且愈快愈好。

日本的封建貴族中有一群人即薩摩與長門西南部族的領主和武士，他們認識到并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不過，先決條件是他們必須掌

握日本的政治命脈。於是在一八六八年他們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統治，導致了明治維新。

接着，廢除了過時的封建制度。一八六九至一八七六年間，又廢除了藩主及武士階級。同時，明治政府開始蓄意培植日本工業化。到了二十世紀初，日本已非常發達，以致於在一九〇四—〇五年間日俄戰爭中擊敗了帝俄的海軍。

法西斯主義使工業的迅速發展成為可能。明治政府蓄意建立一專制體制以加速工業化。當時的日本政府儘管有着代表民主的議會外衣，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制。無論是政黨或上下兩院，在一八八九年明治變法中均無實權。有權的是天皇及其身旁的幾位寡頭人物。一九二五年的和平維持法，對於整個日本社會，尤其是對勃興的社會主義勞工運動，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

法西斯式的明治政府雖然有效地進行專制統治，却也不知不覺地為民主政治奠定了許多先決條件。它使日本工業化，也創造了一個都市資產階級。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與工業間的關係十分緊密，但在經濟部門裡生產資料仍屬私人所有，它們集中在少數大財閥手中。所以日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形成了許多產生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先決條件。唯一的障礙就是法西斯式的明治政府，但是這個障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宣告結束。

意大利與德國的民主經驗亦與此相類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亦如日本一樣，有着加速工業化進程的功能。德國的情形稍為特殊，希特勒登台前，德國已相當工業化。納粹主義並沒有提供法西斯主義所提供的一些功能。德意兩國政府均因戰敗而垮台，因此唯一阻礙的實體也跟着消失。德意政府的失敗使它們在這兩

國人民心目中喪失了存在的價值，人民對極權主義已感到失望。既然有了工業化，有了一大批中產階級以及民主的意識和文化，戰後的意大利和西德也就很快順利地過渡到民主政治。日本的例子是，儘管有許多民主的先決條件，但缺少民主意識和文化，民主是由於美國的佔領從外部輸入的，所以今日日本的民主并不像意大利和西德的那樣完全。

丙、由專權過渡而來的民主。這一類國家民主形成的時間最晚，約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時完成。它們包括兩類國家：(1)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等新近民主化的國家；(2)正在民主化的國家，如台灣和南韓。西班牙和台灣可分別做為上述兩類的代表。

二十世紀初的西班牙，由於缺乏統一的意識形態，產生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班牙的工業革命產生一批中產階級，但也產生了一批熱衷於馬克思主義式的社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的城市無產階級。三十年代的西班牙特別混亂，先有一個共和政府（一九三一—三三年），接着是右翼保守派掌權（一九三三—三六年），再接着又出現了左翼人民陣線（一九三六—三九年）。後者引發了由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所領導的軍方所發動的保守叛亂，而導致三年內戰。佛朗哥及其保守軍方在一九三九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隨後統治了西班牙長達三十六年。在佛朗哥於七五年逝世前，西班牙的社會業已具備了民主的先決條件。它已經工業化、都市化，并擁有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而又關心國事的群眾。通往真正民主的唯一障礙就是佛朗哥政權。佛朗哥雖準備安排繼承人，却因指定的繼承人被暗殺而整個計劃宣告失敗，佛朗哥的軍事政權也隨之垮台。在一九七六年的選舉

中西班牙社會黨當政，終於使西班牙走上充份民主的道路。

台灣的情形是，國民黨政府正處於過渡到充份民主的過程中。國民黨領導階層最先提出許多尚無先例的改革，它取消了戒嚴法和禁止組黨的禁令。新聞檢查制度也有可能被取消。在八六年十二月全國性的選舉，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得票率達百分之二十三，在立法院中擁有十二席，國民大會中擁有十一席。

雖然這些改革的結果尚未確定，人們也擔心保守勢力的阻礙，但台灣的全面民主化只是時間問題。不僅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已具備，包括工業化的社會、相當人口數量的中等階級以及民主的大眾文化，而且有兩個因素便完全民主化成為必然。第一個因素是台灣依賴於同美

去年九月黨外迅速發展成新黨，使台灣政治轉型，圖為促進組黨說明會



國的貿易和國際間的貿易，這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順應世界輿論。第二個有利民主的因素是台灣所特有的，即國民黨的意識型態為民主政治創下了必備的條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一個「發展型的」意識型態。它認為國民黨的專權統治只是中國政府的過渡型式；國民黨政府的任務是創造民主國家先決條件如建設國家、發展經濟、教育人民、培養支持民主政治的群眾修養等。換言之，國民黨的「訓政」觀念是世界各國政府中所特有的。不像其他的專權政府，國民黨的意識型態肯定民主政府的優越性，期待着專權統治的結束。當民智已開，便是當權者放棄權力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民主展望

中國情況符合這三種模式嗎？答案相當清楚：上一世紀的中國與上述三種模式是不相一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第一類自然演化式民主的例子，它的經濟不像工業革命時的歐洲那樣能夠允許產生獨立的都市資產階級，它不是自由放任經濟。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屬於第二類型由法西斯主義過渡到民主的國家；共產黨不是法西斯黨，它的未來也不可能與民主國家交戰而品嚐失敗。中國也不符合第三類型的民主國家，因為它不是一個專權系統。

尤其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缺少民主政治的必備要件。中國是個落後的非工業化國家，八成以上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平均國民所得僅為三百三十美元。縱使果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到公元二千年時工業化目標能成功完成，也不能保證憑着工業化就足以促成民主。蘇聯不就是有工業化而無民主嗎？光工業化自身是不夠的；必須是有着私有制成份的工業化，才能產

生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成份——一個獨立的都市資產階級。

同時，中國缺少一個甚至更重要的先決條件。共產黨雖因文化大革命災難而蝕傷了統治的正統性，今天却無跡象顯示共產黨是處於解體的危機中。

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樂觀。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未來的中國將是什麼樣子？

預測未來，特別是預測像中國這樣的變幻莫測的國家，最好留給傻瓜或占卜先生去做。我只能大膽地做幾個可能猜測。中國的未來可能有下列三種情形，而愈是後者可能性愈大。它們是(1)領導階層轉變成明治維新式的專權獨斷；(2)類似蘇聯式的極權；(3)回到傳統帝王時代的中央專制。

設使第一種情形成為事實，中國共產黨內必須有一派人士當權，並從事一連串的能使極權的共產主義轉變為專權獨斷的制度上的改革。不論如何改革，一個重要的先決因素是：社會主義的解體必須允許財產私有以利於隨之而來的都市資產階級的形成。這等於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馬列主義思想。但這是不可能的。而且要到達這一地步，改革派必須願意而且能夠摧毀阻撓改革的當權派。

第二個較為可能的發展是，黨內陳雲那一派成功地駕乎改革派之上——即回到中國五十年代的蘇聯模式，七九年以來的改革被停止，中國又返回為中央控制的經濟系統。極權主義被制度化：黨為鞏固它的地位，變得愈發官僚和頑固。隨着時間的推移，黨完全忘却了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新世界的「崇高理想」。黨在缺乏制衡力量無需對他人負責的情況下，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它所尋求的只是私利和特權。

極權式的專制喪失了它的意識形態上的合理化——它淪為一個無目的的邪惡。就像蘇聯一樣，中國變成一個沒有理想的極權制度。

第三個可能是重現東方式的專制。傑出的德國社會科學家卡爾·韋特福吉「KARL WITTFOGEL」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一本書

「SATURDAY REVIEW」，該書曾被週末評論（SATURDAY REVIEW）譽為「政治理論和社會思想的轉折點」。書名

是「東方式的專制：絕對權力的比較研究」。簡單說，韋氏的主要論點就是：在某些社會裡

，生態環境的因素使專制統治成爲自我穩定、重複出現的現象。韋氏稱這種社會爲「水力文明」，即那兒因土地乾燥或半乾燥，農業主要

依賴水利工程而非天然雨水。

篇幅不允許我詳述韋氏的論證。我只能概括地說明一下他的主要論點。

(1) 生態的特點決定農耕方式。有雨水的地方產生出「水源農業」，亦即小型灌溉的農業。依賴雨水而非自然降雨的乾燥或半乾燥的地區，灌溉居民發展「水利農業」，那兒的農事

依賴大規模的灌溉水網和防洪設施，如運河、水庫、水壩、河堤等。

(2) 這些大規模的控水系統，需要協調和規劃。韋特福吉說：「只有大量的勞力，才能將大量的水引入渠道并加以控制。」這就需要一個發號施令的權威來加以協調、監督和領導——一個中央集權式的官僚管理國家就由此產生。

它好像在所有的人口之上，撒下了一個組織網。

(3) 控制這個精密組織網的人，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個很好的說明。禹不過是個水利工程的小官，却因卓越的治水技能，而登上帝王的寶座。

(4) 水利國家是特別嚴厲的專制國家，其嚴

厲程度超過歐洲封建時期的專制制度，國家強於社會。這種東方式的專制體系包括下列幾個特點：

甲、國家是最大的地主，對勞力有絕對控制權。除了有天災人禍，出現明顯的危機的時期之外，國家透過徭役制度，總可以招募它所需的勞力。

乙、政治權力缺乏有效的憲法上或法律上的監督。

丙、缺乏有效的社會制衡力量：亦即社會上沒有獨立的權力中心可以抵制國家的權力。

丁、專制不是採取帝王式的一人獨裁形式，便是如政治局那樣的均勢寡頭形式。但不論採取那一形式，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則是一樣的：那就是——一方面是絕對的支配，另一方面是絕對的服從。

按照韋特福吉的論點，像在中國那樣的社會裡，有着趨向專制的內在必然性。很久以前，馬克思曾評道，有一類社會不像其他社會那樣，不符合他的直線進步發展觀念。這類社會就是有着亞洲生產模式的那種社會，在那裡生產模式造成「特有停滯的」專制形式。在這樣的社會裡，專制成性的國家窒息了一切歷史的創造性和意志，而不能從事有意義的政治鬥爭。

那兒沒有階級鬥爭，沒有爲社會進步而進行的政治鬥爭，也沒有社會革命。列寧在一九〇六至〇七年間，也相當有預見地認識到下一次的蘇俄革命，不是引進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導致「亞洲式的復辟」——去了一個專制換上另一個專制。

下面是我所認爲的對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最有說服力的詮釋：七九年以來的改革構成返回專制水利農業國家的傳統輪廓。農村改革只是把農民改成佃農，共產黨變爲地主。現在的中

國雖不是皇帝式的一人獨裁，却是政治局的寡頭獨裁。儘管有自由化的改革，中國共產黨的國家仍然極爲類似傳統的水利國家，是個不受法律或人民制衡的專制體系。

以上所說的東西的含意是深深令人困擾不安的。中國真的是注定要再三重覆其東方式的專制形式嗎？難道等待着我們的只能是不斷重覆中央集權、腐化、解體、革命，然後又是新專制政體下的再次中央集權等等這一惡性循環嗎？

張俠文章後記

（中國之春編輯）林樵清

這篇文章是張俠教授於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稿。當她演講完了以後，我便前去問她：

「張俠，您既然認爲中國現時還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那您爲什麼還要加入中國民聯，還要爲民運奮鬥？」

「沒有條件，就要去創造條件；這事總得有人去做！」張俠灑脫的說。

我怔住了，凝視著她，努力不讓眼中的那片模糊成形。一位辛亥革命前女俠的身影從腦海中悚然掠過。

是的，沒有條件，就要去創造條件；有了條件，再去實現理想。這事總要有人去做才行。你不做，我不做，你盼我，我盼你，誰來做？

我再次凝望眼前這個曾在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慷慨陳詞的嬌小女子，突然發現，她的身影是那麼巨大！

談如何打破 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澳洲) 李樸實

革命是一種開放的形態，專制是一種閉塞的形態，惡性循環是專制運動程序的特徵，而不是革命運動程序的特徵。對專制主義的革命自身又淪為專制主義，說明這種革命主體本身存在着專制主義的因素。在中國歷史上革命普遍的特徵是，當它還是反抗現實專制政權時，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與反專制性；但當它占有現實政權實體以後，就逐漸淪落為專制主義的實體。一占有政權實體以後，革命或改革的力量好像就喪失了。作為革命主體的主動性，成了歷史政權結構中被動性而存在。在中國歷史上，政權的結構形式是一種最頑固的專制主義結構。革命不但沒有在根本上革掉這種專制主義結構，反而順應了這種結構，其結果必然導致專制——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

關於如何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問題，自然要涉及到這種革命自身存在的問題，只有這種革命自身存在問題的克服，才能打破惡性循環。因此，這種革命本身還應受到批判與革命，在它自身作為革命概念實體而存在時，它就會突破惡性循環的閉塞系統。我並不是因受康德與薩特的批判影響，而提倡對中國革命的批判，而是根據中國的歷史事實與中國依然潛在惡性循環的各種因素為基礎，而提倡這種對革命

的批判的。如以這種革命概念來判別，則在中國歷史上，除了辛亥革命以外，其它的所謂革命都是缺乏革命內涵的。從秦王朝到戊戌變法之前，並沒有發生過革命。中國教科書上稱謂的「革命」暴動與起義，本身屬於閉塞的專制主義概念惡性循環的一個環節。這種所謂的革命，在本質上完全被禁錮在閉塞的歷史見解之中，沒有任何突破與超越。說它們是革命只能指它們有些貌似，而非指它們實質上是革命。如果把一切想當奴隸主的奴隸造反當作革命，把強盜的行徑也算作革命，那麼革命的概念就會變得寬了，寬得像垃圾堆一樣了。在這種所謂的革命中在表象上出現新的認識範疇的，大概要算是太平天國革命了。然而在這場「革命」中，這種新的認識範疇並沒有實質意義，而是一種虛假表象。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民主的思想在天國的實際使用中喪失了其實際意義，連同它們的上帝都成為新王朝的工具，如果僅因為它失敗了就把革命桂冠捧給它，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的公式總結歷史上革命或反動的人物：凡是沒有成功的君主都是革命領袖，凡是成功的農民領袖都是反動君主。在中國，由于把革命的概念與語言進行肆意濫用與顛倒使用，造成了革命的概念與語言在很

多人的認識中，出現了混亂與模糊的現象，或出現革命概念喪失與顛倒的異化現象。好像被人們譽稱謂革命的思想，其實質所表現出的是一種惰性、閉塞反射性或名符其實的反動思想；而被指責為是反革命的思想往往是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在今天的中國，這些概念與語言的澄清也是一項必要的工作。

概念與語言的混亂，會對一切進步事業造成極大的妨礙。其實一些人們認為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是把非革命的狀態誤認為是革命狀態了。中國的社會往往會出現一種普遍地自欺欺人的現象，使整個社會出現一種迷惑人的狀態。對於革命的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只承認那被清王朝頑固派扼殺在搖籃裡的戊戌變法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三民主義革命是革命，至于共產黨的革命，由于它雜交着很多的因素，很難斷定其是革命還是復辟。戊戌變法發生在被殖民主義槍炮震撼的年代，覺醒了的中國知識份子階層搞這種變法的目的，內容與形式，是完全超越歷史閉塞系統的目的，內容與形式，是惡性循環的常規，使中國的政治與政體有實質性的改變。君主立憲在表象上是溫和與保守的，但它在實質上完全改變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與政體結構。這種觸及對象本質的變法是賦有革命意義的，辛亥革命更深刻地體現了這種新的革命認識範疇，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範疇，它完全屬於新的認識結構與形式，它與歷史上的認識範疇具有本質的差異，是一種超越歷史精神階序的精神展開與形式。這場革命在概念上是實質性的革命。至于革命政權以後在蔣介石的手中，又淪為以專制與獨裁為主要特徵的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革命的涵義，其造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新的認識範疇由于在革命過程中客觀的局限

性而沒在實質上獲得普遍展開。軍閥混戰、日本侵略、以及其他的動亂等客觀因素也逼使國民黨政權傾向了專制、獨裁的統治。近代革命的教訓表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就連革命也避免不了被介入歷史惡性循環的慣性。這種悲劇性的事實教訓是深刻的，它已造成一種對革命結果的懷疑與對革命抱着失望的普遍情緒。在此之際，貴刊發起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的討論是非常及時與必要的。

現在我們的祖國正處在痛苦之中，她正備嚐從沒有過的痛苦，她的舊的一切已處在全面、徹底崩潰的邊緣，然而新的還在探索與醞釀之中。作為她原來實體的舊的存在被毀滅，看來已無可挽救，但新的還只有那麼一點點預示，而這一點點預示還潛藏着令人擔憂的成份。從樂觀的態度來說，中國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好，因為歷史本質存在的結構，已在普遍的精神與情緒中，處於根本的動搖與否定之中。我們民族的「騰龍」已喪失了它神性的色彩，人們開始深刻地體會到自己處在絕對的異化之中，人們開始厭煩、否定作為歷史結構的對客觀的一切規定。在這種否定的極端中，人們甚至否認自身的客觀規定。現在中國的普遍精神中，真理已不復存在了，那一種被強權確定的真理，人們把它看作與荒謬同等存在。人們開始用顛倒的眼光去看待統治階級的作為，由於統治階級的作為也大多是採取顛倒事實的方法，所以這種顛倒的眼光往往能看得到事情的真相。真正不願作奴隸的意願，在今天的中國是普遍的現象，過去人們並不是甘願當奴隸，而是沒自覺到自己是奴隸。在過去人們其實是任人宰割的，但還高高興興地自以為是國家的主人。國歌的召喚「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其實真正能起來的有賴於這種自覺。在今天的中國，

歷史的結構依然佔據着客觀的現實，這種實體雖然大腦已死，但仍然能像植物那樣延續它的生命，這是由於中國的土壤仍可以不斷地給這種植物生存提供豐富的營養。在中國這塊土壤上，不僅一切有礙進步事業的現實得以形成，并且也給專制——革命——專制的惡性循環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中國是個古老的唯物主義故鄉，徹底的唯物主義是支配中國的主要意識形態，我們的祖宗即使在宗教信仰中，也不失為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義者。在今天中國的土壤仍然是過多的「肉膩味」與過少的靈性，這種令人噁心的



中國歷史上真正的革命——辛亥革命

上：武昌起義後，清政府官員狼狽逃命

右：革命軍在街頭為群眾剪辮子

「肉膩味」不克服，也就難以克服千篇一律的重覆。然而由於中國人民還普遍地缺少「肉」，要使精神能從「肉」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還是難以做到的。所以悲觀地來說，人們雖然自覺到自己是奴隸，但還沒有真正自覺到自己作為人的價值與權利的本質存在。一般人們對現實的不滿，不是因為這種現實對人本質的剝奪與人價值的踐踏，而是因為唯物的要求不能達到而造成的。中國人民普遍處在生活艱辛的狀態中，人們偏重於衣食之資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禁錮在肉中的存在是難自覺到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人本質價值的真正價值的，對這些人本的自覺無需對物質有一定程度的超越。只要大部分人都還處在徹底的唯物狀態，那麼現存徹底的唯物政權就可以繼續生存。如這種狀態始終不能得到克服，那麼現實政權崩潰了，頂替它存在的可能還是它的學生兄弟。所以要打破上述的惡性循環，就得克服人們純粹的唯物狀態，從精神本質上喚醒人們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作為人真正本質與價值的自覺。一個國家政治的形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部分人的素質，當然時代的精神最終還是決定的因素。但是時代的精神如要達到真正實現，就得賦有普遍精神的形式，為此，要打破上述惡性循環，就得徹底改變中華民族根本的氣質與人格結構，造就出大批賦有新認識結構的「新人」。在中國目前最急需的是精神革命，沒有精神從根本上得到解放與改觀，仍只注重外在形式或物質的一些滿足，那麼以往的老問題就會繼續延續下去。在目前中國，大部分人仍缺乏獨立、自主的精神，賦有慣性的依附性，所以任何政權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舞台上，仍然會多少表現出父權制的形式，即使是真正的革命與民主政權，也在所難免。如政權要避免再淪入惡性循

環的狀態，這種政權就得賦有真正民主的實質與一種自覺地自我批判的精神。如果它也像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權那樣，把自己絕對化，那麼淪入惡性循環是必然的。在中國歷史上，統治者實際推行的是統治實用主義，國家與人民在被作為統治工具與對象時才被作為一種實體，其實這種實體只表現統治的內容與形式，它們缺乏自身本質的內容與形式。要根除專制主義就得恢復國家與人民概念的實質，使國家與人民真正具有現代概念的實質。

造成中國歷史上革命—專制—革命惡性循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突破惡性循環的程序，根除專制主義在中國歷史舞台上的再度出現，就要從根本上克服造成專制主義死灰復燃的諸多因素。作為諸多因素之一的，是中國那種定型的思想與思想方法，中國式那種凝固了的思維方式，它本身是一種閉塞、循環的形式，這種形式與客觀上的專制主義本身是一種同質的存在，或是它的原因。現在中國普遍出現的思想危機，是幾十年來由外在權利灌入形式渠道的思想內容發生了信譽危機。那作為幾千年歷史成果的意識形態并沒出現普遍的危機，作為已受歷史鞏固了的這種意識形態完全是一種閉塞膚淺、怠性、反動與受動的意識形態，這種形態是一種繞圈子與混沌的狀態，在這種形態的前提下，任何新的價值滲入都有受到其異化為同質的可能。由於這種歷史的負載，所以中國在近百年內所引進的文化與道德并沒產生真正深刻的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式形態的異化與膚淺化。辛亥革命是懷有改變這種形態願望的，但迫于客觀的形勢與為了奪取政權，并没促使中國的普遍精神在實質上有所改變，這本來有待擁有現實政權的民主政府給這種改變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使普遍的精神

有潛移默化的機會，最後造成形態的變換。然而中後期的國民黨反而又鞏固了先期已受它動搖的歷史形態。共產黨在這方面也與國民黨有學生式的相似之處。作為實踐領域中心理學家利用人的辨證法大師—毛澤東，就是利用中國人普遍的心理特徵與意識形態的規律而進行一系列惡作劇的。在這場改革之前，共產黨統治一直是在加強、鞏固這種歷史形態，從本質上說，毛澤東統治時期，他把我們民族的劣根性發揚光大到了頂峰。他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五、六、七十年代能這樣幹，原因是自明的，有人說之所以這樣是中國人普遍存在着奴才氣質。是的，中國人的奴才氣質不僅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需要奴才的欲望也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中國人普遍缺乏自主性，但是懷有主他性與他主性，這種特徵有似于心理學中虐待與受虐待的心理特徵，在中國近代有不少政治家與學者深知中國人這些方面的缺陷，但他們大多并没將改變這種缺陷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且有不少人就像江湖上賣假藥的騙子那樣，利用人們無知等缺陷，用漂亮、美好的語言去籠絡、迷惑人們，以達到賣掉自己手中假藥的目的。在這一方面魯迅先生是偉大的，魯迅先生的可悲是那些打着擁護他的人們仍然在批發、零售被他掃進了垃圾堆的歷史陳舊，在某些方面說，魯迅先生提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仍然沒有解決，它們仍然是當前的重大問題。在現實中我們發現一些醫生因忌諱病人的忌，而不把病人的真正病因說出來，或他們雖說病人大腦患了遺傳的閉塞、怠性症，但為了使病人高興起見，接着連忙就說病人雖大腦有病，但他的脚是如何美好、健壯與能耐，偏偏我們的病人又大多是聽了歌頌腳的優越性以後，就忘記了大腦的痼疾，就有點飄飄然起來了。中國大多數

人的神經是承受不了「這孩子將來會死」這種必然性判斷的，所以為了避免挨打，使很多人採取了奉承或模稜兩可的態度。這種態度雖有客觀上的无可奈何，但畢竟是缺乏一種說實話的良心的，因為我們至少可以保持緘默與「嘿嘿」的魯迅之法。在中國那些肉麻歌頌統治者的行為是令人可惡的，那些沒有原則歌頌人民的語言是令人噁心的，這種有病的機體是值不得歌頌的。這種機體如不診治那麼機體的上面濕氣下滯，機體的下面濕氣上升，在這種相互的惡性循環作用下，機體會越來越腫脹不堪，造成中國中間的膨脹症是主要病因之一。說中國官僚階層是一腔臭水的臃腫症，大概不是誹謗。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有一定歷史意義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人們的活力，造就了對專制、閉塞系統進行突破的潛在生命力。如果改革派真正能以國家、民族、人民的實用主義為準則，克服了作為黨派與統治集團的狹隘性，將經濟改革連同政治改革向縱深方向發展，最終可能會產生一種觸及到本質變革的效果。這次學潮說明中國的進步份子，已自覺到人的本質與價值問題，它顯示出了我們民族的希望。它可以在這次學潮中獲取積極的因素造成更好的改革形勢，但是事實上却令人失望。

關於如何打破惡性循環問題會牽涉到造成惡性循環的原因，在中國這種原因是多方面的。這些多方面的原因在實際作用中是作為相互的整體而出現的，所以很難將某一方面擱置不論。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就得在現實中克服造成這種惡性循環的因素，就有賴於有一個克服它的現實政治環境。

對如何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方法，它還屬於探索的題目，它可能是一個永遠找不到答案的題目。

編者按：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受到整肅的王若望先生，是一位鐵骨錚錚，剛直不阿的知識份子。本刊今次選登王若望先生在五七年反右時期寫的兩篇雜論，有助於讀者們了解王若望的文格與人格，亦希望海外中國人對於這樣一個正直文人給予同方勵之、劉賓雁同樣的聲援與支持。

對於陳其通、馬寒水等四位同志的那篇「意見書」，已經被公認為阻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代表作。現在，如果再有什麼人發表類似的意見，那是很容易被察覺出來的。但是不能說阻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言論便從此消聲匿迹了。從一家獨鳴到百家爭鳴，從一家獨放到百花齊放，這是思想界的空前的大變革，有許多人仍是不理解這種變革，不能適應這種變革，還在採取步步設防的辦法，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訂出許多附帶條件，現在不妨把近十天來散見于報章雜誌上在字裏行間所透露出來的種種附帶條件開列於後：

「我們是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但是這是指學術性的問題，至于帶有政治性的問題，是不在爭鳴之列的。」

說這話的人是一位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他看到「爭鳴、齊放」的潮流要衝擊到他的管轄之下來了，勢必要天下大亂，他對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又缺乏信心，無力去和別人「爭鳴」，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先築起堤壩來，在堤上樹立一塊木牌，寫上四個大字：「莫談國事」，這樣來維持他那裏的太平局面。

「我們是不怕毒草的，香花只有與毒草比較之下，才能格外顯出它的香來。但是我們要儘量保護香花，鼓勵香花的出現，竭力避免生

步步設防

(國內) 王若望

出毒草，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這種議論粗看上去，好像是頗為正確的。可是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種議論背後的思想，仍然是屬於「步步設防」的考慮。首先，在自己腦袋裏存在着偏見，實不知文化科學中之香與毒，并不是用鼻子聞一聞或舌尖嚐一嚐那麼簡單，你所認為「毒」者，往往裏面包含着香；你所認為「香」者，往往僅僅適合你個人「偏」愛，也許是不足道的貨色；假如在自己腦袋裏先立下這個誓言：鼓勵香花，避免毒草，其結果，就會鼓勵了教條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東西；而排斥了被人埋沒了的但或許是真正好的東西。所以，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鼓勵」或「排斥」，往往會陷入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

「我們主張擴大題材，我們也不反對寫身邊瑣事和風花雪月，但是描寫工業化建設和農業合作化應該是我們寫作中的基調和主流。」這種議論把身邊瑣事、風花雪月和工業生產、農業合作化對立起來，他不知道通過身邊瑣事同樣可以表現工業建設或農業合作化；也不知道作者可以不寫工業建設或農業合作化，同樣能表現社會主義生活的基調。前面他所宣稱的「我們主張擴大題材……」和他後面的「規定」是矛盾的，或者說，前面的宣言不是他的本意，而後面規定的基調和主流才是他的宗旨。從全國範圍來看，不必規定什麼基調和主流，基調和主流是用創作來體現的，而不是預先規定了某種花作為基調和主流，就會產生表現基調和主流的作品。正如我們天天希望有史詩式的超越前輩的偉大作品出現，可是這樣的作品迄今還沒有出來是一樣的道理。預先規定什麼是基調和主流，是不必要的，弄得不好就會成為妨碍百花齊放的清規戒律。從一個刊物來看，預先規定了像他所要求的基調和主流同樣會排斥不屬於他的主「流」，但在藝術上却有一定成就的作品。所以這種「規定」也應該劃入「步步設防」之列。

「范瑞娟的『我的丈夫，我的密月』可以在新民報上登，但登在黨報上就不好了。」抱有這種看法的人，倒并不全是要給「百花齊放」設防的；但應該指出，這些同志只是在理論上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一遇到具體的文章和爭論就不自覺的回到陳其通、馬寒水等四位同志的「意見書」中去了。范瑞娟的那篇文章，是談她個人的「兒女情，家務事」的，在陳其通、馬寒水等四位同志的「意見書」中，其中有一條正是竭力排斥寫兒女情，家務事。為什麼新民報可以登，解放日報就不能登

呢？難道只許解放日報專談嚴肅的國家大事和黨的政策方針之類，不許談兒女情，家務事嗎？有人說：談戀愛就會遭到非難了。解放日報登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正好比孔夫子談戀愛，實在是太不調和了。解放日報給人的印象是「孔夫子」這話是有表揚的意思，其實也包含着批評在內，現在它索性來個「孔夫子談戀愛」打破讀者對它的「孔夫子」的老印象，這有何不可呢？有人說：「談兒女情，家務事我不反對，但對范瑞娟那種談法，我覺得不夠健康」。我認爲范文並沒有不健康的方面，退一步說，如果有不健康的方面，你就提出來批評好了，怎麼能埋怨黨報登這種文章呢？一方面擁護百花齊放，一方面又反對黨報刊登范瑞娟的文章，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這種矛盾怎麼產生的呢？深刻地挖掘下去，應該說，這些同志并不真正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他們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保留條件和防禦工事。

前些日子某刊物上還登了這樣一篇文章，其中說：「我們總不可以說，我們國家的全體人民的任務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而我們祖國工作的可以不管社會主義建設，把它拋開，也不爲它服務。至少，憲法不允許，我們搞文藝的也是公民，總不能搞憲法不允許的事。這是最低限度的界綫。」

本來，這句話是沒有錯的，凡我公民，一定同意。爭鳴也好，齊放也好，怎麼能夠超出憲法的範圍呢？但是，我們分析問題不應該光看文字表面的含義，還要看這句話的真正用意所在。搞文藝工作的不管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不對，但也不能說憲法不允許。請查憲法上那一條有這種規定呢？還有一種議論是說：「爭

鳴是好的，但要注意決不要違反憲法。試問：我們有什麼人在爭鳴中違反了憲法呢？我敢說：沒有。既然沒有，提出「不得違反憲法」的條例豈不是無的放矢嗎？依我看來，不僅是無的放矢，而且是一種預爲設防的手段。教條主義者的特長之一就是喜歡用一項莫須有的帽子先堵住別人的嘴，然後再抒發他那空洞無物的大道理。「不得違反憲法」論者，反映了他不信任我們的知識分子，他總是耽心人們會有什麼越軌行爲；其次反映了他自己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懷疑和恐懼，他看不到這一政策的積極作用，首先考慮到可能發生的消極的一面，而他所設想的消極的一面，不過是杞人憂天而已。「不得違憲」論者所以擎出憲法的旗幟來，我看是由于他在找尋種種藉口擋不住「爭鳴」的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之後，最後尋到的避難所。應該說：維護憲法對他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對放手「爭鳴」有點不甘心，才是他的實質。把這種論點列入「步步設防」之列應

該說并沒冤枉他。

目下圍繞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所展開的思想鬥爭，仍然是很激烈的。這一時期持反對論者的態度是不敢正面寫「意見書」，而是採取若隱若現的，前半截表示同意黨的方針，但在後半截又預先訂出若干保留項目來，他們的論點有一個共同的公式：我是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但是……問題就在這個「但是」裏面。一個新生的事物，當它一出現以後，一定會遭遇到各種反對和阻力。「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政策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新的創造，它遭遇到各種反對和阻礙是不足爲奇的，我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使它取得徹底的勝利。對這些步步設防的「但是」論者，應該及時批評他們的論點，指出他們所訂的戒律是多餘的。我這裏所拈拾幾條「論點」，不能做到羅掘無遺，只是提供幾個例證罷了。

（原載一九五七年四月廿六日文滙報）

●特稿專欄●

釋「落後分子」

（國內）王若望

一個人要是背上「落後分子」的稱號，那滋味實在不好受。周圍的同事們看不起，連老朋友見面也不敢多交談。因老朋友喜歡與落後分子接觸，物以類聚，不久也有被劃入「落後分子」範疇的危險。被人誤會了，還可以發表聲明，要求組織核對事實：唯有被稱爲「落後分子」者，却無法聲明。我還從來沒遇到過有

人向組織上去聲明，說：「我并非落後分子呀！」因「落後份子」這頂帽子可大可小，能伸能縮，沒有具體事實，單憑印象也可以扣得上去，要想摘下來却頗不容易。

有些地方，「落後份子」的命運更加糟，當他工作上有了進步的表現，但他還是摘不下「落後」的帽子，據說因爲他的進步原來是從

個人出發，動機不純；或者說：「他是個人突出，恐怕是爲的評級多評上一級。」總而言之，這頂帽子真弄得人有點走頭無路，哭笑不得，永不能翻身之感。

在我們黨內有一些同志固定地，絕對地了解「落後分子」的含義，並且在群眾工作中喜歡採取簡單化的排隊方法，把群眾分爲積極分子，落後分子，中間分子的這種做法，已經成爲培養宗派主義，造成群眾對黨隔閡的根源之一。

群眾有沒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後的呢？當然是有的。但先進和落後只是相對的說法。何謂落後？當張同志對某個問題，某項工作，還沒有完全懂得，還沒有自覺地去解決它；而另外一位王同志對這個問題，這項工作却懂得了，而且能夠解決它，那麼在這個問題上，在這項工作中，王同志比張同志先進，張同志就顯得落後了。可是在另外的問題或工作中，也許王同志是落後了，而張同志是先進的。所以不能因爲某個人在這件事上表現出落後，就判定他其它的一切都落後了。應該承認：每個人都有「落後」的時候，每個人都有積極的因素。假使不承認每個人有落後的東西（包括共產黨員在內），那麼，共產黨員就可以不必整風，也不需要批評和自我批評了；假使不承認

教育



每個人身上都有積極因素，那麼，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勢必成爲一句空話。那些簡單地把一部分人們排入落後分子的名單中，正是由於他們看不到這些人身上的積極因素所致。

先進和落後的說法不僅是「相對」的，而且隨時隨地在相互轉化，每時每刻都處在變動之中。有些幹部在反胡風鬥爭中是積極的，但當他看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却變得縮手縮腳，畏首畏尾，落後了；某個農民對農業合作化的看法是落後的，當社會主義高潮到來時，他也會變得積極起來。所以絕對不能把人看死，看做固定不變。我們寫小說的人，最要注意的就是能夠表現出人們的複雜性，描寫出人物的變化和成長，最忌簡單化，公式化。但我們許多做黨的工作或青年團工作的同志，以及人事科，却習慣於按照公式去理解人，按照一張三個框框的簡單表格去私定終身。

這樣公式化簡單化的理解人物，已經在人民中間無形中豎起了三道牆壁。而主觀主義的作風又在人民和黨之間加上了一道鐵絲網。如果此人確實有落後之處，給他扣頂落後分子的帽子尚可原諒。問題是：列入先進分子一欄中的人，未必先進；列入落後分子一欄中的人，未必落後。在官僚主義者眼中，好發表尖銳意見者，往往被目爲落後；在驕傲自滿的功臣眼中，喜歡奉承，扯順風旗者往往被目爲先進。于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邪氣上升，正氣下降。

有的同志會說：我們指的先進，落後，是指政治上的先進和落後，在群眾中間確實有一部分政治上是較好的，難道我們今後就一律稱之爲「積極分子」嗎？

我們不能單單以政治的標準來衡量先進和落後，要知道：政治總是和每個時期各種具體

工作結合着的，否則便成了空頭政治。由於過去許多同志單以這種空頭政治作爲落後和先進的標準，結果就開出了這樣的笑話：多參加開會和發言積極出來的「積極分子」，在生產上可以是經常完不成定額，不遵守勞動紀律的人。由於過去許多同志單以政治標準去衡量先進和落後，還產生了這麼一個心照不宣的公式：凡黨員必先進；群眾比起黨員來必落後。這樣就給許多黨員同志一種高視闊步的優越感，使他們看不起群眾。我並不反對以政治條件作爲衡量先進和落後的主要標準，但我們反對從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待政治表現，比如某人開會積極發言，學習從來不缺席，上級叫做什麼就做什么，這種積極分子是容易被發現的；但還有這樣一種人，他的政治進步並不表現在表面上，他埋頭苦幹，熱愛他的事業，不善于寫工作總結報告成績，思想不通就說思想不通；他每走一步是比較艱難的，可是他只要進一步，卻從來不動搖和後悔。這種人也是積極分子。可是許多同志蒙着眼睛看不到，因爲這種積極分子，只有在群眾工作深入的情況下才會被發現，而形式主義的理解「政治」表現也會阻礙他們了解這種人的真實價值。

老實說，那些簡單化、絕對化地了解落後分子，對待落後分子的同志，他們自己就夠「落後」的了，因爲他們的認識大大落後於現實，看不到群眾在前進，在變化，還是根據三年前填的一張「老提綱」看待群眾，這是不是落後呢？這也證明了：把別人納入落後份子名單的先進幹部在這個問題上也會表現出落後來呢！這種「落後」歸根結底是由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存在著矛盾所引起的。這并不值得奇怪，正如群眾中也有落後思想一樣不值得奇怪。

在毛澤東同志的「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曾談到：「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後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幹，并憑藉這批骨幹分子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這裏毛澤東同志連用了兩個「比較」，就說明這是比較而言，積極和落後不過是相對的說法。他說這段話的着

●向海峽兩岸建言●

學生運動感言

——重提「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曲元

一九八六年，大陸學生運動，從星火點點發展成燎原之勢，所提的口號也逐漸由生活、待遇、學習……等枝節集中到要求政治民主上來。共產黨統治集團隱忍了一個時期，終於還是宣布了禁令。官方輿論勸諭學生回到課堂去，別受壞人利用。又說只有團結安定，才可使國家前進。未來的一九八七年會出現什麼情況，實難預料。

學生運動，或稱「學潮」，絕不是「受壞人利用」，而是國家和社會上存在某些較嚴重的問題長期不得解決而引發的。自從晚清中國被列強欺侮以來，我國的學生運動便不斷出現。可以說，每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都起到促進社會的作用。近例如：「五四」產生了新文化；「一二九」掀起抗日高潮；一九四六年起要求統一的浪潮等。

回想四十年前，老一代的青年學生，冒着

重點却在于「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後分子」。凡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那裏的所謂「落後分子」會越來越少，群眾的情緒越來越高，黨與群眾的關係也一定是越來越好。可是現在許多地方的做法是相反，領導者圈定了某些人是落後分子以後，并不去爭取，也不去提高，把他們固定在原來的不光榮的位置上，對他們另眼相看，或是瞪着眼搜集某人的落

被捕被殺的危險，上街要求「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那時，蔣介石的官方輿論也說：「學生是被壞人利用了」，也說：「學生的權利是好好地讀書，充實自己，用學問救國。上街遊行只會製造社會混亂……」。而處在地下黨的共產黨則大力支持學生運動。上面提到的那兩句口號，就是他們通過當時學生運動提出的要求。正是這兩句非常合理的、代表進步的革命口號，贏得了全中國各階層和海外僑胞的響應，也教育了大多數國民黨軍官兵，不再為蔣家政權賣命和當他們殘害百姓的工具，極為有效地促成共產黨一統大陸。

但是，光陰過去了整整四十年，這兩句口號沒有半點兌現。而為了鞏固少數人的特權私利，新統治集團抓棍子和反民主的措施，竟比前者更甚。這就是今日學生運動興起的焦點所在。

後資料，來作為他的裁判的例證。他們的這種做法也影響了一部分群眾，使這些群眾喜歡在背後諷言諷語，找到了所謂落後分子就挖苦幾句。

這種做法，再不改變，那是會把黨引到與群眾越離越遠的地步！

（原載一九五七年五月廿日文匯報）

這些反對學生運動的人，其中有些可能就是四十年前的學運首領；當年他們躲過了統治者的血腥鎮壓，然而今日他們却要動用他們的槍桿子來對付不聽話的學生。

願新一代的同學們吸取前輩的經驗，在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時候，不可忽視「軍隊國家化」。因為一切獨裁專政者的「無上權威」，全靠軍隊來維持。如果聽任名為「人民解放軍」的廣大官兵，繼續忠實地當某一黨一派的警衛，則要求民主的學生運動，終將遭受鎮壓；就算統治集團一時「開明」，權宜恩賜有限民主，但他們也能隨時復辟專制。

中國共產黨人迷信毛澤東的指示：「槍桿子出政權」。不過，古今中外軍事專制的史實都證明了以黨私有軍隊建立起的政府，必然使黨內派系也利用武力奪權的內戰。所以，他們追求的團結安定，永遠是暫時的虛假表象；他們把社會動亂歸咎於學生運動是栽贓的欺人之談！

祇有「軍隊國家化」，才能徹底終止我國封建專制殘餘的一黨獨裁制度，保證建立多元的政治民主化，使目前以經濟改革為首的一切社會改革運動正常順利地進行，從而促進祖國現代化的早日實現。

如何貫徹「在國外也要遵守中國法律」的建議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項守法

國內方、劉、王被處置，留美同學楊巍和非學生薛德之被捕，在此地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響。筆者可不是那種有膽識、有骨氣、敢做敢當的人，不要說在那千人公開信上簽名，就是連討論這一類事的學生集會，也退避三舍，假裝不知道。

國內官方的宣傳媒介一再聲稱，擁護黨中央做法的占留學生中絕大多數，簽名反對者只是極少數××的人，(「××」代表不同權威人士在不同場合下的不同用語，諸如「有問題」，「和中國之春同一立場」，……)。我看過之後，心裡著實慶幸有先見之明。我是當然屬於「擁護」者之列，以後回家，省了不少麻煩，將來自己分配，妻升級，子女上學都不會受影響。但在夜深人靜之時，想到自己被列入「擁護」者之列，總覺得有點倒胃。所以白天見了人，就想躲著走。被強奸者並不丟人，但一次次地被辱弄，還要滿臉陪笑點頭稱是，吃人血饅頭……，所以上廁所也不敢照鏡子。前幾天我在圖書館，偶然看到了一本總第四十六期「中國之春」。因為領館主管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官員馬敬平，最近在我校痛罵了一頓「中春」王炳章，我一看四下沒中國人，就好奇地偷着翻了翻，那上邊有不少事還真說得挺合我心意，越看越仔細，這一下不要緊，以後好幾天夜裡睡不着覺，全是讓「中春」記者周純青害的。他報導了國家教委(這是個新衙門，我前年出國時好像還沒聽說過)關於逮捕楊巍的

文件。

我想可能是這位記者弄錯了，楊巍是公安局抓的，「爲什麼抓」只有公安局才有責任向大家公佈，教委作爲一個非司法機關，手伸的未免長了一點。這是小事，主要怕的是這個文件的內容，短短幾句話，除去修飾語「反動」以外，該犯罪行是貼標語，貼大字報(這就是自一九五七年以來，中共中央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屬於無產階級自由的範疇。筆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也曾因貼大字報不積極，被「幫助」過好幾次)。至於說他煽動學生鬧事，這就奇了。全國幾十個城市，上百所學校，相差沒幾日，都有群眾運動，他楊巍有這麼大能力？再說運動的主體是大學學生們，也並非無識之輩，豈是他楊巍說幾句空話，就能把那麼多人騙上街的。若那麼好騙，當局早就一手搖着糖棒棒，一手舉着狼牙棒，把他們全框在校園裡了。楊巍最多就是遊行隊伍中的一分子而已。至於「反動」一詞，在中共手中，變化無窮，是隨時間，隨空間，隨具體事物而異的。法寶祭起，所向無敵，比起秦檜的「莫須有」還好多了。鄧小平、彭真、徐向前、李先念諸老比我們體會得多，你們是既打過別人，又挨過別人的打，是非心中有數。如當年批彭真時，批了四家店，砸了北京黑市委不算，還由暢觀樓、前十條直搗督察冀，把個「模範根據地」說成了黑地獄。最後直追到傅懋功跪在奉系軍閥的天津法庭上叩頭如搗蒜，哭訴「自己是機

會主義份子，不是真的共產黨」，最後自首變節，登報脫黨，保住了一條×命。當日共產黨內如此對待開國重臣，實在讓人不平。今日傳公，重掌神器，也應將心比心才好。「反動」二字，太難琢磨，讓人無所措手足。前不久，方勵之作爲一位教師，他講的不過是讓學生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支持改革，要有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宣傳一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等就被列爲壞分子；但這些話正是前幾年黨要我們說的話，是又紅又專的紅的具體內容。又如，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總書記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關於黨的「群眾路線」的論述。講的全面而精闢。他告誡全黨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共產黨人是群眾中的一部份，而不是高居於群眾之上的老爺。但我今天若再重覆這些，就反動了，輕者說我反對萬里(因他和方教授辯論中有一個震驚中外的著名命題，「民主是黨給的，不是群眾自己爭取的」)，重者就是反黨，攻擊黨的政策，因爲現在領導不願群眾多嘴多舌，即使你喊口號支持「鄧小平把改革進行到底」，也讓領導聽着不對味。又如：在一九五七年時，工人說錯了話沒關係，工人中只正面教育，不抓右派，那次專抓學生。例如說胡風不是反革命的劉奇弟，說北京大學圖書館正中不應僅擺羅蒙諾索夫的頭像，也應擺個中國學者如祖沖之的張錫昆，都因言獲罪，被開除學籍，當衆逮捕，投入監獄。黨這次脾氣變了，薛

德之是因混入學生隊伍，冒充學生，進入學生宿舍而獲罪，這才讓人體會出味來，憲法中規定的「遊行示威」是學生的專利，而不是全民的權利。試問，現在我要再講五四運動的經驗，「學生應走向社會，宣傳工農」會怎樣？所以對一個想苟安求生的人，也不得不關心一下「反動和革命」的每日行情，以免出軌。馬敬平領事最近講，「你們現在雖然在美國，也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我知道他這是為我們好，省得回去給中央調查部、總參謀部三部、國家安全部、公安部、公安局、本單位黨委添麻煩，對自己的前途也不利。但做起來有些困難，一是，中國的「法」變化太快，「反動和革命」的概念發展神速，而且是常常一百八十度的

● 導 ●

郭城加油俱樂部成立

義無反顧 向南進發

● 本刊編輯部

各地華人為擴大支持郭城民主長跑的壯舉，已於日前成立「郭城加油俱樂部」(KUO CHEN SUPPORT CLUB)，並將由此俱樂部印發「郭城通訊」(COMMUNICATION OF THE KUO CHEN SUPPORT CLUB)。該俱樂部負責人鄭文杰呼籲各界關心中國大陸人權、自由、民主的中美人士踴躍參加該俱樂部活動，也歡迎各界寫信索取通訊。俾各界人士對郭城長跑有更詳細的了解。

鄭文杰表示，郭城於行程中曾遭遇各種困難。他曾於三月底接受華府名醫的診斷，確診為腿部肌肉嚴重拉傷。經過三週的調養，目前雖已無大礙，但前途彌艱是可以想見的。

轉着變；二是，法律規定有的沒說透，如非學生不可進學生宿舍，不可遊行，……；三是，在國外主要靠「人民日報」海外版了解領導意圖，但不同領導人說的話不是一個基調，和馬列毛等經典大師的理論也不完全一致，我不知緊跟誰才正確？雖想守法，苦於無法可守。所以借中春一角，建議駐美使館領導先發一份基本法給我們，以後若有修改，積累多了，再發修訂版，如每月一版（當然有重大改變時，可隨時發「號外」），這樣可有助於規範我們的行動，以免無意中犯法。我聲明，我會把此信寄「人民日報」，沒得到答覆，不得已才寄「中國之春」的。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一點意見和要求，並不是表明同意「中春」的立場；

「中春」若肯登載，也不是她同意我的觀點，或者是支持我的立場。這正如劉賓雁在黨報——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並不等於他站在了黨的立場，否則今天為何開除他出黨？實際上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的報告、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的政治報告，雖經全體代表一致同意，熱烈鼓掌，經久不息，公報發表後舉國上下，一致擁護，全國報刊，一連數月，捧場叫好，結果還不是代表黨的立場呢！所以我認為，看看「中春」，寫篇小稿，不應列入離心分子之列。若使領館領導有不同意見，請速通知我們，以後絕不再看再寫了。

據悉，由於支援郭城長跑的小隊車已進廠

整修，加上財務困難，他必須背負三十磅重的行囊，餐風露宿，照跑不誤。然而，鑑於各界的關懷和寄望，郭城深覺義無反顧，任重而道遠。他已於四月十一日開始他民主長跑的另一起程碑，由華府繼續南進，奔向維州首府理查蒙特(RICHMOND)及喬治亞州首府亞特蘭大。

鄭文杰表示，目前，「郭城加油俱樂部」除擴大宣傳郭城長跑各種活動外，尚需維持「郭城通訊」出刊的開銷，所以，財務已是捉襟見肘，亟需各界慷慨解囊。「郭城加油俱樂部」提供的服務與計劃包括：

(1) 提供國會參眾議員的名單及通訊地址，提供陳慶教授所草擬的致國會議員英文信函，方便各界參考、投書。

(2) 製作印有 RUN ACROSS AMERICA 及

FOR DEMOCRACY IN CHINA字樣的短袖運動衫，為郭城長跑籌款。

(3) 策劃「金門大橋萬人民主長跑」運動，日期暫定為九月一日。

參加「郭城加油俱樂部」的會費及權利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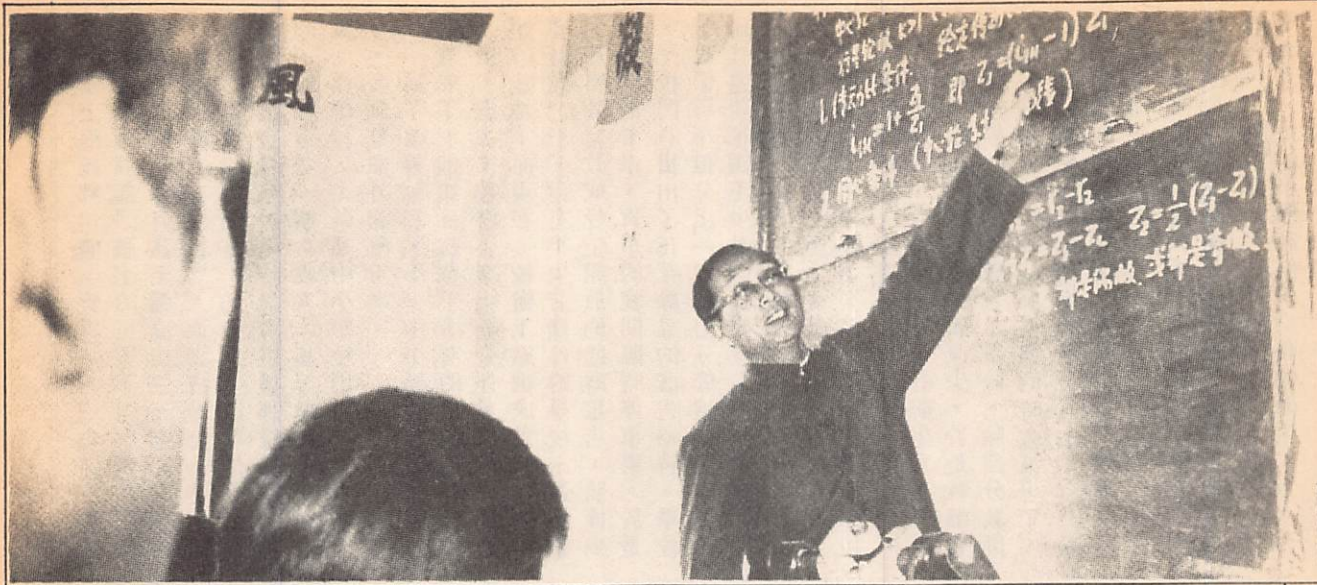
(1) 學生會員：十元至廿四元（運動衫一件）。

(2) 基本會員：廿五元至九十九元（運動衫及投票權）。

(3) 榮譽會員：一百元至四九九元（運動衫、投票權及「郭城通訊」免費贈閱）。

(4) 郭城會員：五百元至九九九元（除榮譽會員之權利外，將被邀參加郭城民主長跑各項活動）。

郭城俱樂部聯絡電話為：鄭文杰（二〇一四五七—六四六五）。



寫在教師增加工資之後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澳洲)示真

去年一月初，國內各報報導中小學教師自當年一律增加工資，並從一月一日時算起。筆者正在上海。那時我因有感，就寫了一篇題為「寫在教師增加工資之前」（以下簡稱「之前」）的文章寄到一家全國性的報刊。

為甚麼我要死死揪住這個題目不放，「之前」、「之後」地一寫再寫呢？其原因有三：第一，觀其去年增加教師工資的本意，報上講得很清楚：「要使教師工作真正成為社會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羨慕的職業之一。」（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電訊）如果說這並不是根本目的的話，那麼根本目的應該是：以增加工資來促使中小學教師「用培育人才的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和人民的期望和關懷」。（見「光明日報」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社論）也就是說，通過加工資，提高教育質量。那麼，現在工資加了，而加工資的目的是否已經達到了呢？據我看，並沒有。

第二，這次工資普遍加得並不少。我有些教師朋友從上海來信說工資已達一百元以上，

明年還可加到一百二十、甚至一百五十元左右。據我所知，那幾位朋友在文革剛結束時工資尚只有五、六十元，六年前也不過六、七十元。現在的工資已是九年甚至六年前的一倍，按說，應該在信中表示喜悅之情，但事實却並非如此。這說明增加工資並未真正調動起教師的工作熱情及積極性。

第三，筆者離國前在國內曾任教近二十年，深知教育界及教師們的苦衷，現在雖然身在海外，也總想貢獻一點愚見。

我早就認為：增加教師工資確實是提高中國教師社會地位的必要措施。老實說，即使將現有中小學教師已經增加了的工資再增加半倍、一倍，我看也不能算過份。但是，我還認為：增加工資決不是提高教育質量的根本措施；如果確實想提高中小學教育水平，那麼其它相應的措施必須同時跟上。

先來看看學校的現狀。據我所知，教師的純工資收入並不比工人低，即使在這次工資調整前也如此。據「一九

八三年上海統計年鑒」資料，八三年，文教衛生和社會福利部門職工的工資不但不低於工廠職工的工資，每月甚至還高出三至七元之多（參見該書第三三三頁）。而造成教師「待遇微薄」的現象的原因是：工廠是生產單位，超額超產有獎金可拿，平時又有這樣那樣的福利補貼，有時這些「額外收入」甚至會趕上基本工資。而學校，尤其是中小學校則是「清水衙門」，教師無額外報酬可拿。

爲了改善福利，不少中小學也經營起第三產業來了，例如目前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校辦工廠。過去，校辦工廠主要是作爲學生勞動鍛煉的基地；而現在，校辦工廠則成爲學校的主要財源之一。還有不少有條件的學校，還在動腦筋將教室改成晚上開放的臨時旅店，將操場租出作爲卡車、貨車的晚間臨時停車場。於是，學校門口掛出了花花綠綠的廣告招牌。學校行政領導不但分出一定精力分管這些企業，而且還要抽調不少教師去經營這些企業。雖然這些企業的放入對教師的福利不無小補，但與大多數工人的福利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而辦這些企業對學校主要精力的牽制及對學校主要任務的影響，倒是顯而易見的。

幸而近五、六年來，托了計劃生育卓有成效之福，學生人數有了明顯減少，於是教師負擔有所減輕，教師人數有了多餘。除部分教師退休、外調外，不少教師任課的時數減少了，有的暫時離開了具體的教學職位，有的從日校教師轉爲夜校兼課教師，還有的則「脫產」去搞校辦第三產業。

要講教師負擔減輕，有的教師可能會不同意。但是我有上面提及的那本「統計年鑒」爲證。一九四九年，每位中學教師平均負擔學生十九人，每個小學教師平均負擔學生二十八人

；四九年後，教師負擔學生人數最多的分別是：中學，一九五二年，二十七個學生；小學，一九五八年，四十二個學生；而教師負擔最輕的是八十年代。近年來，每個教師負擔學生的平均數只有十人（中學）和十六人（小學），幾乎是四九年的一半。（參見該書第二八三頁）

當然，有人會說目前教師負擔不輕，此語也不假。據我所知，上海各中學近年來都辦起了夜校：業餘中學、補課班、高複班等等，名目繁多。許多中學教師都拼命在夜校兼課，有的還私人教授、輔導學生。從提高教師收入這一角度來講，當然利用業餘時間做些工作、賺些外快本來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我感到不太正常的是：有相當一部份教師在白天任課不足，而晚上却東兼西兼，疲於奔命；有些教師甚至「頭重腳輕」、「主次顛倒」，晚上兼課節數大大超過白天任課節數；更有少數教師白天因種種原因完全脫離教學，而晚上則排得滿滿的。晚上兼課，一般備受教師歡迎，因爲可以得到津貼、增加收入；而白天的正常教學則希望任務越少越好，因爲多了也與收入無關。至於因兼夜課太多而影響了教學質量，那就只好如我一位教師朋友所說：「只有天曉得」了！

在國家沒有採取具體措施提高中小學教師實際收入水平的情況下，學校分出精力去辦企業，教師分出精力去兼夜課，也只能說不得已而爲之。而現在，政府已採取了增加工資的措施，是否上述那些矛盾已解決，上述那種情況就已改變，教學質量就提高了呢？事實正如我前文所說：如果其他措施不跟上，單單增加工資也將事倍而功半。

我在「之前」一文中，曾預料在增加工資後可能出現兩種與調整工資目的相違的情況：

第一，中小學教師的工資雖有增加，但增

加不多，實際收入仍低於工人工資加獎金。那麼，當然教師們仍得廣開門路去找額外收入，提高教學質量與增加收入這對矛盾仍將繼續存在，上文所說現狀仍將保持下去。

第二，中小學教師工資增加到等於甚至超過工人工資加獎金的地步。這時，的確會出現一個「人人想爭當教師」的局面。但那時，想爭的可能不是教師的工作而是教師的工資。不少已經調離實際教學職位的學校工作人員恐怕會強調自己也是「教師編制」而要求按教師標準來調整工資。當然，由於某些人的具體情況（如：健康情況、業務水平等原因）及學校的具體情況（學生人數減少，教師相應有餘），這部份工作人員實際上是不可調，或者至少是暫時不可能再進課堂任課的。如果按教師標準增加這部份人工資，則不但不能引起整個社會對教師的尊敬，反而會引起別的行業對教師的不滿及嫉妬。十一月廿一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連續報導師範學院畢業生在半途被別的企業「劫走」而不能去分配的學校任職，以及大量學校出租校舍，影響正常教學活動的開展，因而「亟待解決」，很能說明問題。（見去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日報」，十一月九日「光明日報」）

我在國外雖然從未在中、小學任過課，但由於一直沒有脫離過教育界，耳聞目睹了美國及澳大利亞一些中、小學教育界的情況，就此與中國情況相比摘要介紹一下或許對中國同行們有些啓發。

在美澳兩國，除了私立學校、教會學校靠收高昂的學費或教會的大量津貼來維持學校開支及教工工資福利之外，公立學校的全部經費都由國家或州、市政府提供。學校的任務只是教學，因此，決不需要及允許經營其他企業業

來取得額外經費，以免干擾主要任務的完成。

中小學教師工資一般略高於工人平均實際收入。工作了多年的中學教師可與大學講師有相等收入，而中小學校長則可得到比大學高級講師更高，甚至與大學教授相等的工資。

工資高只是教師在待遇上能受人羨慕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教師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受人尊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學識及勤奮。中小學教師一般必須有大學學士資格，美國不少學校還要求中學教師要有碩士學位。得到學位後，一般想做教師的人再需比別的學生多唸一年，以得到「教師證明」，然後才能申請去做教師工作。一般新教師被校方雇用後，都要先試用一段時期，待滿意後才可正式任用。至於中小學校長，則不少都擁有與教育相關的博士學位，並有豐富的教學和領導經驗。

中小學教師的待遇是優厚的，但負擔也是沉重的。第一次聽人告訴我，一般中學教師一週都要任廿五到卅節課時，我還以為聽錯了數字，後來才知道這是普遍現象。任課時數不足的則可以用學校課外活動等工作來替代。反正總任務量各教師都相差不多。當然，西方中小學一個教學班學生人數都比中國的少得多，一般只有廿五到卅五名學生，而且課外批改學生作業的量也遠遠不如中國教師。這兩點正是中國在今後的教學改革中應該加以考慮的。

任務重不等於質量可以差。質量關有校長在把守，有學生、家長、上級教育機關在監督，馬虎失職的教師無異於同自己的飯碗開玩笑。至於在完成校方任務的基礎上再去兼職、兼課賺外快，則無人會來干涉。

由以上那些國外中小學教育的基本情況，我想到：雖然國內外目前基礎還有較大差別，因此有的內容無法照學，但是否有的可以逐步

引進、慢慢改革起來呢？

比如：教師隊伍的精簡，我看就不但是目前大城市中小學的當務之急，而且當前也正是大好時機。在教師人數過剩的情況下，應該選擇最優秀、最有能力、最得力的教師留下，其餘的則逐步讓他們轉業、退休，或者在學校中轉為職工編制。

留在教學崗位上的教師則要求人人「名副其實」，也就是：拿教師的高工資，挑教學的重擔子。掛教師的名而不符教學之實是不允許的。當然，教多少節課才算足額，則要按我國實際情況來定。至於教日校、夜校，則當然一視同仁，不存在一種是正業，另一種是兼職的區別。要是教師實際收入的確能列入社會高水公平工資之中，我看大部份教師是不會斤斤計較

一些獎金補貼的。

事實上，錢也并不永遠是唯一吸引人的東西。西方沒有「教師不准掉換工作」的政策，教師工資也絕對不能與老板、醫生、經理等等相比，但是有人就是熱愛教育工作，有人滿足於一個穩定的職位和蠻過得去的收入而不熱衷於升官發財，也有人喜歡教師特有的假期，更有人如筆者那樣自知沒有幹別行的才能而只能一輩子兢兢業業吃開口飯，搖筆桿子，所以教師也並不缺乏人去當。中國十億人口，如果政策對頭，決不可能找不到自願來當的好教師。至於學校兼辦與教學無關的企業，只要教師待遇的問題真正解決，編制真正合理起來，也是會扭轉的。

留美雜拾

葉子

葉子，飄落在門口
小車壓過它
流下一滴碧綠的眼淚
秋天的憐憫——我的心在咳嗽

鍾於情

太陽追趕着星星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從來不知疲倦
夸父兮，情人兮——星星在竊笑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瀝青

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綫索
織成窗帘上的圖案
隨風飄動着
在誇耀着一個秘密——住嘴，蠢貨！

孤獨

昏暗的路燈下
有一個閃爍的影子
變得長長的它
正在思想——突然，燈……

從「思想大訟案」到「控告人民日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羅井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法共刊物「法蘭西文學報」刊出一篇「克拉夫欽科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的文章，署名西蒙·托姆斯，執筆是安德烈·伍爾謝。這篇文章假托一位虛構的美國人西蒙之口，誣稱從蘇共統治下脫逃的民主人士克拉夫欽科，由於酗酒、賭博、負債而成爲美國特務工具，曾從華盛頓蘇駐美使館偷取秘密文件賣給美國務院。該文並且聲稱在西方世界廣爲傳頌的克拉夫欽科寫作的「我選擇自由」(I CHOOSE FREEDOM)是由別人代筆，而作者是有寫作能力的。

克拉夫欽科，聯共(布)老黨員，曾任蘇俄一些重型工廠的總工程師和廠長，擔任國防器材處長，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爲駐美採購團團員。他在美宣佈放棄蘇聯公民資格，以「我選擇自由」一書暴露蘇俄的黑暗，而向蘇共特務政治挑戰。

爲着維護自己的人格和榮譽，克拉夫欽科向法國巴黎地方法院提出訴訟，以誹謗罪控告該文執筆安德烈·伍爾謝和「法蘭西文學報」發行人格勞德·摩爾根。之後，克拉夫欽科在美國受到一連串匿名信件、匿名電話以至子彈的威脅。而在巴黎，被告採取了延宕審判的手段，最後，克拉夫欽科還必須籌集二百萬法郎作爲如果敗訴應承擔訟費的保證金。——他傾其全部稿費，才如數繳納。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四日，巴黎地方法庭開庭審理此案。原、被告雙方都聘請了極有名氣的律師。原告律師是曾受納粹秘密警察拘捕過的地下反抗戰士、社會黨眾議員喬治·伊薩德。被告的律師也曾參加「反抗運動」，當過軍

官，充滿軍人姿態。

雙方都動員了龐大的證人隊伍，爲共產黨辯護的證人衣着華麗，體面自信。其中有將軍、參、眾議員、前任部長、學者、作家、記者以至紅色侯爵。而控方的證人全屬平民，他們籍籍無名，只是普通的農民、工人、醫師、工程師。他們控訴的是自命的「無產者政權」，而那些顯貴們保護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鮮明的對照恰恰表明了一個工人政權是怎樣演變爲特權者政權。

控方證人來自勞改營、監獄、流放地，來自農村、工廠和學校。他們真切地證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帶給無產階級的悲慘遭遇。他們提供的三十一件證明文件確鑿地證實了蘇聯政府、各級機關、秘密警察，慘絕人寰的迫害、鎮壓、暗殺、毆打、侮辱普通人民、冤誣良善、刑訊逼供、虐待折磨、剝人重刑的罪行。

而被告證人則是那樣橫暴、無知、粗俗，特別可笑的是連原告的前妻也被牽入法庭去赤裸裸地暴露與原告的「一切私人關係」。這是共產黨慣用的在私生活上搞臭對方的伎倆。恰好一個熟知這個女人家世的證人，揭露出其父被捕，其母失去生計的真相。她爲了親人的生活而被挾持出庭。於是，這個不幸的女人便消失了。

在審訊中，不斷被揭露的黑暗和恐怖，激動了西方的輿論和人民。蘇共終於不能沉默到底而由著名記者西蒙諾夫在「真理報」上開砲，其結果更幫助克拉夫欽科在輿論一致的俄國家喻戶曉了。

經歷了兩個月的審訊，一九四九年四月四

日，巴黎法庭作出了判決。法庭雖不直接批評俄國蘇維埃政府的行爲，但判定被告對原告誣陷不能自圓其說，不能提出反證。充分肯定原告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實的。因此裁定：被告犯公開侮辱毀謗之罪，玷污原告的尊嚴和聲譽。責其將判詞登於文學報首頁，並科處罰金十五萬法郎。

這就是轟動全世界的「思想大訟案」。天道無常，歷史循環，八十年代在美國又出現了另一場訴訟。也有這麼一個作者，借一位慷慨死去的作家之口，在一家頗有盛名的大報上，誣稱一個中國青年。語詞是那樣粗俗，內容是那樣鄙俚，使海外華人瞠目。於是一場新的訟案便在新的時間、地點和歷史環境中再現。當然，他們是那樣地沒有勇氣，只好借用死者之口，却遭到死者遺屬的否定。他們是那樣地沒有道理，只好把對方的私生活橫加撻伐，這是向來他們的歷史伎倆。他們是那樣地橫暴，給對方戴上「叛徒」，「叛國分子」，「壞人」等帽子，但也只是在他們有權的死角落，在那裏，「帽子公司」享有盛譽。他們是那樣怯懦，只有借助豁免權來逃避公堂對簿。但是中國的小民不再是那樣馴順了，他們也有抗爭的一點勇氣。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一線的生機。

我們的古人總不忘記給我們留下一些有哲理意味的詩句，讓我們去體味：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珍異類，卓然見高枝。

——陶潛

我們也期待着正義對邪惡的一點警示。■

中共勞動教養規定 嚴重踐踏人權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綠綺

何謂「不予法律追究」?

二月二十三日，美國「中報」轉發中新社報導：有關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對去年底大陸學潮如何善後的談話。報社把其主要內容概括成如下標題：「北京不會重犯反右鬭爭擴大化的錯誤？參與學潮的學生將再『教育』」。當局「一般不予法律追究」。筆者讀了這標題後悠然反思三十多年來的遭遇，對中共「再教育」的實質有所認識，故撰此文。

在西方法治國家，凡捲入各種人際漩渦的當事者，一聽到政府宣佈：「不予法律追究」之後，肯定會笑逐顏開。但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政府宣佈對你不追究法律責任，却並非「萬事大吉」，「人治」的法宝「再教育」便接踵而至。這種「再教育」並不是讓你們這群遊行示威的大學生畢業後，再受研究生院的教育。而是一九五七年由國務院頒佈，一九七九年後由全國人大補充的：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的再教育。即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的所謂「強勞」，或甚至給予所謂最高行政處分的「勞動教養」，或強行分配你到青藏高原過流放式生活。這並不是嚇唬，而有真人真事為證，我的一位同事，被打成右派後到粵北北化的「強勞農場」接受再教育。一去二十年，妻離子死，皓首

才還鄉。但勞教並非追究法律責任，只屬行政中等程度處分；我本人被打成極右分子後，被開除公職，押勞動教養，也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並不追究法律責任。最後勞教結束，流落江湖十五年。再如我的一位中學同學，在北京唸大學時被打成右派，畢業後被強行分配到青海一所小學教美術、體育、音樂，在玉門關外沒有春風的地方度過了青春。後來總算由於他在加拿大土生的父親向中國政府抗議，始准自行離職返回廣州當一名街道的三輪車伕。他不但沒有追究法律責任，而且連行政處分也沒有，只是屬於一名「再教育」的對象。可見，何副主任宣佈對參與學潮的學生只進行「再教育」實已包藏禍心。

追溯歷史，在一九五六年，中共也曾在「不予法律追究」、只進行勞動再教育的幌子下，把近百萬在「肅反」中清洗出來的「敵對階級份子」剝奪一切自由送去「勞教」；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除了像林希翎等個別極右份子「予以法律追究」、判處徒刑外，餘下近百萬的右派份子也僅以通過勞動進行再教育而已。但在實際上，以行政處分而押往勞教農場，却是進行無定期的洗腦。

中國本來就是咬文嚼字的發源地，也是善要陰陽謀術的地方。而本世紀中葉以後，執政的共產黨更把這種中華民族的壞傳統加以繼承和發揚。他們把字典上的「幫助」等於迫害)

、「學習」(即鬭爭)、「再教育」(實為勞改)、「關心」(實為刺探隱私)等詞的含義弄到面目全非的地步。而「勞動教養」一詞更是陷阱。

中共特產——「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是中共統治下的特產。國務院製訂的「勞動教養條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向政府各級機關內部宣佈，為了處理近百萬在「肅清機關內部暗藏反革命份子」的政治運動中清洗出來的幹部，就需要有一種不經法律審判程序即可拘禁任何人的條例。據我所知，判定和批准誰該勞動教養的權限，不屬政府各級部門而屬中共各級黨委書記，他們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領導小組負責人。晚近此生殺權則操在各級公安機關之手。

為了掩世人耳目，國務院宣稱：勞動教養不是刑事判決，只是一種最高行政處分。並且規定各級政府屬下的勞動教養(管理)處是各級民政部門下轄單位，不屬專政機關的公安系統。但所謂勞動教養處却是內部保密組織，根本沒有牌子掛在門口。例如一九五六年的廣東省民政廳勞動教養處的對外通訊地址是廣州市東郊楊箕村×號，而且靠近廣州鐵路中學。一九五八年後遷往廣州公安局轄下的勞改工廠新生三廠，對外也只稱廣州市西村南京路×號。這些勞教場所不但外來旅客無法獲悉，即使廣州市民亦難以知曉，而且內部戒備森嚴，全由公安武裝把守，即使附近街道亦已成為禁區，禁止外人進入。所謂最高行政處分的內容是：不准越出警戒綫，一切通訊受嚴格檢查，一切行動集體進行，即使夜裡到廁所去也得幾人同行，每月只能見妻兒一次，而且不超過二十分

鐘，這些，可說與刑事犯人區別不大。

勞動教養處只是一個中轉站。一般被押送勞動教養的人，均先要在勞教處作短暫停留，習慣一下監獄式生活。把勞教犯從城市押解農場則選擇在深夜進行，以免被市民察覺。一九五六年春，單就廣東省的直屬機關（不包括廣州市）被清洗出來的各種反革命份子、敵對階級份子至少有四千人，這些人就是用這種秘密方式押赴農場的。據後來「肅反」複查平反冤案時透露，廣東省內各地廣設幾十個勞動教養農場，共收容「勞教份子」近六萬人。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全國被清洗到農場的「勞教份子」近百萬之衆。這些情況不但國際人權組織無法獲悉，即使我們這些兩度被判勞教的人也很難瞭解總的情況，這就是中共嚴密封鎖新聞的妙處。最近中國知識份子和西方傳播媒體要求中共放寬新聞管制，須知，新聞自由和極權統治是一對冤家。中共可以讓西方資本家賺走億萬金元，但絕不願給外國新聞社弄走一條絕密的內幕新聞。

廣東省幾十個勞動教養農場也和全國各地的勞教農場一樣，對外只掛國營××農場的牌子，不但外人不知其真實名稱，即使我們在那裡被強迫改造的犯人也常常不知它的番號。例如，當年的英德大鎮勞教農場原來究竟屬公安廳什麼勞動改造隊？我至今還不知道。這種名實不符的把戲是中共慣用的伎倆，如解放初期全國各地的「公學」都是關押疑犯的勞改場所，而南方大學第二部就是審查批鬥敵對階級份子的地方。這些「公學」、「大學」和中外辭典上的定義毫無共同之處，但却和監獄一詞的內容大致相同。如果一個外國人有幸到那裡去參觀訪問，這些在那裡受折磨的準犯人肯定告訴他，他們是大（公）學的學員。不明白中共

高明的陰陽騙術，就難怪天真的美國學者如布魯斯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哈定那樣，在國會中國人權聽證會上作證時竟說：「比較其他社會的政治體系，我認為中國已不再算是極權專制制度」了的評估（「中春」卅二期廿二頁）。

就我所知，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勞教份子，全屬「肅反」運動被清洗的幹部。在一九五七年間，全國近百萬因「肅反」而被勞教的幹部絕大多數已平反而離開勞教農場，使多數勞教場會一度真空，如我所在的英德大鎮農場就因幾千名勞教份子獲得平反而轉為華僑農場，專門收容因印尼排華而返祖國的難僑，變為廣東省華僑事務委員會轄下的真正國營農場。其他勞教場則由公安系統拘捕一大批被認為不服管教、危害社會治安的青年予以補充。

勞動教養條例從一九五六年內部傳達起至一九六二年止，都從不宣佈「有期」處分。公安管教人員只對勞教份子說：「你什麼時候改造好了便什麼時候結束勞教處分。」由於制訂勞動教養條例的最初動機純粹是針對政治犯的，所以中共統治者便效法蘇聯「托派農莊」的做法，把這些政治犯終生禁錮在農場裡。這就是「勞改」（即經法律程序判刑的罪犯）有期，而「勞教」（所謂非罪犯的行政處分）無期的陰謀所在。因此，中共可以放過一個海洋大盜，但必須把所有政治思想犯拘禁，直至把他們折磨死為止。

後來，中共公開宣佈勞教規定期限，那是由於勞教份子的來源已經改變了。因為養尊處優的新興貴族——中共高幹子弟作惡多端而不能不加以處理。他們憑藉父蔭而多把刑事判決改為勞教，再把勞教改為定期拘禁，以便從輕發落。但是，即使勞教有期也不妨礙利用勞教農場拘禁「良心囚犯」的初始目的，因為你勞

教期滿後，中共的勞教場幹部仍有權強制你留場就業，不准你回家團聚，並把你的戶口扣在農場，如果你強行溜走，便成黑人黑戶，隨時可以把你當作無業游民收容勞教。甚至可以援引一九五七年公佈的勞教規定：不服從政府分配者可處以勞教，再度定你勞教罪。所以，一旦被中共定為對黨不滿份子，你就無法脫身。勞教結束後你就得乖乖地留場就業，享受自由，否則只好自殺。

據「勞動教養問題規定」，被押送勞教的人由於所犯之罪輕微，不足以判刑，但又不能讓他留在社會上自由行動，所以，為了保障社會治安，為了使犯罪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新人，於是國務院定出一套通過勞動來接受再教育的制度。從外表看來，中共的勞動教養制度是很冠冕堂皇的，但是，如果我們深究一下這種制度究竟以什麼標準來判定一個人已犯罪但又未達到判刑的程度？這樣，勞教制度的實質便原形畢露了。因為中共有各種各樣由黨內領導掌握的判定誰該押解勞教的規定，現簡括如下：

「勞動教養」的五類對象

(一) 凡被指為敵對階級份子（即不屬一九五一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範圍的國民黨一般官吏和地富出身的知識份子）均可拘送勞教。一九五六年首批勞教份子多屬此類。這批人在國際共產反個人迷信和波蘭、匈牙利利爭民主自由運動高潮時，曾一度被釋放，恢復工作和自由。但好景不長，一九五八年初，這近百萬的「肅反」對象又有約百分之六十，在「反右」末期重新以反對「肅反」的政治壞份子的罪名再次押回勞教場。就筆者所

知，這批勞教份子根本沒有和中共對抗，也沒有像宗教界那樣有和中共意識形態相對立的信仰。他們完全以中共馬首是瞻，誠心擁護共產黨。所以既不能當作「政治犯」類，也難歸入美國人權專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教授劃分的中國四類「良心囚犯」中的任何一類。這只能說是中共的瘋狂階級鬥爭論——不斷地搞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因為解放初已把近千萬的「反革命」和「地主」、「惡霸」殺了。這樣一來便要製造出另一批階級敵人來填補此缺，因此，把這類人數眾多的「良心囚犯」另立為第五類較為恰當，這可以補司馬晉教授分類之不足。



社會主義雖犯罪律低（據說），但死刑犯多。

，只叫「監督」勞動。由政府每月發配給人民幣二十元作生活費，而且在勞動時沒有武裝監督。但強迫勞動也和勞教一樣是無期的，筆者有兩位受監督勞動處分的右派朋友直至「文革」時才釋放回原機關，比勞教的朋友還多受幾年苦。總之，右派中的第三和第四類都是押往農場勞改的。我所在單位共揪出右派十人，其中勞教者三人，監督勞動二人，估計全國百萬右派中約有四十萬被押往農場勞改。

根據自己的親歷估計，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勞教份子以(1)類的敵對階級份子為主要構成。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1)類和(2)類，即敵對階級份子和右派份子約佔總數百分之四十。其中右派可歸入司馬晉「良心囚犯」的第一類。

(三)不服從國家分配，所謂個人主義極端膨脹的幹部也可押送勞教。這一類勞教份子人數不多，主要是年青的大學生。他們平時沒有很好地聽從所在系班的黨團支部書記指揮，一旦畢業便被穿小鞋，被分配到西藏、新疆等不毛之地去工作。當你拒絕接受「黨和毛主席指向那裡，便奔向那裡」之後，專政之索馬上就套在你脖子上。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也有因不服從分配而被判勞教的工人和農幹押來勞教場。雖然，勞教份子相互之間嚴禁交談案情，但從言談中，總可打聽到所犯案情梗概。如果這類勞教份子歸入「良心囚犯」則應立第六類。

(四)被公安機關認為有礙社會治安和市容的人可以拘押勞教。由於中共向外宣稱已消滅乞丐，所以凡是在與海外接觸較多的城市裡行乞的叫化子都收容勞教。但是改造這類流氓無產者比改造敵對階級份子困難得多。公安系統的農場是無本生利的暴發戶。既然在這群乞丐身

上撈不到什麼油水，那麼便採取視而不見，少管為佳的態度。但是對那群讀書不成而又「待業」（中共稱失業為「待業」，因為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國家無「失業」）的青年却虎視眈眈。一旦發現他們三五成群，聚眾豪飲和賭博後便馬上扣留審查，強行押送勞教場，甚至和被鄧小平大加讚賞的街道居民委員會發生口角也成為判處勞教的罪證。所以，自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後，被扣上打群架、調戲婦女、聚賭博或偷聽反動電台（美國之音和台灣廣播）、播放黃色音樂等罪名而送勞教的社會青年幾佔勞教人員的半數。他們繼續壓「反革命」（包括地霸）——「機關肅反」——「反右」之後而成為第四代階級鬥爭的犧牲品。如果也劃為「良心囚犯」的話，則應另立為第七類。

(五)偷越國境外逃的公民也屬勞教對象。這類事情只發生在國境綫省份，而且以廣東省為典型，當然廣東的勞教份子也有押往青海省服勞役的。這裡所指的是一般沒有任何政治背景，也不是機關幹部的平民，他們外逃的動機和目的純粹是為了謀生並無反共行為。但一旦外逃失敗被擒，或未外逃而被當地政府發現後即判處勞教。為此，廣東省公安系統還設有專門收容外逃犯的勞教農場。而勞教時間的長短是和外逃被捉次數多少而定。外逃次數多了便要升級，判刑勞改。這批勞教份子應另立第八類「良心囚犯」似較恰當。因為他們都屬為生活所迫的無知庶民。

第一類和第二類勞教份子除被迫死者外早已獲得平反和改正離開了勞教場；第三類也隨着「三面紅旗」破產後毛澤東的苛政暫時受到抵制而獲得解放；第四類也因港澳兩地政府加強邊界警戒和國內生活稍有改善，外逃人員減少而減少；唯第四類勞教份子不但沒有減少，而

且直線上升，至一九八三年夏至一九八四年間更達爆棚高峰。現先檢討勞動教養制度踐踏人權的歷史：

上文所述的第(一)類勞教份子幾乎是清一色的「肅反」對象，這近百萬的勞教份子有百分之九十八在「肅反」復查時平反，並返回原機關工作。像我所在的英德大鎮勞教農場的二千五百人中沒有平反的只有五十多人。這一事實充份說明了一九五六年毫無根據地把這些幹部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是錯的。但一九五八年「反右」結束又把其中約百分之六十已平反者再度押回農場勞教。衆所周知，「肅反」是由揪出「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肇其端的。一九八〇年，連胡風本人及其整個所謂反革命集團都澈底平反了。可見整個肅清暗藏反革命份子運動是由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一小撮高層憑空臆造的。可見把近百萬的無辜幹部押去勞教，就是對人權的嚴重蹂躪。

第(二)類被押送勞教的右派份子亦多達四十萬。根據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改正右派錯劃的結果表明，真正成爲右派的只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五大民主黨派頭頭和當時是學生的林希翎和譚天榮兩人。即近百萬右派中證實只有七人才是所謂真正的右派。而章、羅等人雖然是大右派，但沒有送去勞教，而林希翎却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也不是勞教份子。可見至今爲止的僅有七名右派(四人已死)都沒有一個判勞教。所以，一九八〇年間，「反右」創始人鄧小平不得不承認當年犯了一「反右擴大化」和「處分過重」的錯誤。「真正右派」尚且不需勞教，反而把四十萬不是右派的知識份子押去農場勞教(部份已被整死)，這不能不說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

第(三)類勞教份子人數雖然不多，但性質最

惡劣。因爲單憑不服從分配便剝奪別人的權利和自由，這就充份暴露出中共的專橫和殘暴。制定和批准施行此條例的周恩來也有過不服從國際共產的命(見張國燾自傳)和不服從毛澤東調遣往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記錄。毛澤東不服從當時領導他的中共中央命令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作法，後來中共自己也感到太露骨而有所收斂。可見第(三)類更屬踐踏人權的典型。

第(四)類勞教份子自一九五七年以後人數激增。這群第四代階級鬥爭犧牲品，近年來已成爲一切勞教場的主要改造對象和勞力。本類勞教份子的來源誠屬龍蛇混雜，其中確實有些人的罪過是應該勞教的，如高幹家庭出身的勞教犯就足以判刑而押往勞改農場的，這裡也確實有慣偷、扒手和流氓成性的自甘墮落的青年，也有私娼和騙子。但就筆者所知，這類罪犯不會超過(四)類勞教份子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其他都屬查無犯罪實據，但思想意識確實和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式思想觀念不同。他們不願成爲黨的馴服工具，並按青年人特點充分發揮個性自由，因而觸犯中共的清規戒律。但並未違反中共政權所公佈的憲法和法律。可見把這群無辜的青年強行押送勞教，即使按中共自己一手炮製的法律來判定也是毫無根據的。至於少數已觸犯刑律的青年，更大可以繩之以法，我們認爲凡非法捕人就是踐踏人權，當然也是犯法的。

第(五)類勞教份子從全國勞教系統計算只是少數。這不僅發生在局部地區，而且有時間性。當國內生活有所改善，外逃人數便減少。按中共法制識別，當然不排除外逃者有反共政治目的，但這是少數，而且中共已另作處理，即判刑勞改甚至處以極刑。但把外逃只是爲了謀

生，爲了在國外能多賺一些錢以便匯回祖國養兒育女的一般平民百姓也強迫勞教，使他們妻離子散，這確是「苛政猛於虎」。這些人的外逃完全是中共逼出來的。爲什麼被中共指爲貪贓枉法的國民黨時代，廣東居民可以自由遷往港澳定居而沒有外徙？反而在自稱工農聯盟的中共政權統治下的工人和農民却相繼冒險偷渡。「始作俑者」是毛澤東，但中共不但不自我檢討，却拿百姓開刀。筆者所知有些受害百姓還是當年中廣東各地游擊隊的救命恩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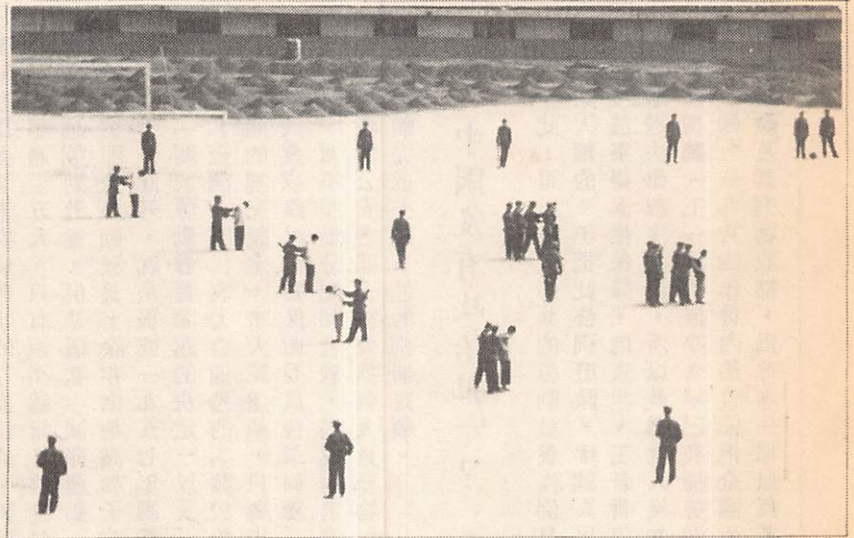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如果沒有擺脫任何審判程序約束的勞動教養條例，那麼絕不可能在幾個月之內把百萬無辜羈民剝奪自由的。酷刑厲法當然是造成中共人權記錄黯淡的原因之一，但無法無天的勞教制度也是中共徹底踐踏人權的禍根。例如，筆者一九五一年參加了一次廣東省有史以來大型的宣判會，當日被槍斃的死刑犯共一百九十八人，然到底是經法律程序處決的，不但有案可稽而且有一定數目。但不需法律判決的勞動教養則全由「人治」決定，就我所知勞動教養處一天之內可收容千人，可見「惡法勝於無法」。

鄧小平時代「勞教」猶甚

勞教條例不僅在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時代起到踐踏人權的壞作用，而且在鄧小平執政時代，也就是已頒佈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後的高唱「法治」的今天，她的壞作用仍有增無減。例如一九八三年由鄧小平下令「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罪犯的運動如果沒有勞動教養，那就無法收場。因爲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秘密批准(只在內部公佈)的「逮捕收容條例」不但便於大開殺戒，而且迫使警察濫捕

。這個和一九七九年公佈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相抵觸的「條例」，其詳細內容除中共高官和執行此任務者外一般幹部均不得而知。但據一位參與此次運動的朋友說：「可抓可不抓的壞蛋一律抓；可判可不判的一律判；可殺可不殺者一律殺。而且拘捕的人數有一定指標。」這就必然產生「濫抓」、「濫判」和「濫殺」的嚴重後果，後兩者因必須經法律程序，故怎樣胡搞仍有一定限量。但「濫捕」却是無限的，因不需經任何法律程序，故無從查考。

結果，原定為由公安機關作「行政拘留」的小偷小摸、調戲婦女、打架等等未構成罪狀的人也一律送勞動教養。把這些影響社會治安的人押送勞動教養可稱「從嚴處理」，但筆者所知不少無辜百始也被扣捕勞教，例如被指為「多嘴犯」者就屬此類。所謂「多嘴犯」就是口出怨言，得罪「地保」而招來橫禍。如一些青年人叫街道居民委員會主任為「事媽」或「街八」；稱人民警察為「老二」（國民黨時代老百姓對警察的稱呼，因其專欺壓蟻民而得名）；農民稱生產隊長（村長）為新富農；稱大隊書記（鄉長）為新地主；稱公社（區）的頭頭特別是武裝部為新惡霸，這就觸犯了「不怕官，就怕管」的戒律了。此外，因冤案而上訪的也被指為妨礙社會治安而勞教。北京市的「逮捕收容」、「從重從快」，是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夜裡開始的。在這打擊刑事犯罪運動期間，我因公到首都，朋友告我，運動開始不久，拘留所、監獄早已飽和。有些大學宿舍也暫時借用為收容罪犯場所，個別旅館甚至改屬公安局權充拘留所。但究竟在這幾個月間，北京市一地共拘捕了多少所謂罪犯，誰也說不清，有人估計約四萬名，其中槍斃的死囚近千人。



槍決罪犯前召開公審大會會場。

儘管真實數字無法弄清，但憑藉旁證材料還是可以把全國被捕人數估計出的。過去毛澤東總喜歡使用人口百分比作為清洗的指標數。但這次鄧小平的「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罪犯却用絕對數字向各省市下達。雖然具體數目鮮為百姓所知，但由於各省市、各地縣互相開展殺人捕人競賽，因而把鄧小平下達的捕殺數目層層加碼，最後落實到公安人員和武裝警察每人至少拘捕「罪犯」兩名，只准超額，但不能缺數。據「人民日報」公佈全國武裝警察共六十多萬名。此外，全國有二十九省市二千多個縣，若以每縣平均有三十名公安人員算，則其總

數亦有六十多萬名。如果以每一公安人員和武警平均拘捕一名「罪犯」算，則這次「滅罪運動」所捕總數，按最保守的估計也不會少於一百三十萬人。

若以這一保守估計數字按二十九個省市平均計算，則每省被捕人數還未達到四萬五千名。若以全國二千多個縣平均，則每縣只逮捕了五百五十人左右，再按全國五萬二千多個區（公社）算，則每區只有二十五人被捕。若以每區平均一萬五千人算，則被捕人數只有千分之一、六左右。但以絕對數字算，則所捕人數已相當於歐洲某些國家的總人口了。再拿筆者當時居住的城市街道所逮捕人數算也是百分之二左右（該街道派出所管轄二萬八千多人。據透露只逮捕了六十名左右「罪犯」）。以上所述，北京市的被捕人數估計四萬左右，雖比我們的估計高出一倍，這也是可能的（當年北京市總人口為九百三十三萬），因為往首都鳴冤的人也都會成收容勞教對象，此外這次名為打擊刑事犯，實質上連「政治犯」、「良心囚犯」也一鍋煮，因此所捕人數較多，而北京尤甚。

又據被無辜拘捕的港商張克深於一九八六年夏天寄押在廣州和上海兩市拘留所的親歷估算，每一「收容罪犯」在獄內所佔面積平均不會超過一平方公尺（約十一平方英尺），而一九八三年逮捕高潮期每個「犯人」在拘留所的佔地面積肯定會更小。若按每一平方公尺容納一「罪犯」算，則全國各地拘留所和監獄的面積足夠容納一百三十萬囚徒。何況，在「從快從重」辦案的「滅罪運動」時期監獄使用率比平時提高幾倍。一般「罪犯」甚至可在三兩天內完成所有法律程序並押赴勞教場。而勞教份子更可在拘捕後幾小時即直解勞教場。如廣州市就採用即捕即解，使「罪犯」迅速離開南大

門的開放窗口，避免影響市容，而且捕人和外解均在深夜進行，免被多嘴的外國旅客特別是記者追問。可見，按拘留所和監獄的流通週轉率不超過十天算，則一九八三年七月底至一九八四年初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期間，從拘留所和監獄一直處於「爆棚」狀態看，在運動中逮捕的人數遠遠超出我們的保守估計。

就筆者本人所知，直屬廣東省公安廳勞改局系統的勞改和勞教農場至少有二十三個，而且都屬能容納勞改犯三千人以上的大型農場，此外還有很多勞改工廠和礦山，屬於專區的勞教場還有幾十個。其他各省的勞改、勞教農場和廠礦肯定不會比廣東少。但是，「減罪運動」開始後，全國上述勞改場地便大告人滿，除往人稀地廣的東北原來關押國民黨軍、憲、警、特的勞改場所運送外，還大量押往青海高原積雪的地區讓其自生自滅。據一位曾在青藏高原勞教場呆過的右派份子告我，在那裡改造的人如果沒有官方的釋放證明，你休想從雪綫上的冰原逃回鐵路交通綫。他於一九六二年釋放回家時就是靠那張「黃色通行證」乘坐當地駐軍的卡車而脫離苦海的。而他的兩位同行難友，因歸心似箭而忽視了當地藏民的忠告；竟在卡車上忘記絕對保暖，因而中途凍死。這不能不使人想起這塊「古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的鬼門關慘景。

「減罪運動」過後，中共並沒有公佈死刑和徒刑以及勞教或流放的總人數。西方人士曾作過各種估計，如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邱宏達博士在美國國會中國大陸人權聽證會上作證時估計：此次打擊刑事犯罪運動，「至少草率地處決了一萬多人」。有人按在「減罪運動」中判決死囚可在八天內完成整個法律程序作

為計算基準，推定一般刑事犯，從逮捕、調查、起訴、判刑和不服上訴駁回等全程需時一天算，則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約二千五百個縣級以上法院（刑庭）連續不斷地（連星期日也不休息）判案半年，也只能判處四十五萬名罪犯。因此在「從快從重」的「減罪運動」中所拘捕的百餘萬「罪犯」裡，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被捕者是勞教份子。所以死刑人數即使再多一萬或減少五千對本文所要說明的侵犯人權的勞教制度沒有影響。

衆所周知，公安機關執行的「行政拘留」，是對付如打架毆鬥、小偷小摸、調戲婦女等不軌行為而又未構成罪狀的人而言的。拘留時間不能超過十五天。只有拒不認錯、態度惡劣者才能送勞動教養。但是這次「減罪運動」則一被拘留即送勞動教養，除非你是高幹子弟等特殊人物。此外，就是根據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公佈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一九七九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來大肆逮捕，只要街道居民委員會或農村治安保衛委員會舉報屬「無業遊民」或不服從分配和管教，那就難逃魔掌。因為各級公安機關正需要抓到大量獵物以完成和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拘捕定額。

「中國沒有政治犯」？

至此，可以斷定中共的勞動教養條例是嚴重踐踏人權的。不把此條例廢除，中國人民便永遠沒法獲得人權保障。魏京生、王希哲等人因為通過法律程序判決，所以能為世人獲知，但許多像魏、王一樣的無辜者早已被捕勞教（筆者所知，一九八四年曾內部宣佈把全國所有民間組織及其刊物取締，為首者一律以反革命

罪逮捕，但究竟拘捕了多少人？定什麼具體罪名？現在在那裡勞改？這只有天曉得。）可見「惡法仍勝於無法」。魏京生雖然已神經分裂，但比起那些至今還不知死在什麼地方的無名英雄，確屬不幸中的萬幸了。

由於有這種不經任何法律手續即可任意拘捕「政治犯」、「良心囚犯」的勞動教養條例，所以，一九八六年六月初，中共公安部長阮崇武才能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言不慚地說：「我們只有刑事犯，沒有政治犯」。因為大赦國際組織說中國有幾十萬政治犯只是一種估計，可說查無實據。因為：第一，拘捕「良心囚犯」不會留下任何文字證據，既無供詞、判詞，更沒有在大庭廣眾之地張貼佈告（凡政治犯的判決，即使經法庭定案也往往不張貼案情佈告，如一九六九年，我的難友，反共的中國人民黨主席姚煥然被判死刑也只是用有錢廣播向參加各個會場的聽眾宣佈，死刑佈告亦僅在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以及各機關內部張貼）故鮮為外界所悉；第二，所有囚犯人的地方均在僻遠山區或交通不便之地，外表是一個國營農場，中國本土百姓也不准靠近，外來人更無緣獲悉；第三，即使讓國際人權組織進入勞教場調查，估計他們也了解不出什麼問題，因為勞教份子都被編成生產隊和作業區。公安監管人員只編隊長和主任，而且多穿平民服裝。所有勞教份子均稱隊員，不准暴露身份。

最後要再一次提醒國內參與學潮的同學注意：三十年來血的教訓證實，中共所謂「不予法律追究」、只作行政處分送勞動教養進行「再教育」，已摧殘了四代共八類「良心囚犯」了。但願你們不會成爲第五代。也希望天真的西方知識界不要再誤信自鄧小平執政後大陸已再沒有「良心囚犯」的「天方夜譚」了！

中共的勞動教養政策

先梅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國後，到一九五七年，在六—七年的時間裡，通過土改、鎮反、肅反等多次政治運動，基本上解決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及各地方割據殘留的政治勢力，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亦遭到了徹底的清算。中共按照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學說，用革命的專政手段即殺（殺害）、關（判刑）、管（管制）的紅色恐怖使幾百萬人在中國社會消失了。

但中共政權的腐敗、殘暴及專制的本質必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與反抗。那些父兄已被鎮壓和打擊的子弟，在高壓之下，不用說反抗，即使稍有不滿就會遭不測。所以這一類型的人，都戰戰兢兢地生活，而且在不同場合還要不斷地表示與其父兄劃清界限並批判自己的反動階級出身及固有的剝削階級思想，並努力改造自己以求生存。但是，新的不滿及反抗者後來大多來自於革命的工農階級及共產黨員本身。例如一九五六年胡風反革命事件，實際上完全是中共內部不斷發生的派別鬥爭之一。胡風集團的人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而且從事革命鬥爭多年。在這種情況下，為鬥爭的需要，就要有新的理論作出說明。這就是一九五六一—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一系列文章及勞動教養政策頒佈的政治和社會背景。

勞動教養不是刑事處分，即不訴諸法律，沒有逮捕。是按照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和方式來解決社會及政治問題。通過勞動教養，可為更肆無忌憚地剝奪個人自由和權利大開方便之門。總之這是中共統治的基本手段之一。

勞動教養條例宣稱，它是針對社會上一些輕微犯罪尚未觸及刑律，以及無理取鬧及妨礙公共秩序者；對無業游民，進行收容（不稱逮

捕），通過強制勞動，予以改造和教育，使他們重新做人。規定由民政部門及公安部門共同執行，而實際上由公安部門完全掌管。

勞動教養條例的頒佈成爲中共迫害和鎮壓人民的更有效的手段。固然，對於輕微犯罪份子，如小偷小摸，傷風敗俗，流氓鬥毆，這些不利於社會穩定的因素，就通過勞動教養法處理這些人。但對於思想和政治觀點不同的人，或爲維護自身正當利益進行抗議，或對中共領導不滿，揭露其爲非作歹的都可以冠以無理取鬧、妨害公共秩序而收容進行勞動教養。衆所周知，中共歷來宣稱社會主義社會無失業之說，哪來的無業游民？中共的所有工廠、學校、醫院、商店、機關都由黨組織掌握一切。若這個單位的領導認爲某人行為不軌、思想反動，就可以開除某人。那麼開除就意味着無業（開除之後決不可能被任何單位吸收工作），按勞動教養條例，無業游民隨即可收容進行勞動教養。實際上開除與收容這二個環節是獨立互不關連的，而在宣佈開除處分之前，早已同當地公安部門聯繫，作好安排，宣佈收容進行勞動教養了。

一九五七年勞動教養條例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之時，正在反右派運動之高潮時期。勞動教養條例即爲解決四十萬名政治不同意見者作了準備。毛澤東說中共與右派之間是敵對性質的矛盾，但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作寬大處理，即不殺、不關，對右派份子處以行政處分，即可以開除，並收容其進行勞動教養。於是翌年春天，成萬名右派份子關進勞動教養收容所。勞動教養條例在一九五七年頒布時，沒有規定被收容勞動教養的限期。後來直到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才規定勞教有期限，即最低半年，最高三年。如果勞動教養期間表現不好

則可延長期限，每次最高可為三年，次數不限。宣佈延長期限所持的理由往往是「不認罪，抗拒改造，違反所規紀律，頑固不化等等」，只需在中隊寫材料，上報大隊，大隊批准，地區公安局備案即可。勞動教養與判刑勞改僅一步之隔，無大差別。

勞動教養所大都設置在本省邊遠地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除在安徽、河北等省開地設所外，還在青海、新疆、內蒙等地設立勞動教養所。其公安人員分批輪換或少量由本地招僱，勞教人員就一輩子淪落在該地了，具有移民屯墾性質。

按條例規定，被勞動教養的人還保有公民權，即享有中共憲法上規定的種種權利。所以曾在一九五八年北京市公安局轄下的，設在天津附近寧河縣的清河農場，在選舉人民代表時，這些勞教人員居然停工一天，同公安人員一起去畫一個圈投票。不過，這以後就再不演這種滑稽戲了，大概暫停這部份公民權利了。專政對象怎麼參加選舉呢？

既然勞動教養是最高行政處分，那麼應有所區別於判刑勞改，然而兩者實質上一樣被剝奪自由及一切權利。被收容勞動教養不稱逮捕，但一樣戴手銬或網綁送押公安局拘留所。大陸的監獄只是監禁犯人中的極小部份，例如上海市提籃橋監獄，北京市自新路監獄，這些是「典型」的監獄，具有樹窗作用。往往在一個勞改場所中判刑勞改、勞動教養及留場就業三類人員同時存在，不過組成不同的中隊或大隊。例如上述的清河農場，轄有十幾個分場，每個分場為一個大隊，或為勞改大隊或為勞教大隊，或為就業大隊。常見的是一個勞改大隊轄幾個勞改中隊及一、二個就業中隊，或一個勞教大隊轄幾個勞教中隊及一、二個就業中隊。

一般一個大隊千餘人，一個中隊百餘人。

勞動教養人員有工資收入，但很低，一般每月廿七元、卅二元及卅六元幾等。按月發給，扣除伙食費外所剩不過幾元，記錄在一賬冊上，不給本人現金。每月按照中隊發下一張百貨供應單，物品不外是肥皂、牙膏、毛巾之類，還有限量的劣等烟卷，沒有食品 and 酒，有少量汗衫、衣褲。勞教人員沒有統一服裝，穿戴自己的衣服、鞋襪，由各人登記之後由小組造冊報中隊，經公安人員批准後，按冊送來貨品，並在個人賬冊上扣除金額。伙食為一天三餐，在北方地區是玉米麵及高粱麵摻加糖麩的窩窩頭。南方是籼米飯，另加菜湯。糧食定量一般分三等。大部份勞教人員為中等，所謂表現好及體力強的吃上等，表現不好或體弱的吃下等。糧食定量平均在卅六—四〇斤之間。由於糧食質量極差，根本沒有什麼食用油及肉類、雞蛋，再加上各種剋扣，這對於從事繁重勞動的人來說，完全處於半飢餓狀態之中。一般每二週「改善」一次伙食，吃小麥饅頭及豬肉煮的菜。不允許接受外界郵寄來的食物，每月可以接見一次家屬（社會上若有什麼政治運動就免除了），非直系親屬及朋友不得接見。每次接見，公安人員在場，一般廿—卅分鐘，家屬攜帶衣物可收下，食物不得超過二斤。公安人員常常事先回家屬談話，介紹勞教人員情況，要求家屬督促其親屬積極改造。每月可寫一封信，一頁紙的信，經公安人員檢查發出。凡逃跑者，捉獲必遭嚴懲。一般十人組成一個小組。由公安人員指定二組長，生產組長一般為體力較好、勞動技能高的人，主要安排和組織全組完成中隊指定的勞動任務。學習組長往往是靠攏政府的改造積極份子，亦即無時無刻地向公安人員彙報組內、隊內各個人員的思想、紀律、改

造情況，主持學習和批判鬥爭等。他們是公安人員控制犯人的得力助手。他們效犬馬之勞，得到的報酬是：稍高一些的糧食定量，稍高一些的工資，稍多一家的家屬接見或留下稍多一的食物，或提前半年或一年解除教養。在北方的勞動教養所一般為磚房，一排房約十間，每間寬三米，長八—十米，內無任何傢俱，有一座寬二米、通長八—十米的土炕，十餘人睡在此炕上，每人約六〇—八〇公分的寬鋪位。牆上有木架子放各人的衣物，這鋪位除睡覺外，每天晚上供各人盤腿坐着開會學習，睡前全中隊集合，公安人員點名、訓話。每天早晨公安人員進大院來集合各中隊人員出工，經門崗警衛人員核查出院人數後，列隊由公安人員押送工地勞動。一般勞動的項目、要求、定額、組織、工具，前一天晚上都由公安人員通過各組長作了安排。一般勞動八小時，不包括往返路程所需時間。若公安人員認為今天勞動完成得不好，可隨時宣佈延長若干小時。每七天，每二週休息一天。工休天往往上半天整理衛生，即捉虱子、掃地、清水渠，下半天往往開全中隊或大隊會。每一種勞動都有定額，每人必須完成定額，不然輕則扣除糧食定量，扣除工資，重則以消極混泡論處，到每月思想總結或每季度評比時成爲批鬥對象，批判鬥爭會上那一套叫你低頭認罪的方式不由你不服，另一方面延長教養期。一般每天晚上有二小時的學習，除了讀報紙，學習毛澤東著作，安排勞動任務外，常常是某人做檢討，坦白檢舉，批判鬥爭。

勞動教養政策有幾條宗旨：一是「認罪認錯，服管服教」。抓進去後第一件事是必須坦白交代所有罪錯和思想，表示悔過，接受改造。這一階段都在「學習班」裡進行。「學習班

「都有一些能寫會說，膀大腰圓，心狠手毒的勞教積極份子擔任班長，他們的任務是靠攏政府，幫你改造。如果認罪認錯，交代清楚，態度端正，那麼一般半個月就可離開「學習班」去勞動中除了。反之如交代不清楚，態度不好，就休想離開「學習班」。「學習班」的糧食定量非常低，一天十個小時盤腿坐在那裡交代問題。不僅進所之日開始必須低頭認罪，自始至終都要認罪認錯，服管服教。二是「積極勞動，改造自己」，主要是經過艱苦的勞動（不是懲罰）以培養起勞動人民思想和感情，所以勞動好壞是接受不接受改造的標誌。勞動是神聖而光榮的，要通過勞動，達到脫胎換骨，重做新人的目的。所以完不成勞動定額是抗拒改造的表現。三是「坦白檢舉，靠攏政府」。過去因為是站在與共產黨對抗的反動階級立場所以犯罪，現在要轉變立場，要坦白交待自己的罪錯，也要對別人的壞言行進行檢舉，靠攏政府。在勞動教養所不存在誣陷，公安人員鼓勵告密，互相揭發，檢舉有功。這三條綜括了勞動教養的實質內容。

原則上勞動教養沒有什麼刑罰。公安人員很少直接動手毆打勞教人員。所謂刑具只有手銬及腳鐐二種。手銬可以卡進肉裡去，可以正銬（雙手在前），背銬（雙手在後），斜銬（一手自肩上斜下，另一手自後背向上）。腳鐐有三個級別，十斤重，廿斤重，卅斤重。手銬和腳鐐可以長年累月地銬鐐一個人。有些地方用繩綁，如山西有一種長僅十尺，細如竹筴的麻繩，繩由後頸向二臂延伸反纏，將雙手反剪，上提至後脖頸處，被綁者立即由紅變白，由白變青而紫黑。一般三分鐘內必須鬆綁，否則十之八九必將殘廢。教養所設有禁閉室，即單室一間，無亮光，僅門上一孔，每天僅給一點

玉米稀粥。關禁閉最少三天，常見為七天及十天，有長達幾個月禁閉的，當然關禁閉是沒有睡覺鋪蓋之物的。

一般每個中隊百餘人，配置三十五名公安人員管理，每個大隊另配備警衛部隊。有一段時間將刑事犯罪份子、反革命份子、政治犯，分別組成不同中隊或大隊，但大多時間是混雜編在一起的。

每排房前有水龍頭，沒有洗澡之說，惡臭的廁所，沒有食堂，所謂炊事房是蒸窩窩頭。各中隊派專人按中隊人數領回後分發各人。一個月可有一、二場電影看，收看時間和節目由公安人員指定。看電影是很熱鬧的事，因為平時不准各中隊之間人員來往，看電影是任何人必須參加的，集合排隊點名，如在深秋嚴冬各抱一條被子，因是露天坐在泥土地上看，不去不行，中途回來亦不行，這幾個小時實在不是享受。但利用黑暗，各中隊之間可以悄悄地來往，進行各種秘密活動，交換情況，衣服換食物，煙卷換食物，打聽消息等等。當然改造積極份子也積極出動跟蹤，這是立功靠攏政府的好機會。勞教人員之間不斷存在毆鬥和陷害情況。有一部份是由於搶食物，勞動中分工定額等問題，另一部份是對改造積極份子的報復。總的來說，公安人員對於勞教人員之間的鬥爭，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一方面他們認為「狗咬狗——壞人打壞人，打死一個少一個；另一方面也可從中了解情況。只要不打出人命，不加重傷問題不大。公安人員最忌諱的是逃脫及搞小集團。只要有三幾個人較為接近，就有改造積極份子去報告，「反改造小集團」的帽子隨之而來。逃脫是不多的，而且幾乎沒有什麼政治犯這樣做。曾經有一個右派，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一九五七年時是有名的百花學社

成員，跑出去之後由北京到廣東，無法去香港，就返廣東，去新疆之後再返江浙一帶，八個月之久最後去公安局報到。因為大陸的社會組織很嚴密，沒有戶口，沒有工作的人不懂得不到任何收入，亦得不到維持基本生活的各種票證（糧票、油票、糖票、肉票、火柴票……）。也沒有一個親友敢收留你，如果發覺你不報告，那麼同情包庇反革命的這條罪名將使你失去一切。所以凡是逃跑出去的，大多為沒頭腦的，會偷會竊的，原先就是流浪漢。這些人逃跑抓獲之後當然關禁閉，挨鬥，往往延長勞教期限。

如果勞教期滿，而且表現良好（即便是一個改造積極份子）就解除勞動教養。解教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百分之百，現在大概有極小一部份可回原工作單位或原所在地。絕大多數是「留場就業」，即由公安部門強制安排，就業於勞改場所。大凡進了公安局的門就不大好出來了。

中共公安部門有一專門名詞——「三類人員」。即由公安部門直接監管的人員：經判刑服役在獄的勞改人員（老大），收容勞教人員（老二），判刑勞改期滿釋放及勞教期滿解教後強制留場就業人員。強制留場就業是卅多年來中共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也是世界各國所未見到過的。

中共解釋這個政策有幾種不成文的說法：凡是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犯罪之後經過服刑、勞教，不可能完全改造好，仍然需要在一定的環境之中強迫改造；這些壞人經過勞改、勞教並未完全改造好，社會上的廠礦企業、人民群眾不歡迎這些人，政府為給這些人一條生路，使這些人在公安部門的廠礦企業、農場中自食其力地生活。大陸的公安部門不僅是一個治安

五個太陽鬧天空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春曉

部門而且是一個巨大的工業——農業生產體系，它擁有衆多的工廠、建築公司、農場、礦山，擁有幾百萬絕對服從的低價勞動力，也擁有相當水平的技術力量（主要來自勞改人員中），它生產水泥、磚瓦、煤炭、鋼鐵、服裝、卡車、電子及機械產品以及糧食、水果，各種畜產品等。這些單位對外稱××農場，××公司，××工廠，對內則是××省（市）××勞改大隊。由公安人員任經理、主任、科長。這也是大陸公安部門的重要經濟來源之一。到底有多少人員，在國民經濟體系中佔多少比重難以估計。

就業人員在廠（場）內稱職工，俗稱老三，工資稍高於勞教人員。工資每月領取，買飯票吃食堂，住的房子與勞教人員無大差別，不過稍寬鬆一些。同樣編成小組及中隊，中隊長是公安人員。一周六天繁重勞動，同樣有定額，不過出工不再由公安人員集合、押送。每天晚上亦要學習二小時，只准住在勞改場所中，允許也鼓勵把家屬接來場所。外出要得到公安人員同意批准。若要回家探親，可開給一張勞改大隊證明，返回當地首先要到地區公安派出所報到，探親假、病假的規定與社會職工相同，但永遠是在「另冊」——等外公民。就業是無期的，公安部門的勞改場所就是你終身所在之處。亦有遣返回籍的（回社會上去，回原籍老家去，離開公安部門），但都屬於病老殘缺者。所以勞改證是有進無出的。除非案子平反，政治需要，才放出來，因此，就業人員卅多年來愈來愈多，如同滾雪球。逮捕、判刑一般來說尚可估計到一個大概數目。收容勞教以及強制就業有多少就難以揣測。這些人生活在絕對黑暗之中。與蘇聯的勞動營、法西斯德國的集中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參加中國大陸萬里遊，我們旅行團一行前往西安觀光，大飽眼福，博覽古今，真是百聞不如一見。這個風景勝地，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見證。

西安位於關中平原渭河南岸，原名長安。周、秦、漢、西晉、前趙、前秦、後秦、兩魏、北周、隋、唐都建都於此，是世界聞名的歷史古城。遺存有大量的地上地下文物，如西周的秦、鎬、秦阿房宮、漢長安城、唐大明宮遺址、大雁塔、小雁塔以及鐘樓、鼓樓、碑林等。周圍還有秦俑、博物館、古咸陽城、半坡遺址等。名勝古迹都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價值，這是中華民族的傳家寶。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西安市上空出現了五個太陽。這天全市熱鬧空前，除了全市人民之外，也有許多聞訊後特從外地趕來的考古天文學家、記者、旅客，在各條街道，人山人海，聚集一堂，街談巷議，天方夜譚，從而使人們增廣天文知識，頓開茅塞，開闊眼界。

據說，西安市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也連續兩天出現過「七個太陽」。這種現象科學上稱為「幻日」、「假日」。假太陽的成因和彩虹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彩虹的形成是因大氣中的水滴在起作用，它們將陽光分解為七色彩練；而假太陽的形成則同飄浮在空中的捲層雲有關。

捲層雲是一種白而透明的雲層，如縹緲的薄紗，是由大氣高層中許多小冰晶體組成，它有時像一團團亂絲，有時又像大鳥的羽毛。當這些半透明的六角柱形小冰晶垂直懸浮時，陽光經過小冰柱一定路線的折射後，再進入人們的眼中，就好像是太陽的側面射出來的一樣，於是人們就看到了太陽兩側面形成的假太陽。如果地面有良好的反光物體，能把太陽的光線反射到天空，並聚集於兩點，天空中就出現三日爭輝的奇景。大雪之後，冰封萬里，太陽光線從水晶般的大地反射到天空，也會形成假太陽鬧天空的局面。

陝西是華夏文化的搖籃之一，古城西安一直是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又是絲綢之路的起點，漢族的古老小吃與少數民族風味水乳交融。由西邦傳入的胡餅、麻餅，漢代時，曾風靡西安：「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現在芝麻餅早已流行全國。馳名遐邇的羊肉泡饅，肉爛湯濃，香醇不羶，饅筋而滑，綿韌而嚼。這富有西北風味的小吃，當年慈禧太后身在逃亡中也不忘專程一嚐。的確味道別具一格，歷來為雅俗共嗜的珍珠小吃，真是妙不可言。我們旅遊團一行人品嚐後，感覺其味無窮，人人讚口不絕。大家都說：「南方食在廣州，西北食在西安」。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可能導引

(台灣研究生·美國) 楊農

中國的現代化始自清末的鴉片戰爭，一直到今天，經過了漫長的歷程。其中台灣的現代化經驗顯示出雙重意義：(1)一個國家可以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推動現代化；(2)中國人可經由逐步的教育和練習而達成自由民主制度。

從人口密度、土地面積、自然資源等方面來看，台灣都遠不如中國大陸，但經過三十八年的隔海而治，今日台灣以不滿二千萬的人口，所創造的經濟力量幾乎是中國大陸的四分之一。經濟的成果可由定量分析比較高低，而政治的成就則須做定性分析。以任何一個衡量政體是否自由民主的標準，來比較海峽兩岸之政治建設，無疑的，中國大陸亦遠落後於台灣。最近海峽兩岸發生的事件，中國大陸全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台灣則廢除戒嚴令和相關的二十幾種法令(台灣更走向資產階級自由化)，將使兩岸的政治差距更加擴大。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社會多元化將使台灣成爲一個會有高能量的動態地區，整個台灣將很快熱絡起來。這將不只影響著台灣，亦將一波一波地衝擊著中國大陸。因此，我們將很快看到海峽兩岸的互動層次將提高，而台灣將對中國大陸產生多重導引。

一、經濟領域的導引

近七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除了吸

取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社會主義」經驗外，亦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其中以深圳特區的規模最大。「經濟特區」的設立具有雙重目標：(1)短期目標是以免稅、減稅手段和其它靈活的措施吸引外資和先進的技術及管理方式，創造就業機會，以賺取外匯，進而支援其它建設；(2)長期目標是爲未來中國大陸更深更廣的經濟改革鋪路，具有試驗性質。

事實上，全世界類似中國大陸「經濟特區」的地方有二十多個，分佈在十多個國家。台灣就有三個，稱爲「加工出口區」，其中的高雄加工出口區是全世界設立最早的，其首創的目的即爲達成上述的短期目標。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是全世界類似地區的典範。南韓亦向台灣學習，亦獲得了很大成就。中國大陸的「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執政後提出的「經濟學台北」之第一個產物，若運行成功則利益甚大。

今天不論中國大陸設立「經濟特區」的成果如何，這是海峽兩岸分離三十年後，台灣第一次對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中產生的導引力量。根據旅美經濟學家費景漢博士的看法，中國大陸高級經建官員對台灣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政策之形成非常嚮往而有模仿之意。

然而，中國大陸若欲進一步汲取台灣的現代化經驗，必須恢復和保障私有制度，積極鼓勵私人企業，使之不受限制地擴大發展，並逐步把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目前中國大陸採行的

黨政企分離之原則只能治弊於一時而無法長期激活所有企業。因爲全世界亦有不少國家擁有龐大的國營企業，且無黨和政的強力控制，但其經營效益都比不上私人企業。可見中國大陸經濟的病根不在黨政企之是否分離，而在所有權是否屬於私人。

二、政治領域的導引

根據外電和「中國之春」等雜誌的報導，去年底中國大陸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目標是爭自由爭民主，除了受到內部環境的激發外，亦受到外來的刺激，即來自台灣的解除戒嚴和成立反對黨的影響。

台灣政治民主化大致和經濟自由化齊頭並進，但因戒嚴法的存在而無法使民主政治的層次快速提升。台灣長期實行地方的自由選舉，完成了地方政治權力的分配和社會利益的平衡，在中央層次上則由絕對控制而逐漸寬鬆，繼而準備在適當時機完成中央權力的再分配。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亦同時引起社會的多元化。在多方面影響下，台灣將很快成爲一個開放的動態社會。

由於馬列毛意識型態的局限，自由選舉的民主制度在中國大陸是遙遙無期的。但同樣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北歐諸國是在民主制度下推行其社會主義，且西歐共產黨亦都主張議會民主。然而同樣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却嚴厲拒絕實行民主。實際上，在理論上社會主義是可透過民主制度而實踐的。中國大陸可以十年爲期，完成鄉鎮級的地方自治，以二十年爲期，完成省縣市級的地方自治，並在三十年內完成中央層次的全國大選。若有決心，當然可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上述目標。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是分不開的，兩者必須同時並進才能產生良性循環。中國大陸目前只處於非常低層次的經濟自由化階段上，若連最低層次的政治民主化都沒有，則經濟改革不可能再前進或提升。

三、聚合理論的導引

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一些斷言，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二次大戰後較能解釋兩大體制變遷的社會學說為聚合理論：不同的社會朝現代化發展後，其間的差異性將減少，而同質性將增加，最終將呈聚合作用。

北美、西歐、北歐和日、澳等已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修正其資本主義，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的道路。而蘇聯、東歐、中國大陸、古巴等共產國家，亦為了促進其經濟發展、提高生產力，也都在相當程度上修改其共產主義。雙方遲早一定會產生聚合作用，使兩個原本矛盾和對立的社會制度，逐漸減少矛盾和對立性，消失其異質性。雖然雙方都朝對方修正，但顯然，資本主義國家吸取社會主義的福利觀念在時間和速度上，要比共產主義國家採納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來得早和進行得快，且顯出沒有意識型態的包袱。反過來，所有共產主義國家的修正過程都非常痛苦，這可能和缺乏民主制度有關。

而對聚合理論，今日台灣處於較幸運的階段，因它不必再經歷類似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必須向共產主義方向做某種程度的修正，更不必像今日共產國家那樣必須大幅度地朝資本主義修正。反過來，中國大陸極其不幸，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歷程，即使付出龐大的代價後，仍須要向資本主義大踏步地跨近。從世界

潮流來檢討中國大陸之局勢，顯然，它亦將受到聚合理論的導引。

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可以說是中國人追求國家全面現代化的歷史。但當我們冷靜和理性地反思時，歷史上的很多過程亦是我們自我抉擇的結果。一九四九年是中國現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分水嶺。從此以後國民黨和共產黨隔海而治，各佔領著一塊地盤，各自進行着不受對方干擾的實驗。國共兩黨各按其意識型態擬定全面的國家現代化的實驗計劃，由兩黨各自自主地支配一切力量。經過三十多年的實驗，現在是可以檢驗其結果的時候了。

中國大陸的經驗顯示，根據馬克思主義建

海林

獻給勇敢者的歌

脚下的路泥濘、曲折而又飄忽不定
但終究可以通向大海、笑臉，
和鳥兒落脚的地方
理想的樂園在遙遠的極地
在重迭的山峰和連綿的大海另一邊
夢幻也不能敘述詳盡
但把心連着心吧
我們就能漸漸靠近
表徵航船的是桅杆
支撐生命的是信念
誰也不能證明我們不能結出豐碩的果子
但生活的花環只能靠自己編織
奮鬥吧
進擊者
毫無顧忌的奮鬥
我們頭頂上的天空
深邃而又廣渺
那就是保佑我們生命的傘
讓我們用足跡向天空證明我們的不朽吧

立的社會是自我封閉的體系，若長期運作下去，會產生自毒作用而最終害死自己。而若欲開放以引進資本主義，却又會被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所消融。故而中國大陸陷入不開放則有內生性自毒現象，而開放則有外生性相剋現象之困境。台灣的經驗則印證了聚合理論的解釋，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可去蕪存菁地與外來文化進行適當的文化融合而獲新生。

歷史的巨輪不斷地前進，前進的方向將影響未來的世世代代。海峽兩岸都在變化，變化的方向若能遵循人民的願望，則參與推動歷史巨輪的人都將受到人們的崇高敬仰。

白鴿飛過雪地
又折回城中
向廣場、人羣、城堡宣告
郊外的雪地上長出了道路
一雙雙眼睛像晨醒的天鵝閃動
體味着白鴿帶回的信息
道路，雪地上的道路
通向郊外的道路
記憶的閘門打開了
人們心中又洋溢著溫暖季節才有的信念
於是
一羣孩子首先跑來
嬉笑着
說要去樹林裏捉迷藏
小伙子們來了
當然帶着姑娘和吉他
道路向人們打開了
在雪地上
在冬季裏

在冬季裏

勿讓時間蹉跎

打開「死結」重返國際社會

(台灣留學生·美國)王新奉

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撤退到台灣，當時與世界各國維持邦交的尚有相當多國家。但到了一九七二年退出聯合國時，陸續與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中止了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共，雙方結束官方關係，而僅保有了商務、文化等非正式關係。在此同時，由於美國的影響，連帶又引起連鎖反應，導致部份國家與美國跟進。當時國民黨堅持「漢賊不兩立」及「一個中國」的不切實際原則，迫不得已只好放棄若干原已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至今，與國民黨有正式邦交者，大、小不過二十多國而已。而在這二十多個國家中，處在風雨飄搖的如南韓、沙烏地阿拉伯、教廷又都呈現不穩局面，能否繼續維持正常外交關係，端視上述三國是否與中共建交，國民黨則完全處在被動地位。

曾任國民黨外交部長職務的葉公超先生，當年目睹局勢的演變，曾建議接納中共入聯合國，而在台灣的國民黨也不退出聯合國。如此

非但可以保有聯合國席位，與世界各國間依舊可以維持相當的外交關係。可惜葉公超這一建議非但未為國民黨最高當局所接受，反而因此被摘了烏紗帽。所幸者，葉當時為美國朝野部份人士所識，而獲外調駐美大使。但是國民黨高層那種執迷不悟、僵化頑固政策，使人一覽無遺。事實證明今日國際現勢，葉公超不愧為有遠見的外交家，如當時能接納葉的建言，國民黨也不致於像今天這般困守台灣一隅，外交上處處碰壁。

我們現在就事論事，國民黨在國際社會上遭遇今日這種尷尬處境，雖然自退出聯合國時已種下遠因，但是「漢賊不兩立」的不正確觀點，始終沒有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與考慮也是原因之一。延誤至今，造成一種不可收拾的局面。我們在此不禁要指出，國民黨的領導們，你們「漢賊不兩立」、「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鴛鴦策略，何時才能醒悟？儘管你們對

不利於你們「基本國策」的事情常冠以「國際姑息逆流」作祟，一再以「違背國家基本利益」為藉口，退出許多國際組織，豈不知你們的那些論調是在自欺欺人嗎？台灣島上一千九百萬人民的實際利益在那裏？由於你們的錯誤、不切實際的決定，使他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這種顯然人為的錯誤，豈能允許再因循苟且下去？！

國民黨近來在政治上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解除戒嚴、兩黨公平選舉、報禁的即將開放，較之中國大陸的共產黨因學潮而罷黜胡耀邦，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黨籍，又大肆逮捕為爭取民主、自由參加遊行的學生、工人，冠以莫須有的罪名，兩者相較，你們的確是在朝政治改革、厲行民主的方向努力邁進中，但是為什麼不能朝更符合實際利益的道路邁進呢？令我們懷疑的是，難道你們真的依舊活在「恐共」的陰影中？否則，何以凡有中共參加的國際組織你們都不敢和他們面對面作戰？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你們應該勇於承擔過去決策的不當，重新調整策略；即與有邦交的國家不論她是否即將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你們都不該主動與之斷交。不但如此，更要和斷交的國家恢復或擴大比商務、文化還要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此，已存在的或可能陸續發生的一些外交困擾，都可因此而得以解除。

政治本質是現實的，國際社會現況更是如此。如果你們在這個現實的國際社會中生存，就必須放棄你們的口號！那些誤人誤己又不切實際的口號，落實到現實層面上，以既有的、較之中國大陸更民主、自由的政治資本，本着不退讓、不規避原則，不再自我設限，不再畫地為牢，為了實質利益，再重返國際社會。

方勵之的最後公開演講

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人民代表競選講演

會上的講話摘要（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

編者按：中共中央編輯的、供黨內批判用的「方勵之言論摘編」，本刊編輯部已取得一本。其中大部分方的講話已在中國之春上全文發表過。現本刊選擇這部「批判」材料的最後一文——也就是方勵之教授被革職前最後一篇公開演講，予以發表。

今天我非常高興，非常激動，在科大的確有了這種民主意識，而且表現出這種民主意識（鼓掌）。大家對這次選舉議論很多，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議論也好久了。有的人說突破口在什麼地方？我想，群眾通過這件事表明他們會找到怎麼樣來進行這場改革的辦法的（鼓掌）。今天在科大師生中已經看到要改變原有那樣一種方式的選舉，這已經是找到了一個改革的重要內容（鼓掌）。以前那樣的選舉的確是不怎麼民主的（喝彩、鼓掌），選舉這樣的代表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那時我是北大二年級的學生，還不到十八歲，所以我沒有選舉權。但那次我們班上的選舉是由我來組織的，因為我是班長。從那以後多次這樣的選舉是極端不民主的，你要不去投票，要問你為什麼不去

投票？你若投反對票，要問你為何投反對票？我本人有相當次數是能棄權就棄權掉了（鼓掌），這是實話。我覺得這次倒是真正的，一些人開始講自己的綱領，講自己競選的想法，這的確是選舉開始走向民主化了（鼓掌）。這到底對我們國家有什麼作用？我覺得剛才許多同志談的很對，就是要促使我們整個共和國更加民主，更加繁榮。

這件事不只是我們科大人在做，今天中午我碰到一個剛從全國人大來的同志，他告訴我一個消息，給大家通報一下信息（鼓掌）。據說，最近或前不久青海省選省長，的確以前這樣的選舉是某某圈定，然後再選舉，實際大家不一定認識他。青海省在選時也是原來定了某某某，但選了幾次均沒選上，還要省委書記到各個代表團去工作（大笑），但最後還是沒有選上（大笑、喝彩、鼓掌）。這件事情被某些對民主缺乏認識的人認為是個亂哄哄的大會，讓青海省自己寫總結——也就是寫檢查。但是青海省認定這次大會開得很好，是個團結大會，勝利的大會（喝彩、鼓掌）！我想不光我們科大有這個意識，全國也有這個意識。還有比如最近，在吉林省也是選一位人大的領導，忘了具體人員了，也是原來指定了，但最

後也沒有選上，而是選了另一位。這才能有真正的民主化的開始。的確，我們的人大有很多形式的東西，甚至人大的一位副委員長寫這樣的文章，他說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是三千比零，比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那種五十一比四十九要好得多（大笑）。表明這種人連起碼民主都不懂（熱烈鼓掌）。因為這件事表明不同的意見下進行表決，不同意見的出現是非常自然和非常應當的。如果不出現，已經表明某些意見被壓制了（鼓掌）。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一個會議，不同的人來表達自己的意志，表明自己的想法，這完全是一種非常好的現象。至少在我們科大有了這種民主化的意識，也就是這種觀念大大增強了（鼓掌）。但是大家注意，不要以為這種民主化

按：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共產黨員方勵之近年來發表的一些講話，明顯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已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不良影響。現將方勵之的一些講話摘要匯編，供領導機關和高等學校的領導幹部研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參閱。

▲說明：這是中共印發的批判材料——
「方勵之言論摘編」按語。

進程是非常快的。我當然會說民主化增長了一
步，並不是因此說會有很大變化，把中國像烙
餅一樣從非民主化狀態一下翻個個兒（大笑）
。我個人覺得大概不可能翻個個兒，因為中國
的問題太多了，中國的封建主義太長了，從上
到下都有各種封建主義在侵蝕我們。所以，這
決不是簡單的事情。哪怕對我們今天的會議也
不一定就沒有外來壓力（長時間鼓掌）。

我說這件事不是沒有根據的。剛才有很多
同學來問，最好講講上星期天有一位中央領導
同志和我辯論的情況（喝彩）。關於這個問題
我覺得應當有義務來跟大家講（鼓掌），但是
在這場合要遵從辯論的道德，就是另一方如果
不在，只有我在，是不妥當的。所以，我想在

●台灣專欄●

對台灣「四·一九」事件的雜感

（台灣新移民·美國）鄒國仁

近一個多月來，凡是關心台灣民主政治和
台灣前途的海內外華人，都在注意民進黨要在
四月十九日到總統府前面示威的可能後果。

民進黨此舉，是爲了反對台北當局制訂國
家安全法，於是決定發動「四·一九」行動。
由於總統府是國府的權力中心，政權的象徵，
國民黨對民進黨一再聲言決不改變「四·一九」
的決定，反應極爲強烈，呈現了近幾年來空
前的緊張氣氛。

但是就在「四·一九」的前兩天，民進黨
在四月十七日突然宣佈示威延期舉行，一時之
間台灣的輿論都說這是一項明智的決定，有的

適當的場合跟大家講。在辯論的時候至少涉及
到一個觀點，我認爲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
（喝彩），是靠自己爭取到的。這樣的情況，
今天是最明顯了。在科大比較民主的這樣一個
環境，哪怕是這樣一個環境，大家還是爭取得
到的。這並不是我們要壓制民主或非民主，而
是由于傳統觀念在我們身上的烙印很多。

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
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長時間喝彩、
鼓掌）。像我們這樣的做法，可以說不是沒有
外來壓力的。在今天這樣一種場合，大家可以
自由競選，這確實是一種進步。而在六年前大
家可能不知道，在北大進行了自由競選。而結
果呢？的確有兩個同學給選上了，也當了代表

還說是表現了政治的智慧，保住了民主的生機

。實際上延期舉行並不是不舉行，只是把時
間延後一個月而已。民進黨要國府在一個月內
解除戒嚴法，否則仍將在五月廿四日上午十點
到總統府前示威，而且「絕不再延」。民進黨
的說法是：「去年秋天，蔣總統經國會向中外
記者宣布，將在去年底前解除戒嚴，此一政治
諾言迄今尚未實現。」

國民黨就此事已明白表示，必須在立法院
完成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的立法程序
後再宣告解嚴。而且國民黨的人士說，蔣經國

。但是，後來在分配工作時被穿了小鞋（不滿
的呼聲）。今天並不是沒有阻力了，仍然有人
要阻礙民主化的進程。因此，我做爲一名副校
長，在校一級領導的水平上，要保證所有選舉
人和被選舉人及發表各種觀點和看法的人受到
保護（長時間喝彩、鼓掌）。這個會議應當成
爲科大民主化進程的一個起點。我再次保證，
要保護這樣一個民主化的環境。如果誰要對發
表意見和看法的這些人採取六年前對北大那兩
位學生那樣的辦法，除非把我們撤職查辦（長
時間熱烈喝彩、鼓掌）！

（摘自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記者團、學生會
主編《科大青年》增刊）

也沒有向中外記者宣布要在去年底之前解嚴，
只是在去年十月七日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公司
董事長葛蘭夫人，和該報主編葛林斐德、新聞
周刊編輯簡浩賢等人的訪問時表示，將儘早解
除戒嚴令。

因此照這個情形看來，國民黨當局不可能
在一個月內宣布解嚴。既然如此，民進黨要到
總統府前面示威的原因並未消除。所以可以這
麼說，「四·一九」行動的宣告延期，只是把
一枚定時炸彈的爆炸時間，往後延了一個月而
已。除非在這段時間有重大的轉機，衝突的因
素始終存在。

對於民進黨宣布延期的原因，海外的華文
報紙因爲立場各異，說法不一，筆者不想多加
引述。但是我認爲一向爲海內外華人所敬重，
尤其是被一批反國民黨人物視爲高風亮節，一
度還受到國民黨攻擊的陶百川先生，在四月八
日寫的一篇「立法院要自修，民進黨要自制」
文章，有些話是頗爲中肯的。他說：

「開展民主之道，當然尚有其他課題，但不能一步登天，祇要政府確實在作，我們便應樂觀其成，不可操之過急，興風作浪，以致欲速不達，功敗垂成。」陶百川先生認為「四·一九示威抗議在民進黨內尚未形成共識，一般人民可能連一向支持民進黨的在內也未必能冒險盲從」，因此他奉勸「主其事的黨外人士能夠適可而止。否則，面對政府的強硬心態和社會的袖手旁觀，黨外如果一意孤行，則大者可能重演高雄事件，釀成下獄，小者可能暴露黔驢之技，留下笑柄。兩者都非民主之福。」

因此陶百川先生以黨外一個多年老友和為民主長期奮鬥一個老兵身分，明白指出「四·一九」的主體是錯誤的，地點是錯誤的，策略是錯誤的，後果將會很嚴重。

陶百川先生雖然是老國民黨員，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黨外的多年老友，他在為民主奮鬥的過程中，甚至在多年前就辭掉了現在大家爭得頭破血流的資深監察委員，也就是不必改選的監察委員的職位。當國民黨和黨外進行溝通時，他是中介人士之一，但是由於黨外的絲毫不肯讓步，使他也為之心灰意冷，所以雖然他「迄今尚認為（溝通和中介）很有價值，而且尚有做的必要，不過不能再由我參與而已。」自從民進黨在三月底宣布「四·一九」示威後，筆者陸續碰到一些剛從台灣來的記者、教授、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他們的有些談話，非常值得重視。

一位資深的記者說，「四·一九」不會搞得起來，一般人民看得很清楚，既然國民黨已經開放了黨禁，也決定開放報禁和解嚴，就不應該這樣搞下去，除非有事實證明國民黨沒有

誠意，是在騙人。但由目前種種趨勢看來，即使國民黨想騙人，恐怕主客觀的情勢也不允許它騙人。

這是屬於樂觀的一面。

但抱着悲觀、至少是憂慮的人不是這麼想。不止一個人對我說，台灣的教育雖然說已經很普及和發達，但一般民衆的民主認識和政治修養，坦白的說，還差得遠。如果不相信，可到各縣市議會、省議會去聽聽某些議員的發言，有的水準實在不敢恭維，但每次都能高票當選，因為這些人會罵，一些激情的句子令人聽了過癮。就拿民進黨的一位較為衝動的立法委員朱高正先生來說，他是留學西德的博士，以哲學家自居，但在立法院中打架的是他，罵「幹你娘」也是他。當然，你可以說他是在作「秀」，只是這種秀實在令人不敢恭維。



立法委員朱高正的演講神情

民進黨內，有些主力人物，經常開口作一個台灣人如何，閉口作一個台灣人如何，在立法院中公開對外省籍的委員說「你們吃台灣的蓬萊米四十年，為台灣作了些什麼事？」這和台獨分子所說的內容異曲同工。台獨一向把外省人當豬，對於用蓬萊米餵外省豬，他們感到氣憤無比。台獨不但把外省人當豬，連同情外省人，認同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也當成豬。

筆者遇見的幾位教授，認為民進黨中的一些人有這種心態，是非常可怕和令人寒心的。台灣今天不但沒有被共產黨統一，而且還有今天的生活水準，這些「外省豬」的功勞絕不下於台灣人。就拿那些人說的蓬萊米作例子吧，台灣今天擠了一千九百萬人，在那彈丸小島上三分之二是山地，但是在包括「外省豬」在內的共同研究努力下，倉庫已堆放不下蓬萊米。

有些高級知識分子甚至說，既然把我們當豬，不讓我們活下去，我寧願讓共產黨來統一台灣。

一些外省籍的退休軍教人員也無比悲憤和失望的說，國民黨到台灣後的政權主要是靠追隨它到台灣去的一批外省軍教人員維持住的，一直到今天台灣仍以軍教人員的生活最清苦，但是今天在一片「崔苔菁」（註：即會吹牛的台灣青年）的作風下，外省子弟的出路在那裏？民間企業的人事廣告中，到處是「限台籍」的字樣。地方基層政治中，那有外省人參與的分？一位台大畢業的外省女生說，她考進了一家運輸公司，沒有一個人肯用國語對她說話，不到三個月，主持人對她說「我們這裏都是講台灣話的，妳在這裏可能不太方便。」一位退役的旅長說，如果有一個高階缺，在衆多候選人中，台灣籍的一定佔便宜。



民進黨某些人仍熱衷于街頭運動

許多退伍的老兵認為國民黨對不起他們，他們把一生的青春、精力都獻給了政府，臨老能住進榮譽國民之家的已屬幸運。榮譽國民是退伍老兵的代名詞，但是他們的生活實在顯示不出有什麼榮譽，可是這些老兵實在太可愛了，他們絕大多數仍是支持國府的，仍然充滿了愛心，經常可看到報導說，一些老兵在臨終之前，把畢生省吃儉用的積蓄捐給需要幫助的人。但是也有的人在悲憤之餘說，我們為保衛台灣的安全，維持台灣的穩定，犧牲了一生的幸福，現在台灣人却要趕我們下海，我情願趁國民黨現在還有力量時，先消滅這批要我們活不下去的人，那怕是同歸於盡或打開大門讓共產黨來都甘心。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我們在海外的人簡直不敢想像這種情形成為事實，會有什麼後果。因此有人擔心，民進黨處處強調台灣人如何如何，對國民黨的步步進逼，一旦國民黨失去了一名可以統制全黨，一句話就可以壓服所有人的意見的領導人，台灣極可能發生一次驚天動地的政治反彈，它們的結果小焉者死人無算，大焉者共產黨乘機渡海。

任何一個關心台灣前途的人，都不希望看到這種結果。

今天國民黨的當政者也好，台灣的報紙也好，無時無刻不在強調台灣今天已無省籍隔閡。但是從海內外的種種現象看，民進黨、台獨和一些台灣人的團體，已經把省籍問題弄得很大。在海外，台灣人要和中國人劃清界綫。兩年前，美國選出的美國小姐因為母親是台灣人，於是中文報紙都強調她的一半華裔血統。但是當時紐約有一個台灣人的組織，一定要這位美國小姐說出她是台灣人後才感到滿意，認為是打了一場勝仗。其實這是場幼稚可笑的事

，人家明明是美國人嘛。選美在美國根本是一種商業行為，為什麼非要逼着美國小姐說自己是台灣人。

而在台灣島內，民進黨的人口口聲聲說民進黨不是台灣人的黨，也有外省人，例如「費老」費希平。說起費老，許多人為他抱屈，因為民進黨為了表示他們的黨也有外省人，所以把費老擺在那裏作個樣子而已，多年前就在報上看到費老要退出黨外組織的消息，因為開會時費老聽不懂台灣話。

這次民進黨要搞「四·一九」，費老說了幾句肯定國民黨成就的話，而且公開表示不贊成以共產黨的方式來鬥國民黨，於是又受到民進黨一些人的攻訐。有些民進黨人士只是在口頭上尊稱他一聲費老，實際上費老的心情應該是很複雜的。

民進黨在立法院中，還不斷以語言否定外省籍官員和委員的存在。管你聽不聽得懂，他只說他們的台灣話。這樣下去，還談什麼省籍和諧，互相溝通？只會增加彼此的不和。加上上述的種種情形，只會挑起一些無謂的仇恨。當然，絕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是這種心態，今天在台灣許多外省人娶了台灣太太，許多外省人嫁了台灣先生。但是大家經常在報紙上看到上述的那些消息，會起傳染作用的，而且報紙上不斷報導這類事件，會使人把少數人的意見和作法，當作是普遍現象的結果。

社會的大多數是沉默的，台灣的一些團體，應該組織這些沉默的多數，表達他們贊成或反對某一種意見或作法。

當然筆者絕不是希望以另一股力量來壓制民進黨的聲音和力量，只是希望大家能聽到，除了民進黨的聲音外，還有其它的不同聲音和意見，而且這個聲音可能更符合人民的希望。

請化被動爲主動

——談台灣民衆團體及學生請願事

(台灣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國府的立法院三月間真是一個熱鬧非凡的「民主殿堂」，無論堂內和堂外，都給人有種目不暇給的感覺。堂內的風波一波接一波，堂外的陳情、請願也一批接一批。堂內的，我們暫且不談，堂外的這些陳情、請願，實在值得我們探討。

三月廿四日國府立法院門前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四批來自不同階層的團體。計有：台灣大學學生六十多人，爲了要保障學生人權及早日實現「教授治校」理想而請願；有來自嘉義新港鄉民抗議「中洋工業區」的設立；有台南七股養殖業代表爲了魚塭被拆，請求主持公道；又有山地同胞抗議「原住民」權益受損請願。總共人數約有二百多人，齊集在立法院大門口各自進行陳情、請願活動。他們陳情、請願的理由雖然各有不同，但是所要爭取的不外乎權益問題。其實這些問題並不是一朝一夕才產生的，有些是早就潛伏在那裏。只是沒有人願去挖掘它，也沒有人敢去挖掘它。現在隨着政治改革的升高，民主化逐漸的步入正軌，這些問題也跟着明朗化、公開化。以往曾有民間團體請願的，如二重疏洪道問題，洲後村的村民就曾前往行政院請願。以往也曾有學生前往教育部陳情，但是像這次台灣大學學生有規模、有組織地向立法院請願倒是少見。這些請願、陳情者的背後是不是隱藏着一些有苦難言、有冤難伸之苦呢？

去年底在台北市以最高票當選的立法委員趙少康先生，在今年立法院質詢時曾以「蠟燭心理」來形容國民黨的政府。他認爲政府未能主動掌握民意，事事不逼到頭上絕不去做。就是做了也是心不甘情不願，最後民衆並不領情，結果兩造不歡而散。他的比喻至爲恰當，正應了「不點不亮」的那句話。也一語道破了國

民黨政府的多年沉痾。想想看，平時政府部門每在制訂法規、政策時，有沒有真正做到公平、合理又顧及民意？是不是都一廂情願地在閉門造車？遇到有「窒礙難行」的時候，有沒有仔細考慮解決之道？人民向政府部門陳情，往往得到的是敷衍搪塞。日久民怨愈積愈深，最後被迫只好捨棄向行政機關伸訴，也就是放棄了走行政救濟的路，改走自力救濟的路。走向街頭示威、遊行，走向立法機關請願、陳情，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部門已喪失了公信力？

無可否認的，國府有些行政部門所做所爲仍有可圈可點之處。他們每在訂定重大計劃或草擬重要法令時，不但邀請學者專家參與其事，同時也邀請相關業者舉行聽證。像即將開放的報禁，新聞局在修改「出版法」及其施行細則前，就由學者專家組成一個小組先行研擬，新聞局主管出版業務的人員，又分別前往台灣省新聞處及高雄市新聞處舉行座談。這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除了兼顧民意，也希望制定出來的法令不是徒具條文，也能符合實際需要。可惜的是，像這樣開明的部門畢竟是少數。

由最近一連串民衆團體請願事情的發生，我們可以看出國府的行政部門與民衆間實在欠缺溝通，也缺乏主動，完全忽略了政府與民衆雙向交流的重要性。現在國府正大力推行政治改革，我們殷切期望的是，請加緊腳步，先從一些人的心理改革、尤其是一些基本觀念。

長期以來國府的政府部門始終有種高高在上的錯誤心態。民衆遇事每每不得其門而入，即使得其門而登得堂來也是挫折連連。

雖然國府的行政部門在處理公務上，有一定的程序及時限，可是就有些自認是「官」的人員，把「推」、「拖」的惡習用處理公務上來。像這種處理公務的手法，如何能得民心

？我們認為既然政治要革新，就要破除情面，大刀闊斧把這些不顧民意、不顧為民公僕的政府「官」員，一律革職，不要等到事情發生了，才來論過治罪。到那時，不但於事無補，到頭來受害的還是老百姓。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返台時，曾多次與青年學子聚首。他期望年輕人不要隨意妥協，要有向權威挑戰的精神。他同時也鄭重呼籲國府的教育制度，應該讓年輕人更多把握自己的命運。這是多麼中肯而又鏗鏘有力的話。

以往，台灣的學生們只注意個人升學問題、在校考試問題、畢業後出國留學問題。安分守己有加，開創局面不足。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就是「升學制度」以及學校的「管理制度」所造成的。把他們自小學、國中、高中、乃



原住民族青年為抗議墳墓被挖「原住民」權益受損示威遊行並請願

至大學，一個個都塞進了框框裏。小學有訓導處；國中有訓導處；高中有訓導處還外加了軍訓教官。到了大學不但與高中一樣，反倒多了一個知識青年黨部。把青年們個個塑造成了「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乖寶寶。

隨着時代變遷，台灣的民主意識抬頭了。大學生們逐漸察覺到，他們的人權遭到剝奪，從而萌生要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的念頭。從去年台灣大學李文忠案開始，一連串的校園事件，給台灣的教育界帶來莫大衝擊。如今大學生爭取校園民主、教授治校、以及要求軍訓教官退出校園等問題，都已迫在眉睫，亟待解決。以往，對於這些問題，學校當局的想法相當迂腐，認為校園若太民主，必定會造成不安。因此就有了軍訓教官的設置，把學生當成軍隊來管理。並且還有了知青黨部的設置，把學生有組織地串連起來，不但平時易於互相「聯繫」，每到選舉時又可發揮它最大的功能。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軍訓教官在學生生活輔導上佔有一定地位，但是我們也想知道的是，對於這些人員的配置，除了學生安全及校園安寧之外，在思想及行為上，有沒有約束學生之嫌？有沒有想統馭全局的打算？像前不久，台灣大學的「大新社」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校方顯然忽視事情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以為學生在各種約束下不會走極端。結果，事情却愈演愈烈。學生在洞悉學校這種心態，失望之餘，才挺而走險，集體向立法院請願的。他們所提出的「非學術力量干涉大學決策」、「校長對教師聘任權集中而片面」、「校園地位無保障」、「軍方力量介入學術活動」、「校長及其他學術行政人員擔任黨部首長」等問題，都是存在已久、而且並不是台灣大學一個學校所僅有的僵化教育制度下陳年老問題。

祇是台灣大學的學生們鼓足勇氣提了出來。教育部也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部長換了幾任，高等教育司長也換了幾任，誰也沒有勇氣主動地把這些問題提出來，更遑論解決了。人人抱着一動不如一靜，蕭規曹隨，好官我自為之的心態來對待這些事。

現在學生們對政府的改革脚步已感不耐，尤其是教育制度。從這次學生在立法院請願看來，他們是有決心要爭取到底的。國府的教育部還能再敷衍下去嗎？

我們縱觀這些民衆團體以及學生們向立法院請願事件，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國民黨的心態依舊是停留在得過且過的階段上，就是不願突破那層擺在眼前的障礙。事事處於被動，大者由與中共三、四十年來敵對的情勢，以及最近中共不斷的統戰看來是如此，小者由國內的一些改革措施上的僵硬化與牛步化看來，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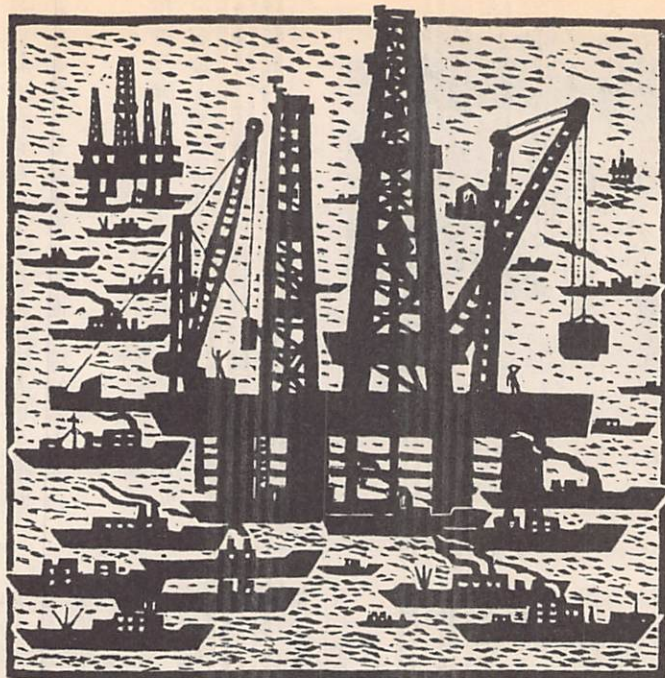
我們始終不瞭解同時也認為遺憾的是，為什麼事事都得被動，就不能稍加主動而防患於未然嗎？我們想這完全是「為」與「不為」的問題，「民主」與「專制」的問題。

如今香港問題早已塵埃落定，澳門問題也有了期限，剩下的就只有台灣一個問題了。如果此時能真正把握契機，不論在行政上、教育上，只要是不合情、不合理的，都能徹底去改革。真正為中國人做點事，對外，也許還有些許有利籌碼可資運用。對內，也許可爭得一些人民的向心力。我們多麼迫切地希望能看到，那時立法院是一個平心論政的民主殿堂；我們又多麼迫切地盼望能見到，那時街頭出現的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國府的官員們，你們認為如何呢？請讓我們的願望成真吧！那麼就請加緊脚步，主動推動改革吧！

七月四日，難得遇上個休息日，樂得和美國老百姓「普天同慶」一回。紐約那邊熱鬧極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大名鼎鼎的晚間新聞主持人丹·拉瑟整天坐鎮電視屏幕，連領帶也不打，起勁地作自由女神百年慶典的實況報導。倘若不出門，電視上也有不少精彩鏡頭可看。但是老婆孩子這回不當「沉默的大多數」，非要

外，乖乖，可是大有看頭呢。於是和家人取得妥協——看軍艦去。

駕車到了三十號碼頭，就見那龐然大物泊在岸邊。美國人向來愛湊熱鬧，這麼大的場面遇上了，自然如蟻附羶。當然，要排隊。隊伍已經老長老長，沿海岸蜿蜒而去，望不見頭。自然，這種隊伍屬散兵遊勇式，你要大咧咧地



●留學生園地●

看軍艦

(美國) 鍾閒之

勇毅。看，我連找這麼個微不足道的隊伍之「根」，尚且覺得艱巨，他們却要碧落黃泉地搜索五千年文化的根——何況這根聽說又伸延至每位傳人的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之中，玄妙得很。這麼胡思亂想着，不覺到達了「源頭」——其標誌是兩名水兵給前來「入伍」的人分送說明書。他們的軍服白得耀眼，絕對無懈可擊，令人讚嘆。我同時又納悶，穿這般雪白的戎裝，怎好洗甲板，擦那十六英寸口徑的主砲的內膛？

於是手執說明書，運出生平所積聚的耐性，躬身於長龍之內。說明書無甚看頭，軍艦光榮的征航史加上兵員、設施，如此之類。我只擔心現在艦上的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官兵仍達一千六百多人，沒得仗打，哪有這麼多事情讓他們幹去？

長龍在慢條斯理地蠕動，人們都很安居樂業似的，一路看風景，自己也做了風景給人看。看夏裝輕盈的仕女，看嬰兒車上熟睡的紅臉蛋，看海鷗，看碧藍天下的廣告牌，看自己在海水中的怡然倒影……，一條大漢把汽車開上人行道，滔滔而來，叫賣「冰鎮啤酒」，可惜天氣涼快，人們並不急於解暑。再隨隊移動過去，却見一男一女大聲叫賣「尼加拉瓜古柯鹼」，使我大吃一驚，以為今天「普天同慶」，連販毒也合法了。原來他們是在唱雙簧，借題發揮，攻擊美國政府軍援尼加拉瓜反政府遊擊隊的政策。他們這麼一吆喝果然能聳人聽聞，隊伍中的人頭一齊左傾，看他們的花樣，他們就拿出好些白色的小紙包來，嚷嚷：「各位試試，試試這尼加拉瓜的純正古柯鹼，雷根就是用納稅人的錢，買來這些……」一邊演說一邊向人贈送，可是，沒人斗膽去領「毒品」。

出門不行。說也是，陽光這麼明媚，為什麼要呆在家當土鼈子？舊金山沒有自由女神，但是著名的「密蘇里」號軍艦正在這兒訪問。當年，就是這艘飽歷戰火的巨艦，駛進東京灣，在甲板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據說這艦也大得可以，主砲的口徑有十六英寸，能把一輛小汽車那樣重的砲彈轟出二十英里開

上前打上個把楔子，保險也沒人扯你的衣領。但似乎沒人這麼幹。聽說這個國家的子民，最令人稱讚的德性便是排隊，丈夫當銀行董事長，太太存款取款也和普通顧客一樣排隊。所以我也心平氣和，挈婦將雛，逆着隊伍往前走，尋找「源頭」去。一路上，想起彼岸「龍的傳人」中的作家，那一股尋根熱，很佩服他們的

愈往前走，愈是精彩。八位少年男女，白黃黑諸色人種均有，驀地蹦着跳將過來，一個黑小子手持空的電視機外殼，一個白胖子裹着破毡子，其他人或執破拾燈，或擁破包袱，為頭一個長嘯一聲：「核彈爆炸了！」隨即各人一起作「轟轟」的爆炸聲，彷彿殺傷力極大的射綫已在發出威力，各人奮不顧身地趴下，手脚癱攣着，嘴角扯動着，呻吟着：「怎麼啦？天哪！我的媽啊，我要死了！」其中一位俏麗的中國女孩嚷得最響：「媽呀，救救我！」——他們在預演核災難吧。可惜因為演出次數太多，患了點職業厭倦症，有點程式化，欠缺熱情，呻吟得太故作，類似老詩人唱純真的戀歌。我就分明看到那中國女孩躺在地上頑皮地作鬼臉，兩個小笑渦討人喜歡地時隱時現。

我於是想起了自己的紅衛兵時代。那時，我們和他們一般，是熱血沸騰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但是，在脫下紅袖章這麼多年以後，我不但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孩子當真趴在地上呻吟，連她躺在地上表演莫名其妙的理想主義，也不想看。好在我那十二歲的公子只顧嚇唬樓在欄杆上的海鳥，還沒有這般高的政治覺悟。排隊的觀眾呢，也都是冷靜觀照的哲人，沒有附和，沒有抗辯，這是魯迅所指的「無物之陣」，最令理想家悲哀的。

待到核災難結束，地上諸君死而復活之時，我們已排到柵欄前，準備入場了。背後響起了稔熟的鄉音，原來好幾位不相識的同鄉插進隊伍來了，都是二十來歲，軒昂得很，毫無愧色。我忽然替他們臉紅了一陣。這些人物在故國走後門走順溜了，在別國又擅於將其經驗、學說與實際相結合，果然無往而不勝。

柵欄門背後，有一隊手執哭喪棒的防暴警察，一輛囚車。再往前，是幾個活動公廁，和

一股橫流的便溺很令人掃興，今天衛生局的檢查官一定都放了假。只好憋着氣穿過這危險地帶。

到了水邊，還有一道關卡，是檢查人有沒有攜帶武器炸彈的。一道二尺寬的小門，讓你經過，倘你身藏金屬物件，那檢測器就像夜貓子鳥一般吱吱叫，你就得走到旁邊讓士兵另檢。穿過門時，看到近處肅立着一位海軍陸戰隊衛兵，方臉寬肩，全副武裝，目不斜視，標準的軍人風度，令人肅然起敬。不知怎的，我又平白為他緊扣着的風紀扣旁的脖頸感到難受，因為脖子太粗，肉全給逼得隆成山脈了。看來，他為這威風付出的代價也不小。

終於上艦了。大倒是夠大的，但無甚新奇。主砲確乎雄偉，但只是砲而已。日本鬼子簽署無條件投降書的地點在第二層甲板，上覆大帳篷，那具「歷史意義」的地點用有機玻璃鄭重其事地罩着，生怕誰的尊腳踐踏了。甲板、錨盤、錨鏈、欄杆、梯級，人流推過來湧過去，兩耳盡是與高彩烈的喧聲，你不用移步，人流會把你推着走。遊了一個圈，甲板走遍了，腦袋依然空空如也。艦上的官兵倒很和氣，一式白的晃眼的軍服，看着他們在陽光裡眯着眼睛，覺得很難將他們和在朝鮮打仗的前輩——「美國野心狼」聯繫起來。也許他們這樣站着，也成了展覽品，覺得無聊，所以巴不得有人前來搭訕，扯談扯談。我只要看定其中一位的臉孔，他就一定笑臉相迎，打招呼，介紹砲啦、電腦啦、救生衣啦，熱情之至，可惜我沒立志當軍火專家，所以什麼也沒問。

末了，走到艦尾的大甲板，摸摸擺給人看的沒上膛的來福槍，研究了一下海軍陸戰隊的肩章綬帶，便算參觀完畢了。我鬆了一口氣，因為總算完成了一樁任務。人生就是要完成許

多任務——你愛的、不愛的，起先愛後來又不愛的，諸如此類的任務。走下棧橋，才發現橋下設有大網絡，為的是防止有人「自行失足落水」。也許海軍沒有購買這類意外責任保險。那位脖頸上的肉給勒得鼓脹的海軍陸戰隊衛兵，仍在那地方站崗，我向他行了個注目禮，仍舊為他的脖頸覺得難過。

柵欄前的防暴警察仍在，因為各人都不越軌，他們也就樂得賦閒。柵欄外，一群人在集會示威，輪流執麥克風慷慨陳詞，但聽眾寥寥。一兩位婦女在分送傳單，其內容是反對軍艦長駐金山灣。集會的人高呼口號了，人不多，但聲音高亢，他們是堅決的反雷根派，反對軍援尼加拉瓜叛軍，反對核試驗，反對擴軍，反對「星球大戰」，反對污染。剛才表演核災難的演員們也在裡面，那位有笑渦的女孩在高呼口號，也在笑，我才知道有些人的臉孔是特製的，哭相、怒相教人誤以為是笑。

軍艦遠遠地拋在身後了，老婆孩子也沒發表什麼觀感，示威的口號聲仍隱約可聞。這就是美國：軍艦和示威，排隊，軍隊和平民，便溺的異味和寬廣的藍天，「尼加拉瓜古柯鹼」……，這就是美國的獨立節。



憶阿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文革一幌二十週年了。中國人好像還未從當年的顛狂狀態中擺脫出來，着了魔似地回憶着當年的各種人、物、事。海外亦不例外，紀念文章、日記片斷、人物評傳和奇聞軼事紛沓而至，一下子充斥所有的報章雜誌。前幾天看星星成員在紐約辦的「中國前衛藝術」畫展，我的朋友艾未未畫了三幅「無題」的毛澤東，令我頗感困惑。他向我說，他一直想畫一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東西，以求達到某種「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

是的，文革之於中國正是如此。它似乎意味著許多，又好像沒有什麼。看了一堆高談闊論的文章，心裡還是茫茫然。也許我對過去的一切，早就無所謂了。不過，既然拾起筆來附庸潮流，總要寫點什麼才好。寫毛澤東？寫武鬥？又都覺得沒趣。想來想去，還是寫我幼時的朋友阿羣吧！他是在那些歲月裡唯一的朋友，伴我渡過一段還算快活的時光。我要紀念阿羣，做爲我對文革二十週年的一點小意思。阿羣是一隻狗，一隻地地道道其貌不揚的二串子（北方話，即雜種的意思）。牠短腿、短嘴、短尾巴，耳朵不短，却耷拉着半截，沒有一點野性的威風。總之，牠不是那類讓人看了就喜歡的寵物，簡直不屑一顧。只是由於地位與處境的相同，我和牠成了難兄難弟，莫逆

之交。我們被命運捉弄到一塊，也算是一種緣份，文革帶來的緣份。

六七年，正是文革最熱鬧的時候。我還不到十歲，却是個積極的參加者，每天都拾個漿糊桶，跟着姊姊上街刷標語。姊姊是「紅後代」。文革初期的學生組織叫紅衛兵，隨着大批老革命被打倒，紅衛兵就變成了毛主席的私家兵——紅衛兵了。不久我的父母都成了走資派，關進專政隊裡，姊姊也被逐出造反派。有一天，來了輛大卡車，把我和姊姊及家裡的東西往車上一裝，就離開了城市。車子開到渾河畔的一個農場，又把我們和傢俱往一間小屋前一扔，車子便開走了。

這時，小屋裡走出一隻小狗。牠站在門口，以一種迷惑的神態看着我和姊姊倆個不速之客，儼然一付主人的樣子。可是，當我們把東西搬進去後，牠却不再進來了。牠默默地走到不遠處一個大草垛子下面躺下，似乎對我們佔居牠的屋子很不滿意。傍晚，我想把牠抱回來，不料這貓一般高的小東西還挺倔，筋起鼻子，「汪汪」地叫着威脅我，就是不讓我抱。我一生氣不管牠了。

第二天，我從養豬老頭那裡，打聽到了小狗的身世：「老大爺，這小狗誰養的？」

「沒人養了。」

「那大狗呢？」

「殺了吃了。」

小狗的身世引起我一陣悲楚。我可憐起牠來，就像可憐我自己一樣。心理學家說，過早失去父母的兒童，會有一種變態的倔強性格。過早失去父母的小狗也是一樣。我對牠的怨氣頓消，想方設法與牠和好、親近。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隔閡終於消除，我們變成了好伙伴。根據牠的脾氣，我給牠起了個名符其實的稱呼——阿羣，牠毫不介意地接受了這個名字。

就這樣，阿羣成了我家的一員。我們朝夕相處，開始了新的生活。像美國人對狗一樣，我與阿羣地位平等。我睡炕頭，他睡炕尾；我吃什麼，牠吃什麼。阿羣和我熟了以後，天真、頑皮的稚氣也復現出來。早晨一起床，阿羣就來卸衣服，找鞋子。牠表示友好的方式除了狗類慣用的搖尾巴外，就是用嘴。一要起歡兒，就似親非吻地在我衣服上咬來咬去，弄得我一身哈拉子（北方話：口水之意）。要不就把兩隻髒髒的前爪搭在我身上，要和我摔跤。最討人厭的是，牠跟我一塊走路時，不會手（爪）拉手，於是就在後邊咬住我的棉襖襟，搞得我的棉襖總是露着一圈棉花。

那時儘管家裡很窮，但阿羣並沒有增加我們的負擔。牠剛剛大了些，便成了家裡的壯勞力。牠每天奔忙不息，到河邊樹林裡去獵野味，時常叼回一隻野兔、野鷄之類的小動物。令我最驚奇的是，阿羣還會捕魚，這也許是生長在河邊的狗進化適應的結果。阿羣水性很好，也會動腦筋。牠總是找個水灣，先在水裡游一大圈，把魚趕到岸邊淺水處，三撲二撲，就從水裡叼起一條魚來。

人說「狗抓耗子，多管閒事」。阿羣也愛

抓些耗子來給自己開開葷。我家原來耗子成災，沒什麼吃的就啃鞋磨牙。有的時候還要拉些屎在鞋巢裡。自從阿羣吃耗子開葷以後，這群倒霉鬼就絕跡了。套用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一句唱詞來誇獎阿羣，就是「裡裡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自從阿羣長成大狗以後，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改變了。那時被專政家庭的小孩，都被叫做狗崽子，我與阿羣也就成了一對。我到學校去，總有一幫出身好的小孩跟在我後面，有節奏地喊着：「走資派的兒——子，鬥——爭——你——！」後來有一次，阿羣跟我跑到學校裡，當那群小孩跟在我後面剛一喊，阿羣生氣了，發起威來。牠項毛倒豎，筋起鼻子，向這幫孩子「汪」地一吼，嚇的他們糊裡糊外地竄跑了。於是，我一下子從狗崽子變成了狗英雄，再也沒有誰敢欺負我了。

不過，我有時也和阿羣一塊去做些偷雞摸狗的壞事。我們常到生產隊的菜地去偷些黃瓜、西紅柿之類的嚐嚐鮮。我站得遠遠的，一打手勢，阿羣就鑽到地裡去。看地老頭看到，也不理哄，只當狗到地裡去拉泡屎，還積點肥呢！阿羣一趟腳出一個，一會就裝一帽，滿載而歸。我們還幹過挺缺德、但又很威風的事，就是當「剪徑大俠」。一到暑假，城裡的孩子成群地到河沿這兒來捉蟋蟀，因為河堤石頭縫裡的蟋蟀都賊厲害。我是蟋蟀迷，於是帶上阿羣，坐在進城的必經之路那等着。下晚，城裡的孩子抓了許多蟋蟀回家，我就仗狗勢，強迫他們留下蟋蟀，才准過去。只要阿羣項毛一豎，鼻子一筋，他們沒有不從命的。於是，我又成了學校的蟋蟀大王。

阿羣聰明絕頂。牠通人性，善解人意，比我在小人書上看到的蘇聯軍犬還聰明。如果有

誰設計一種測驗狗IQ的方法，我想阿羣得分一定不低於一百。阿羣這不尋常的靈性，是因為牠有個不尋常的秘密。這秘密說出來，可真有些森，對阿羣的狗格和形象也十分不利。不過，在當今實事求是地評價過去的時尚裡，我只好如實道來了。

阿羣的秘密是一種「補腦汁」。那是第二年的冬天，也是最艱難的一個冬天。一歲多的阿羣，正在青壯年的節骨上。家裡可吃的東西太少了，連開葷的耗子也沒有一個。有一次，阿羣出去一天，回來也沒叫著要吃飯，嘴上還粘滿白色的東西，像豆腐渣一般，却有股腥味，令我心生疑竇。於是，有一次我悄悄跟踪牠出去。與農場隔著一片楊樹林，是一個很大的知青點。那時的知青很空虛，誰也不結婚，因為結婚就回不了城了。於是男女知青發生關係後，就自己打胎，把打掉的嬰兒扔進林子裡。



阿羣
阿羣
阿羣

三馬

所以這片林子裡常有死孩子出現。阿羣在林子裡轉來轉去，找到一個死孩子，腥紅顏色，在白雪的雪地里，襯得格外耀眼。只見阿羣先用前爪撥拉撥拉死孩子的身子，看來凍得很硬。然後牠開始啃死嬰頭頂齒門處（嬰兒齒門沒有髓骨）。啃破後，便一口一口地舐裡面的腦漿，眼睛裡帶着一種獸性的兇光。我被這餓狗食人的場面驚呆了，半天才緩過勁來。我大喊一聲。阿羣突然發現我，一楞神，隨即好像意識到了什麼，轉身默默地自己跑回家了。我回去後，第一次用皮帶重重地抽了牠一頓，三天不許牠出門。聽人說，狗改不了吃屎。我怕牠再做出這種慘無狗道的事，就用夏天採來的乾蘑菇，向養豬老頭換了一袋餵豬的米糠，每天熬些給阿羣吃飽。這種事後來再也沒有發生過。

儘管發生此事，我與阿羣的交情還是初衷不改，而且日益加深。我相信我們的友情甚至超過人與人之間所能達到的程度。我用橡實給牠做了一只項鍊，還有一件的確良花砍肩兒，使牠成爲河沿一帶的狗中貴族。不過有一次，我的愛心却幾乎使牠喪命黃泉。這年夏天，我常常看到阿羣用後爪在脖子上撓來撓去，一定是被狗跳蚤咬得很癢，所以我就找來些六六六粉（一種殺蟲農藥），洒在牠的毛裡面。不料，這種藥粉有刺激性，當天晚上，阿羣就用舌頭去舐掉這些藥粉，結果中了毒。第二天，牠茶飯不進，一臉倦容，整天臥在地上。我趕緊到處找解藥餵牠，也無濟於事。我傷心極了，特別請了學校美術老師，給阿羣畫了遺像，還在照像館與牠照了合影。沒想到幾天後，牠竟沒事了，讓我虛驚一場。俗語說，「貓有九條命」。其實，狗的生命力是最頑強的。牠就像希臘神話裡面的安泰一樣，只要不離開土地，嗅着泥土的氣息，就不會死。所以要想殺狗，

都用繩子吊起來，讓狗離開地，狗才會死。

不過，阿羣一生最倒霉的事情還是找不到對象，因為牠是一隻二串子笨狗，長得又很醜。每年打春四、五月時，狗類們就到了發情期。家裡有母狗的，都牽着狗新娘找純種的狗新郎去交配。不消說，沒有誰牽着母狗光顧我家，讓阿羣交配。這時的阿羣整天心猿意馬，夜不歸宿。有一次爲了找情侶，還讓人家用棒子打傷了後腿。這事我現在想起來，還爲牠憤憤不平。人啊！真勢利，不僅在自己族類中搞種族歧視，還要擴大到狗類中去。

其實，阿羣絕對是個響鑼鑼的男子漢，充滿了陽剛氣質。牠從小不畏強暴，好鬥成性，敢跟比牠高一頭的大狗咬鬥。咬傷了回來，就不聲不響地躲在屋角裡，舐乾淨傷口的血。鑒於阿羣如此要強，爲了不讓牠在外面吃虧，我時常買些鈣片來餵牠，讓牠長得結實些。阿羣長大後，經過反覆較量，終於成了附近一帶的狗霸，很有名氣。

物極必反，阿羣的這種性格終於害了牠。成了狗霸之後，阿羣驕傲起來，不放过任何機會與陌生的外地狗決鬥，成天惹事生非。七六年秋，也就是毛澤東逝世的當口兒（北方話：時候之意），唐山地震，吉林下隕石雨，一切都反常起來。阿羣這會兒九歲了，已經是條老狗，脾氣也暴戾得很。有一天，不知從哪竄來一條患了狂犬病的瘋狗。那天是個陰天，很冷，好像要下頭場雪了。瘋狗突然出現，讓阿羣撞上了，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狗戰。那狗是隻德國黑背狼狗，個頭奇大，十分兇猛。但阿羣這時早已鍛鍊得老奸巨滑。牠先是繞着瘋狗踱來踱去。瘋狗幾次猛撲都落了空。這會兒周圍引來一大群看熱鬧的人，發出一陣陣驚呼和喝彩。那狗被阿羣激惹得獸性大發，只見牠突然

躍起，向阿羣迎面撲下。阿羣不慌不忙地身子一臥，在那狗正要落下之時，向起一竄，一下子從下面咬住了瘋狗的喉管，再一滾，就把瘋狗壓在下面，動彈不得。一袋烟的功夫，瘋狗就蹬腿了（北方話：死了之意）。

不幸，阿羣因此傳染上了狂犬病。開始只是喝水的時候打嗝，總是眼淚汪汪地看着我發呆。我並沒有想到阿羣患了狂犬病，只是感覺有點不尋常的事情要發生了。幾天後阿羣失踪了，再也沒有回來。我沿着河岸找了許多天，也不見牠的踪影。後來讀大學時我才知道，患了狂犬病的狗，由於喉頭痙攣，最怕見水。阿羣大概忍耐不得渾河秋汛的流水聲，才離家

出走的。過了很久，鄰縣的一個趕車老板告訴我說，他們村裡曾發現一隻瘋狗，被民兵用槍打死，扔到廢井裡了。

阿羣就這樣悄悄離開了我，沒有告別，也沒有留下什麼信物，就連遺體也無法確定葬在了何處。做爲一隻狗，牠的一生也許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然而，牠伴我渡過了童年，也是文革十年最孤獨艱難的日子，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沒有什麼人物、動物抑或神靈能夠取代牠在我心中的位置。我把牠的身世寫出來，回味一下已經淡薄的過去，也算對得起牠，爲牠留下一個無形的紀念碑。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于紐約



無題 (法)喬治·阿曼

孤獨者

——山區紀實之一

雪城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石頭雲，晒死人」，早晨起來，向東邊天空望去，只見那蔚藍的天空上，鑲着幾塊淡淡的方格形的白雲，那就是起了石頭雲，那就要從早一直晒到晚：把包谷林裡的葉子，都晒得捲了起來像一個個的喇叭筒；把道旁的榆樹葉、柳樹葉，晒得翻轉過來，失去了綠茵茵的光彩；把狗晒得張大了嘴，伸出一副長舌頭，氣喘咻咻地臥在門口，把行走的人們晒得膀子上、脊背上脫掉一層皮。

這時候，已經放了暑假。安江縣西大街小學裡失去了往日的喧嘩，從前院到後院，看不到一個人影。道旁和院子裡生滿了雜草。在後院的一個角落裡，一個中年人，蹲在一叢雜草中間，不聲不響地在那裡拔草。他的臉色，已經晒得黝黑，頭上、臉上和身上，都沁滿了汗珠。一件短袖的棉紡汗衫，已經完全被汗水浸濕了。然而，他仍然低着頭，不住地拔草。有的草，蟠結成一大片；有的草，只是一根根地，他都要把它們的根，用手指刨掉周圍的土，然後輕輕地連根拔出來。他想，只有用這種連根拔的辦法，才可能使雜草不再萌生。儘管他的進度很緩慢，大半天時間，還只拔了一張桌

子那麼大的一塊地方。然而，這拔草人仍是堅持着一株一株地拔下去。偶爾，孩子們到校園裡去玩要，看見了這件事，告訴了老師們。於是，老師們又有了一件趣事來議論。有的說：「嘿，這人真無聊。甚麼事不能做，却一個人去拔草！」有的說：「這人性情太孤癖。總愛獨來獨往，與世隔絕。」

這拔草人的名字叫章希孔，是西大街小學新來的教員。他生着一副高高的身材，留着一頭長長的向左偏着的頭髮。那直直的鼻樑，略微高起的顴骨，尖尖的下巴，以及黝黑的皮膚，都顯示出他坎坷的命運和堅韌的性格。

他住在校園對門的一個小院裡。那裡是教師住宿和辦公、開會的所在。上課鐘一響，他就直挺挺地走出房門，拿着點名冊、粉筆盒和課本，匆匆地從小院向校園走去，把十多位男女教師的嘻笑聲、談論聲、招呼聲遠遠拋在身後。下課以後，他又匆匆地回到他的小屋裡，隨手關起房門和窗戶，把院子裡的喧嘩摒諸門外。他在他的玻璃窗上，貼上了一層蠟紙，在所有的門縫上，都貼上了紙條。他不想看到小屋外面的一切，也不願人們走進或窺視他的小屋。人們從他的窗前經過時，總是屏聲歛氣，放輕了腳步，留神地聽一聽，總想聽出點兒動靜來。然而，那兒既沒有談笑聲，也沒有歌聲

或歎息聲，只有偶爾發出的幾聲咳嗽聲。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青年教師吳小龍猛地推開了章希孔的房門，向老章說：「看電影嗎？中蘇友好協會公演的好片子：幸福的生活。」老章搖搖頭，看也不看來人一眼，仍是低頭獨自玩他的撲克牌。於是，章希孔又有一件新鮮事在教師中間傳播着：「真新鮮，一個人打撲克！不知道能打出個甚麼趣味？真是知識份子的癖性——孤芳自賞。」

其實，在一年以前，當章希孔調來西大街小學任教的傳出以後，章希孔的身世、性格等等，就像是一個神秘的謎，開始在教師中議論着、猜測着。

「聽說他是河南人。多新鮮啦，他是個吃素齋的，從來不吃肉。有一次，炊事員用豬油給他炒了個雞蛋，他立時就嘔吐出來了。吐得真可憐！」一位中年女教師楊月琴悲天憫人似地說。

「聽說他十多年也不回一次家，連結婚時也不回去，還是由他的妹妹抱了一隻公雞，代替他和新娘子拜了個堂。」年輕女教師劉蘭英急忙接着說。她是有名的「包打聽」，專門到校外探聽一些奇聞軼事，回來在教師中傳播，以博一時之快。

「他是名牌大學——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是咱們這個縣上唯一的正牌大學生呢。解放前，在北京當過法官。解放後就逐級下放。從北京下放到西北，從西北下放到安江縣法院；如今，又從法院下放到小學。大學生教小學，實在是屈才呀！別的部門不要的，都塞到學校來。這教育部門不是成了個退水溝了嗎？」愛說風涼話的男音樂教師張雲塵，大為感慨地說。

章希孔對於人們的猜測和議論，從不辯解

和理會。有一次，在教師飯堂裡吃飯，吳小龍打趣地說：

「老章，甚麼時候是你的生日？說出來，我們好為你慶祝。」

老章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等着吧，我的生日是閏二月的二十九。」

我這一輩子只遇到過兩回。」說得大家愈感到這個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神秘。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章希孔是權威。他的真知灼見，使教師們為之折服。

有一次，討論一年級教師楊蘭英的語文示範教學。這一課的題目是「拔蘿蔔」，課文是：

「老公公種了棵大蘿蔔。蘿蔔長得很大很大。老公公去拔大蘿蔔。拔呀拔，拔不起來。老婆婆就來帮他拔。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蘿蔔。拔呀拔，還是拔不起來。小孩子也來帮忙了。小孩子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蘿蔔。拔呀拔，還是拔不起來。……小花貓也來帮忙了……小花狗也來帮忙了。小花狗拉着小花貓，小花貓拉着小孩子，小孩子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拔呀拔，拔起來了。」

在討論教學目的時，楊蘭英提出：

「這一課的政治思想性很明顯，是要教育兒童仇恨敵人，要把階級敵人像拔大蘿蔔那樣堅決拔掉。」

她的意見，受到許多教師的讚揚。認為她階級觀念強烈，政治思想敏銳，能注意向一年級兒童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然而，在一片附和聲中，章希孔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先是提出了疑問：

「既然大蘿蔔是敵人，那麼，為甚麼老公公要種它呢？為甚麼要給它澆水、施肥，讓它

長得很大很大呢？」楊蘭英和她的一些附和者，啞口無言。其他一些教師，被這個奇妙的問題問得豁然開朗，臉上現出了微笑。這微笑，既包含着對章希孔的讚賞，也包含着對當時所風行的政治說教公式的嘲笑。章希孔稍微停頓了一下，接着說：

「如果說思想意義的話，我以為，這一課是教育小朋友們要樹立團結互助的觀念。就語文課來說，是要訓練兒童明晰的邏輯思維能力。不然，課文裡為甚麼要把誰拉着誰這樣的話重複五次之多？」

他的合情合理而又獨出心裁的見解，贏得了教師們對他的尊敬。在教師們的心目中，他不再是個桀傲不馴、孤芳自賞的人，而是一個值得信賴，值得親近的人。

那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一天晚上，晚自習還沒有結束，一群孩子簇擁着一個穿着黃色軍大衣的人，向教師辦公室走來。他們一邊走，一邊興奮地喊着：

「看呀，這是最可愛的人來了，是從朝鮮前綫回來的呀！」教師們聽了，也都停止了手中正在批改的作業，出來迎接。團支部分書記李新華更是興奮，立即把這位最可愛的人和孩子們請進他的房間，又是沏茶，又是遞煙，忙得不亦樂乎。一時，院子裡充滿着喜慶的氣氛。經過寒暄，才知道這位最可愛的人，是從朝鮮回國，返家探親，路過這裡的。在款待之後，他表示，返回時他還會再來。於是，教師們和學生們又感到莫大的榮幸和歡欣。

然而，章希孔却表現得異常冷漠。他只是把那人端詳了一番，就逕自走向他的房間。團支部分書記李新華看了，對章希孔非常不滿。他在教師政治學習會上，對章希孔提出了義正辭嚴的批評：

「對最可愛的人歡迎不歡迎，是一個思想感情問題，也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我們天天在喊，要改造思想，轉變立場，要愛人民之所愛，恨人民之所恨。但遇到實際事物，遇到最可愛的人，却冷若冰霜，毫無熱情……」

章希孔聽了，當時並未作答。只是在討論會結束時，做了個簡短的說明：

「我以為，穿軍衣的不一定就是軍人，軍人不一定都是最可愛的人。」

以後，這個「最可愛的人」又從這裡路過了幾次，而且每次必到西大街小學來。最後，他在一個六年級女學生的衣袋裡塞進了一封信，信上滿是淫穢不堪的求愛字眼，惹得這個女學生大哭一場。這一波又一波高漲的熱情，才頓時冷卻下來。

事後，中年女教師楊月琴向他詢問說：

「你怎麼會未卜先知，知道這個最可愛的人不那麼可愛？」

章希孔回答說：

「看人要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我第一次看見這人，兩隻手抓着兩個大女同學的手，兩隻眼睛緊盯着女學生不放，就知道他居心不良。況且，接待人要憑證件，不能憑感情，這也是常識呀！」

二

的確，冷靜的思考和縝密的論證，是學法律、做法律工作的人的職業性格。而這種性格，又是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形成的。這個過程，與其說是個實踐的過程，不如說是個痛苦的磨練過程。章希孔的經歷正說明了這一點。那是一九五一年春季，安江縣正在北門外的大河壩裡舉行萬人宣判大會，要處決一名聚



衆賭博，殺人拒捕的國民黨青年軍連長劉定昌以及其他幾名罪犯。那時候，章希孔剛從人民大學短期訓練班畢業，就揹起背包，邁開雙腳，從北京出發，來到大西北，被分配到安江縣法院做秘書工作。

宣判大會開始了。從四鄉八鎮召集來的男女老少，站滿了主席台前的一大片河灘地；會場周圍，佈滿了荷槍實彈的民兵。在高處，在北城牆的城垛後面，以及附近的幾個小山頂上，都隱約可見穿着黃軍裝的士兵，在那裡架起了機槍，佈起了監視哨。會場上籠罩着一片肅殺氣氛。

照慣例，宣判大會的高潮是受害親屬的控訴。被宣判的罪犯，被押到主席台下的中央，接受控訴和批鬥。群眾中口號聲此起彼伏，群情激昂，顯示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強烈要求。台上的受害人親屬，面對仇家，想起被害的親人，更是悲憤已極，聲淚俱下。有的拿出被害人殷紅的血衣，在台上號啕大哭，向兇手討還血債。於是，在台上台下一片怒濤洶湧之中，審判長宣佈判決，並將罪犯立即推到會場外的河灘上，予以槍決，以儆效尤，而快人心。

在這一天的控訴中，走上台來的是一位中

年婦女。她梳着整齊而光潔的新式短頭髮，穿着件簇新的陰丹士林布對襟衣，在黑色貢呢的長褲下面，露出一雙淡青的絲光襪，和農家自製的繡花鞋。她是民兵連長的妻子，名叫孫素珍。她的丈夫王明理是正月初五的夜晚，到一間大油坊裡抓賭時被槍殺的。原來，這天深夜，有人來告密，說是有十多個人在陳家油坊裡賭博。王明理立即叫來民兵排長宋長興和十多個民兵，把油坊包圍起來，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腳踹開了油坊的門，同時，扳動了槍栓，對準着這十多個賭徒，大喝一聲：「不許動！」這油坊裡的賭徒見來勢凶猛，猝不及



防，其中一人，急中生智，一口把油燈吹滅，於是賭徒四散逃跑。正在這時，突然一聲槍響，只聽得民兵排長宋長興在黑暗中大喊一聲：「不好了，連長出事了。」及至把燈點亮一看，連長王明理頭部中了一彈，正躺在血泊中；急救無效，不到一個時辰，就死了。一個民兵連長，在執行任務中被打死，這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案件。上級嚴令安江縣公安局短期內破案。於是，根據一條必然的邏輯推理：打死民兵連長的，必然是爲非作歹的賭徒；兇手必然是怙惡不悛的階級敵人；階級敵人就是地主、反革命份子。於是，在這十多個賭徒中就認定了當過國民黨軍隊連長的劉定昌是兇手無疑。經過一番刑求折磨之後，劉定昌也只好招認。這一

案件終告勝利破案。

然而，在大會控訴時，章希孔作爲大會記錄，在台上看得很清晰：這死者妻子孫素珍雖然是在大聲號啕，大罵道：「反動連長劉定昌，凶殘狠毒打死我丈夫……」但那眼睛裡却像晴天打乾雷——只聽雷聲響，不見一滴水。這就引起了章希孔的深思：難道這個女人對她的丈夫沒有多少真實感情？再留心看看她這一身穿戴，更令章希孔懷疑：一個新喪丈夫的女人，爲甚麼這樣熱衷於打扮？然而，宣判大會正在進行：法院院長正在宣讀判決，台下是一片如火如荼的「堅決擁護……」「堅決鎮壓……」之類的口號聲，罪犯正在被推到幾十丈外的河灘裡執行槍決，他作爲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如何有權利去說一聲「暫緩執行」！然而，人的良知催促他去做進一步的瞭解。根據其他賭徒供認：死者王明理是頭朝前倒地，槍彈是從後腦勺打進去的。顯然，這開槍行兇者不可能是面對王明理的賭徒們。何況，當時一片驚慌，燈被吹熄，賭徒們如何能瞄準王明理開槍？更何況，劉定昌雖然過去當過連長，但是，復員回鄉以後以及在賭場都沒有發現他擁有槍械。

章希孔鼓起勇氣去找法院院長徐文中。徐文中是從陝北來的老幹部。在陝北當過共產黨的區委書記。按資歷，他應當是地委書記一級的幹部了，只是由於文化淺，升不上去。徐文中一邊吸着旱烟斗，一邊聽着章希孔的報告。聽完以後，他閉上眼睛想了想：如果這確屬冤案，不僅即將發表的中級法庭副庭長當不上，而且這縣法院院長也要撤職。唯今之計，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於是，他鎮靜地問道：

「章希孔，照你的想法是甚麼？……」
章希孔沒有回答。

「照你的想法，難道我們明天要開個平反大會，替反革命殺人犯劉定昌恢復名譽，平反昭雪？」章希孔感到失望。

「照你的想法，我們無產階級鎮壓反革命，是亂搞一氣，冤枉好人？」章希孔由失望而至於憤懣，把低下的頭抬起來，傲然地望着窗外。窗外正下着濛濛細雨，刮着涼風，含苞的柳絮在風雨中搖曳，和風雨打着。

驀地，徐文中把身子從籐椅上挺起來，把啣着的煙斗扔在桌子上，用手猛拍了一下辦公桌，張開了包滿金牙的嘴，向章希孔厲聲說道：

「好好地下去給我寫個交代，兩個星期以後，開你的批判會。」

批判會如期舉行了，是以安江縣政法系統——包括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三個機關的整風三查學習會的名義召開的。會前，徐文中做了充分的準備：搜集了章希孔平時言行中的問題，還派了兩個人到章希孔的老家去做了調查。

一整天的大會批判結束了。章希孔哪裡有心想到食堂去排隊端飯。趁着人們去吃飯的空隙，他獨自溜出了東門，走下一個斜坡，來到玉帶河邊。這兒有一塊小小的麻柳樹林，河水從這裡改變了流向——由西向東的河水被東山觀擋住了去路，於是折而南流，因而，這兒匯集成了一個深水潭。夏天常有人來這裡游泳，也有人來這裡尋死。奇怪，這裡每年都要死一個人。而由於這兒的石頭質地細膩、堅硬，帶有紅色的花紋，是一種很好的花崗石，可以用來雕琢圖章，人們就把這兒叫做玉石灘。章希孔就在這清湛湛的玉石灘邊坐下來。他要在這個清淨地方好好安靜一會兒。然而，他的思緒，却像那汨汨南流的河水，怎麼也停不下來。

多麼聳人聽聞的幾頂大帽子呵！甚麼私自與案犯接觸，企圖串供，為反革命殺人犯翻案！難道我作為法院秘書無權向案犯查問案情？難道很明顯的錯案，也要聽任它錯到底，不予糾正？難道法院就可以草菅人命，任意憑推想來判案？難道最起碼的事實都沒有查證清楚，就可以致人於死命？難道沒有足夠殺人的證據，就可以判定殺人？

還有，批判我用「六法觀點」來判案，多麼荒謬的指控呀！我是引用過法律界的經典「六法全書」。然而，這是多麼完備的一部法典呵！今天，若是真正用這部法典來執法，才是中國人民的福份呢！當然，我知道他們指的是那個「攻打新坪區公所」的案子。但是，直到現在，我仍然認為，我所堅持的意見是正確的。難道幾個人隨便說了一下要去攻打區公所，沒有形成任何決議，也沒有見諸行動，就可以定為「顛覆」罪，就可以判處死刑，立即槍決？難道強調了一下要看看犯罪的事實和後果，就是資產階級的「六法觀點」？那麼，按照這個邏輯來推理，是不是無產階級就只憑思想和言論來定罪？如果照這樣來執法，豈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都有罪？在這樣的法律下面，請問，人命能值幾文錢？

當然，最令章希孔氣憤的是，拋出他家庭的材料，企圖致他於死地。

三

他的家在豫西山區，小地名叫章家灣。家庭世代都信奉佛教，因而，吃素幾乎成了遺傳。他的父親章廣仁，能讀佛經，也寫一手好字，專門為人寫祖宗牌位和對聯之類，是當地有名的秀才。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地方上既要

繳糧納稅，又要支伏當兵。對上面不敢怠慢，對百姓又不能誅求太狠，保甲長是很難當的。在無人願當的情況下，章廣仁就被委派為當地的保長，管理着上千戶人家。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到了章家灣，發動農民減租反霸。他父親既是保長，就是當地一霸，應在該反之列。在一個烈日炎炎的中午，章家灣在一個山崖邊舉行鬥爭會。開會的人每人坐着一塊石頭。一陣激昂憤慨的口號聲之後，人群中一個人帶頭把坐着的石頭拿起來，向章廣仁打去，其餘的人也跟着用石頭砸過去，頃刻之間，章廣仁就腦漿迸溢，血肉橫飛，死於亂石之中。這是不經審判的判決，是當時流行於豫鄂邊區一帶的「石頭會」。章廣仁僅是死於非命的千百人中的一人而已。

章希孔的弟弟章希亮，見父親死得這樣慘，一氣之下，也就去參加了地主惡霸的武裝隊伍專門攻打區鄉政府，殺戮中共幹部。因為他們晝伏夜出，非常驍勇，殺傷力大，所以命名為夜虎隊。又因為他們晚上出來時，手裡提着一個夜壺，在夜壺裡灌滿了青油，按上一支棉花燈蕊，用來照明，人們又把他們叫做夜壺隊。這章希亮由於年僅廿多歲，年輕力壯，手脚靈敏，槍法很好，報仇心切，所以很快就當了夜壺隊的分隊長，在豫西山區被圍剿了一年多，最後被擊斃在一個山洞裡。

他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回過家了，甚至連信也很少向家裡寫過。僅僅是他的一個上師範學校的妹妹給他寫過一、兩次報告平安，和要錢接濟上學的信。因此，他父親和弟弟的事，他根本不知道。

如今，徐文中把章希孔的家庭情況全部公佈於眾了。這事像一塊石頭扔進水池裡，引起的波動就大了。在批判會上，法院的一個審判

員趙德全振振有詞地說：

「甚麼廉結甚麼瓜，甚麼階級說甚麼話，章希孔的父親和弟弟都受到人民的鎮壓，他當然要仇恨無產階級專政，替那些被處決的反革命伸冤。他和劉定昌之流，是一丘之貉，是一個廉上結出的兩個瓜。」

檢察院的一個檢察員李志福也接着說：

「怪不得在審判案子時，有人總是販賣六法全書的黑貨，處處和我們唱對台戲，却原來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隊伍裡，混進了反動階級的代言人。」

章希孔知道，這是這些人慣用的技倆：用家庭出身把你打成階級敵人，然後再對你一一否定。而且，使人們對你望而生畏，不敢和你接近，使你在人群中孤立起來，使你無法形成一股反對勢力，最後，就可輕而易舉地將你隨意處置。於是，章希孔就確定了他的對策：不和任何人接觸，不牽連任何人，不做任何申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做自己應該而且可以做的事。

天空佈滿了星星。章希孔仰望蒼穹，仰望着那輝映着無數星光的銀河。北斗星的勺口，正朝着東方。在距離勺口四倍的空间，他找到了那顆璀璨的北極星。章希孔自言自語地感歎道：

「啊，北極星，根據天文學家的推算，我看到的你的星光，已經是你一億年前發出的光芒了。我歎息你的遙遠，我謳歌你的壯美。我永遠相信偉大的康德所說的那句話：『世界上最偉大的，就是壯美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這時候，他突然看到黑暗中有兩個人影向他所站立的河邊移動。他們走近之後，就急忙用手電筒在他的臉上掃視了一周，然後驚詫地

說：

「老章，你怎麼獨個兒在這裡欣賞夜景呀，害得我們找了半夜。快隨我們回去吧！」

章希孔一看，原來是徐文中的兩個親信。他們是受命負責暗中監視他的。半天找不見他，自然很着急了。於是，他半帶譏諷地說：

「請轉告徐文中，我章希孔絕不會跳河自殺。」

一個多月的整風會帶來了兩個結果：章希孔由於「一貫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出身反動，政治不純」，不適宜在黨的要害部門工作，

調西大街小學任教師；徐文中由於「立場堅定，鬥志旺盛」，提升為中級人民法庭副庭長。

這天中午，法院裡正在為徐文中開歡送會，一片笑語聲中，夾雜着「五晉魁首，高昇高昇」之類的猜拳聲。突然，前院裡人聲鼎沸，一個農村婦女披散着頭髮，嘴角上掛着血絲，左額骨上紫腫了一大塊。她撲通一聲，坐在法院的大門口的石階上，大哭大喊道：

「院長救命呵，民兵排長宋長興又要打死人了！他勾結他的野女人孫素珍，定計打死了民兵連長王明理，現在又逼着和我離婚，我不答應，他就下毒手打我哇。我並不是不離呀，我是丟不下我的兩個小兒女呀！那孫素珍心腸歹毒得能殺夫哇，我要走了，我那兩個兒女在



孫素珍手裡也就沒有命了哇！院長呀，你要積陰德，救救我和我的孩子的命哇！……」

法院裡邊的人，和街市上來往熱鬧的市民，把法院門口圍得水洩不通。聽見這哭訴的人，都驚愕得咋舌縮脖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陳家油坊附近的人心裡早都明白：宋長興與孫素珍早有姦情，王明理死於站在他身後的民兵排長宋長興的槍彈之下；在油坊裡找到的子彈壳，恰好是宋長興所用的「中正式」就是明證。劉定昌是一個屈打成招的冤死鬼。然而，誰敢站出來說老實話？

這時候，從法院裡走出一個中年男子。他揹着行李，提着裝着漱洗用具的網籃，從人群旁邊走過。他用深情的目光，望了望這驚愕的



議論紛紛的人群，然後，匆匆地向西大街方向走去。他就是才卸掉法院秘書職務，去到西大街小學任教師的章希孔。

四

史無前例的那件事開始了。當時的章希孔，已經在兩年前，被調到安江縣第一中學任初中數學教員了。他是學法律的，本來可以教文學或歷史課，但是，為了避免指桑罵槐，借古諷今的嫌疑，他還是選擇了只和數字打交道的數學課，這樣既可使當局放心，也為自己省去

了麻煩，真可以說是公私兼顧，兩得其便了。只是自從上高中時學過數學之後，至今已二十多年沒有碰過代數、幾何了，還需要多鑽研鑽研才不致誤人子弟。

一個雷雨霏霏的日子，章希孔被安江縣一中「衛東彪」兵團的紅衛兵們抓着衣領，揪到縣武裝部的院子裡，圍在一個圈子中間輪番毆打着。他的衣領被撕下了，帽子被打落在雨水之中，渾身濺滿了泥漿，鼻子在流血，頭髮被抓得零亂不堪。紅衛兵們一邊打着，一邊罵着：

「他媽的，老子就是要造你的反，要造你這個國民黨法官的反。」

「他媽的，你還有什麼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你爲甚麼要躲在幕後幫『東方紅』兵團刻寫傳單來罵我們？」

「他媽的，你這個國民黨法官，就是『東方紅』的黑後台。這就充分暴露了『東方紅』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反動派！」

「他媽的，老子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樣雅緻，那樣溫、良、恭、謙、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就是要把章希孔這樣的國民黨反動派推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讓他們永遠永遠不得翻身！」

「衛東彪」們愈罵愈憤慨，愈打愈起勁，尤其是復述了這一段毛語錄以後，他們像唸了符咒的神漢一樣，愈發瘋狂。特別是當他們提到對立的「東方紅」兵團時，更是咬牙切齒，火冒三丈，恨不得把對方一把掐死。章希孔以他高大的身材，站在人群中間，高出半個頭來。只見他既不申辯，也不呻吟，只是無言地挺

着身子站在那裡任人踢着、打着，像一尊被擊潰的浮雕。負責「制止武鬥」的軍人們，穿着軍裝，若無其事地從旁邊走來走去，誰也沒有去制止這無限制的公開的肆虐。站在遠處瞭望的市民們，看着這個平時總是沉默地、孤獨地從街上匆匆來去的教員被他的學生們毆打着，只是在心底裡歎息。忽然，他們看到一位老祖母伸出頭來，向紅衛兵群中她的孫子喊道：「快回來吃飯呀！」當她的孫子跟着她向家走去的時候，她低聲地對她的孫子罵道：「別造太多的孽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被打者依然無言地站在那裡，打人者都已經臂酸手痛，疲憊不堪了。爲首的看了這種情況，就大叫了一聲：

「走，把他押回學校去，抄他的家。」

「好哇！」衛東彪們歡快地響應着，把章希孔抓過來，推搡着，向安江縣一中走去。

章希孔的房門被打開了。這是一間極窄小的房子，是章希孔的宿舍、辦公室、又兼廚房的。因爲，那時是停課鬧革命，學生們整天在社會上衝、砸、打，學校裡沒有多少人，食堂也就停辦了。章希孔無家可歸，只好支起鍋，自己在屋裡做飯。

屋子裡很簡單，一張木板床，一個寫字桌；被褥和床單都很破舊，被炊烟薰得發黃。籐椅上鋪的椅墊，已經露出了棉花。此外，便全是一疊疊的「文匯報」、「教育半月刊」、「教育通訊」、「教育與研究」、「數學教學」等等的教育刊物。這些報刊，從五十年代他投身教育工作以來，便按月、按年裝釘得整齊齊，依次井然有序地堆放着，佔了這間房的大半空間。在這些報刊旁邊，堆放着這十多年來他寫的教學計劃、教學手冊和批改筆記，同樣是裝釘得非常整齊，保存得非常完整。這些看

來很平凡很陳舊的東西，是章希孔十多年心血的結晶。因爲，這些東西，記載着章希孔十多年來踏實的足跡，說明了他是如何以一個法律工作者的嚴謹態度來從事教育工作的，說明了他是如何熬過許多不眠的夜晚，通過刻苦鑽研，使自己從一個教育工作的門外漢，半路出家，成爲一個精通教學業務的教師的。然而，這一切的一切，竟那樣不值一顧地被人輕率地忽略了。

章希孔被命令站在門外守候着。「衛東彪」們蜂擁而入，把那些報紙、雜誌、筆記本，漫不經心地亂翻一通，然後毫無興趣地扔到門外的雨地裡。他們有時也停下來看一眼那報紙、雜誌上用紅、藍鋼筆劃上的綫綫、圈圈、點點和批語；有時候也驚歎這老傢伙的筆記本上的字跡寫得密密麻麻、整齊齊齊，剛勁而又秀麗。然而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在那裡罵着：

「他媽的，純粹是修正主義的貨色。」

「不，是封、資、修的雜貨店。」

「讓這些發了霉的黑貨見鬼去吧！」那爲首的總結性地罵了一句，然後擦了一根火柴，要把這些東西燒毀。然而，它們已被雨水打濕了。於是，他們又用腳把這些報刊和筆記本踢着、踹着，想要把它們踐踏成泥漿。臨走時，他們打開了這屋裡唯一的一口皮箱。他們爭着、搶着，又把各人大大小小的獵獲物塞滿了隨身背着的挎包，說是要帶回去「審查」。然後，他們懷着勝利的喜悅，呼嘯而去。陰晦的空氣裡，震盪着「衛東彪」們高昂的戰歌——「造反有理」的毛語錄歌：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章希孔的衣服全濕透了，大腦裡嗡嗡作響

，臉上感到在發脹，胸腔和四肢都隱隱作痛。他掙扎着走進屋內，只見床上、地下，滿屋都是亂扔着的書報雜誌，火盆架上安置好的鍋，也被扔在地上，在那裡搖晃着。皮箱裡是他這近二十年辛苦積攢的家當，這次是全部蕩然無存了：一件新做的皮襖不見了，一百二十斤糧票也不見了，三百元的定期存款單、八十元的公債券和一百五十元現款全不翼而飛了。再照照鏡子，臉上浮腫得他已經自己也不認識自己，衣服被撕扯得亂七八糟，被體溫蒸發着濕氣。他身無一文，屋無存糧，馬上就揭不開鍋了。怎麼辦？他想起了遠在八十多里外，鴿子岩下的楊存義老漢，現在只能去投奔他了。



鴿子岩是安江縣最高寒的地方，海拔一千七百多公尺，山頭常年戴着白帽，只有鷹鷂飛得上去；山下的溝溝岔岔裡散居着十多戶人家。在一個半山坡的小土台子上，那裡有一大片蔥郁的翠竹，翠竹叢中，掩映着一排三間茅草房，小地名叫楊家台子。這就是楊存義老漢的家。

七、八年以前，章希孔曾經從學校下放到這裡勞動一年多。那時，正是大躍進前後，安江縣掀起了興修農田水利的高潮。中共城關區委的王書記一馬當先，要跑在全縣最前頭。他從城東門外的玉石灘，沿着玉帶河向南又向東

走了一圈，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從玉石灘開山鑿嶺，攔河築壩，向東開一條橫貫半個縣，流經七十里，灌溉萬畝田的「躍進堰」。計劃一提出，上面贊成，下面響應，齊說這是個了不起的躍進計劃。於是，事不宜遲，立即在北門河壩召開「躍進堰萬人誓師大會」，大會上，王書記帶頭呼口號：

滾上一身泥，磨掉一層皮，
修好躍進堰，保衛毛主席。

章希孔也到南門外沿河走了一圈，和幾位老農民談了一下。回到學校，他急忙向中共安江縣委寫了一封簡短的信，陳述自己對躍進堰的意見。信是這樣寫的：

中共安江縣委劉書記：

開完了躍進堰萬人誓師大會，我——做為一個公民，也同樣是心潮洶湧，熱血沸騰，很想為大躍進的事業流汗、出力。我也到南門外沿河走了一圈，也徵詢了一些老農的意見。我和他們有共同的想法：這個躍進堰費工浩大，有害無利，不宜動工。因為，它是從幾十里長的肥沃水田中穿過，要毀掉上千畝良田，而目前我們全縣總共不過三萬畝水田（全縣二十萬人，人均才有一分五厘水田）。再者，施工沒有經過嚴格的水利測量，據老農們憑經驗目測



，玉帶河床低於堰底許多，河水很難上堰。如果是這樣，豈不要挖一條乾涸之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敢竭誠，陳情如上；如有錯誤，敬請指正。

此致
敬禮！

西大街小學教員 章希孔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

這樣一紙意見書，怎擋得住黨委書記的宏圖大志。於是，水田中劃過了五丈寬的石灰綫，全民總動員，分段挖土。只見水田中留下了一段一段的深坑，可河水却上不了堰渠。於是又一聲令下：現在忙於春耕，暫時下馬，等冬季再戰。冬季以後，又說忙於其他事情，這躍進堰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這件事曾經轟轟烈烈過一時的，也會產生兩個結果，一個結果是這條堰的倡導者——王書記，由於敢想敢幹，被提升為副縣長；另一個結果是，這條堰的反對者——章希孔，由於誣職大躍進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而被批鬥，下放到最艱苦的山區——鴿子岩去當公社社員。

如今，章希孔又經過一天一夜的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來到鴿子岩，來投奔他過去曾經居住過一年多的楊存義老漢的家。楊老漢見他又落了難，就把他安排住下，同時，交給他一頭老牛和兩隻小羊，讓他每天趕上牠們去到後山的樹林邊牧放。

清晨，天才剛蒙蒙亮，章希孔就起床了。他從掛在火塘子上的鐵鼎鍋裡取出幾個煮熟的洋芋果（即馬鈴薯），用一張大菜葉包起來，做為這一天的乾糧；再到屋後的圈裡，給牛、羊套上嘴籠頭，以免牠們走在路上，偷吃禾苗

。然後，就趕上牠們爬過一個高坡，來到一片松柏樹林的前面，那裡有一條小溪流過，小溪兩岸，儘是肥美鮮嫩的青草，足夠他趕的牛羊吃飽。

他本來是嗜書如命，手不釋卷的人，如今來到這樣一個幽靜的環境，實在是讀書的好地方。然而，他絕不願再沾染書本了。他認為，這麼多年，他所遭受的種種折磨，都是書本給他帶來的，都是那些書本知識，那些道德觀念，驅使他去想別人所未想，說別人所不說，以致於屢遭貶謫，落得個僅以身免。因此，他要摒絕一切知識文化，把口袋裡剩下的唯一的財產——一支用了二十多年的金筆也用石頭砸了個粉碎，扔在了荒野。

他結識了一個放牛的好伙伴，傻子老么。老么是個亞吧，據說已經五十多歲，但看那不見皺紋的額頭，人們都說他不過三十歲。他從來不知道發愁，見了人只是傻笑。他常年穿一套毛藍布的褲衫，腳蹬一雙用汽車廢輪胎切下來的橡膠做成的涼鞋，下雨或下雪天，背上再披一個棕製的背搭，腳上包一層棕葉，就可以趕牛羊上坡了。他整天只會說一句：「洋芋果」。當你從他家門前經過，或者看見他趕上牛羊出門，就可以聽見他嘴裡不住地嚷道：「洋芋果呵，洋芋果。」一邊嚷，一邊樂呵呵地笑，彷彿他已吃飽了洋芋果，或者將要得到大堆大堆的洋芋果。至於他家裡的哥哥、嫂嫂以及侄兒女們究竟給他吃了些什麼，沒有人去研究過，無從知悉。

章希孔住得離老么家不遠。早晨當老么的嫂子看見章希孔趕着牛出動了，就去急忙喚醒老么，讓他也緊跟上去。到了草地上，章希孔看着老么笑呵呵，他也笑呵呵；聽着老么喊「洋芋果」，他也學着喊「洋芋果」，於是幽靜

的山谷裡，只聽見兩個傻子在傻聲傻氣地喊「洋芋果」，把那淙淙的流水聲和啾啾的鳥叫都蓋過了。在這樣的時刻，章希孔和傻子老么，除了保持着對洋芋果的本能的需求之外，已經和這終年不化的積雪，和這四季長青的松柏，和這綠草如茵的草地，和這淙淙流過的溪水，和這嚼嚼青草的牛羊，混為一體了。

然而，好景不長。一年以後，安江縣革命委員會成立了。它的第一號通令就是：所有逃跑到外的牛鬼蛇神，必須立即返回原來的機關、學校，參加鬥、批、改。於是，章希孔又回到了安江縣一中，又被當作牛鬼蛇神揪出來批鬥、審查。其實，他的一切情況，在他的檔案中早已一清二楚的了。只是有一個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他一九四八年在北京法院當法官，解放後，算不算起義人員？如果是，就可以留下來工作，如果不是，就應該開除法辦。有人說，傅作義是軍人，他只能帶領軍隊起義；有人說，當時是宣佈政軍人員一齊起義，法院人員應在起義之列。這兩種意見一直爭論了五、六年，章希孔也就當了五、六年的牛鬼蛇神，每天在學校廚房裡擔水——用一條井繩，把水桶繫着，放進三丈深的水井裡，熟練地撬動幾下，讓水桶沉到井水下面，然後把水提上來，挑到廚房外面的一個大木桶裡，供人們使用。他堅持着、忍受着，讓粗糙的井繩和扁擔，把手掌和肩膀磨紅、磨腫、磨破，磨成一層層死肉，結成一塊塊老繭，他仍然咬着牙挑呀挑，三十挑，五十挑，把大木桶挑得滿滿的；然後，在夜裡，拖着沉重的身軀，回到那窄小的房子裡，一倒頭就睡得死死地，一直睡到天亮。

然而，社會上的一種輿論終於傳到了當局的耳朵裡：讓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去挑水，

未免太浪費人材；何況，審來審去，又沒有發現什麼新問題。而且，章希孔的檔案裡，從二十年前第一張表格起，就明明白白填着「起義人員」四個字，只是眼下有些人拒不承認而已。為了轉圜起見，章希孔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去幫助修建。因為，原來的文化館太窄小，已不敷使用。現在要在北門外的廣場上，另建一座新的樓房。

章希孔就搬到了修建工地的一個工棚裡住下來。他的工作是保管材料。每天，人們把木頭、板子、沙子、石灰等建築材料買來以後，就由他驗收，然後簽字、付錢。這些材料都堆放在工地周圍，用鐵絲網圍起來。晚上，他還需要起來三、五次，到周圍巡視，以防材料丟失。尤其是木頭、木板之類，是最緊缺的國家統購物資，需要經過縣計劃委員會批准才能買到。

這時，章希孔又聽到消息說，等文化館大樓建成以後，他將會留在這裡做考古工作。他想着，安江縣是個地處西陲的縣份，過去可能是羌族居住的地方，鷓子岩一帶的深山地區，人民的風俗、服飾、民歌，都有許多可資考證的遺跡。這裡又是出蜀入秦的必經之地，有諸葛亮檢閱兵馬的教場，有趙子龍駐守過的山寨，有蘇東坡寫就的石碑。更古一些，還有大禹治水留下的蝌蚪文字。他想，理首在故紙堆中，整天與古人為伍，皓首窮經，兀兀窮年，遠離塵世，了此餘生。想到這裡，他不禁有柳暗花明之感。於是，在他所住的工棚裡，有時會傳來一些笑語聲——那是鷓子岩一帶的中學生，到縣城來上學，和他擠住在一起。他們都很窮，章希孔就用他的工資，買些糧食和蔬菜，與他們帶來的洋芋果煮在一起，湊和着過活，反正他們已經是多年的患難朋友了。

一個漆黑的夜晚，兩點鐘過後，章希孔第三次起床到工地周圍巡邏。他放輕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諦聽着，搜索着周圍的動靜。突然，他聽到在木匠做工的地方附近，有窸窣窸窣的聲音。他輕輕地走近，只見在黑暗中，有兩個人正在把兩塊木板捆扎好，悄聲商量着。那聲音正是文化館的同事李小軍的聲音，只聽得他說：

「姊夫，這兩塊板是我白天就看準了的，是你做衣櫃的好材料，比上次爲我抬走的那兩塊好多了。」

「別囉嗦了，趕快抬上走吧，那老傢伙一晚上要起來三四次，別讓他碰上了。」說這話的，到底機警得多，不愧是公安局的偵訊股長。

章希孔本來想息事寧人，假裝沒遇見這樁事，悄悄回屋去睡覺，反正偷的是公家的木材，不是我姓章的，我又何苦來？然而，一種惱怒使他改變了主意。他想着，這種人，白天在正經八百地偵察別人，審訊別人，晚上，又出來偷竊，這種僞善者的嘴臉，實在比真正的小偷還令人氣憤。讓這種人去辦案，只能是製造冤、假、錯案，不能猶豫，一定要抓住他，揭露他。他一個箭步，奔上前去，用兩隻手，抓住兩個人的衣領，不料被他們掙脫了。他們把章希孔推倒在地，趁勢跑掉了。章希孔手裡僅抓着一塊被撕下來的衣領。

第二天，在劉館長的辦公室裡，李小軍承認了昨天夜裡夥同他的姊夫魏建明企圖偷走兩塊木板的事，並且寫了一份書面檢討，保證永不再犯。

一年以後的一個夏天，在打擊刑事犯罪的運動中，章希孔突然被捕了，罪名是「竊盜學生，摧殘青少年健康」。仍是在北門外的河灘

上，搭起了主席台，召開「萬人宣判大會」。章希孔被押在「囚車」上，胸前掛着「反革命竊盜犯章希孔」的大牌子。他的頭髮已被剃光。在烈日的曝曬下，他顯得面目黧黑，形容憔悴，耷拉着腦袋，低垂着眼睛，望着眼前的地面。

五

又一個炎熱的夏天來臨了。在安江縣監獄的會客室裡，佇立着一個中年婦女。她長着一副高高的略嫌瘦削的身材，白皙的面龐，尖尖的下巴，操着濃重的河南口音。她名叫章俊閣，是章希孔的胞妹，是專程從河南老家來探望章希孔的。她來到安江縣已經五、六天了。在她下榻的客棧裡，她會見了許多章希孔的同事、朋友和學生，他們都衆口一詞地說，章希孔坐牢純屬冤枉。他們說，這十多年，他一直過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從來沒聽說有過任何不規矩的行爲。何況這些年來，他又一直在受審查，整天憂心忡忡，哪有與緞去幹那些越禮的事。尤其是那幾個與章希孔同住的鄉下學生，更是悔愧交集，泣不成聲。鷓子岩的老農馮存義的兒子馮茂生邊哭邊說：

「我對不起章老師，我寫了假證明。章老師供我們住，供我們吃，我們還害他，我們真不是人。這是公安局的魏股長逼得太緊。他把我們這幾個人騙到看守所裡關起來，詐我們，說是別人都證明了有這件事，你不證明，就不准你出去。那看守所裡，又餓、又髒、又要挨打，實在受不了了，只好照他說的寫。……」

這四、五個學生都說，他們已經寫好了材料，證明當初寫的材料是虛假的，他們願意和那位魏股長對質。

章俊閣站在離牆一公尺的欄杆前凝望着牆上那個一尺見方的方洞，犯人就站在方洞裡面和親屬相見。章希孔的面孔出現了。他沒有料到他的妹妹會來探望他。因爲，他在家信中，一再地回絕了章俊閣要來探望他的請求。當他的胞妹出現在他的面前的時候，他先是有些愠怒，繼而滴下了幾滴傷心的淚水。他想着，從抗戰時離家，到現在三十年了，想不到咱兄妹竟在監獄裡相見。然而，一剎那過去，他又鎮靜了下來，急忙背過身去，揩乾了眼淚，轉過身來，強作微笑，向章俊閣問道：

「俺娘好嗎？」

這時候，章俊閣已經哭得蹲下了身子，用雙手捂着滿臉的淚水，而那淚水已經打濕了她的手帕。

「俺娘料到她這一生大概沒有希望見到您了，她也就先去了……」章俊閣說到這裡，更是無法抑制地失聲痛哭起來。章希孔聽到這個消息以後，連聲說：

「我罪該萬死，罪該萬死！」邊說邊頓着腳，啜泣着。

章俊閣帶着埋怨的口氣問道：

「這三十年，你一次家也不回。我就不明白，抗戰勝利的時候，你爲啥沒回來？」

「那時，我剛從重慶中央大學畢業，參加了較場口事件，又在新華日報上寫過稿，軍統的人在抓我，我只好搭船先逃到東北，又逃到北京……解放後，父親和弟弟又接連出了事，這樣的家，你讓我怎樣回？」章希孔低聲地回答着，表現出無限的歉疚。

「在老家也不好受。俺解放後，師範畢業教小學，你妹夫當區長。就因爲俺家的牽連，五八年俺倆都被打成了右派；去年落實政策，俺倆都改正了，俺還教書，你妹夫在區上的商

店當經理。只是我近年也患了一身的病。」說着，不禁又咳嗽了一陣。

章俊閣看了看時間，大概會見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了，於是，就強打起精神，向章希孔說：

「現在，外面到處都在落實政策。你的事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嘛？你究竟有那些事情沒有嘛？你是怎樣打算的嘛？」

章希孔又是默不作聲了。章俊閣見此情狀，又焦慮地向四周看看，深恐說了不准說的話，讓看守聽見了：

「在外面，你的朋友和學生都很關心你，愛護你。他們都說你是個好人。尤其是馮存義

的兒子和他的幾個同學，都證明你是無辜的。現在就看看你自己願不願申訴了……」說着，她凝望着她的哥哥，希望能得到肯定的答覆。

稍停了一會兒，章希孔開口了，他說：

「我甚麼事都有的。我甚麼時候也沒有申訴過。從整風、肅反、反右、到文革，他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認，我從來沒有向誰申訴過。我是冤死也不申辯的。這次也是一樣！」

章俊閣聽了他這一番嚴峻的表述，心裡涼了大半兒。她用乞求的語氣向他說：

「我求求您，還是申訴一下吧。父母親的墳您還沒有去燒過一次紙，俺嫂子守了二十年的活寡，您也沒有去看過她一次。您出去了，

回到老家，咱們住在一起，就是吃糠醃菜，也是舒暢的。」

「俊閣，請你不要強人所難好不好？死去的父母，活着的妻子，我都欠了他們一生一世的債，今生已過矣，再結來生緣。我決計今生今世，不再走出這個鐵門了。咱家是唸佛的，我要用我的生命，來實現佛家的一句口頭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俊閣，請轉告你的嫂子，你們都保重吧！」

探監的時間已經完畢，章希孔投給他妹妹深情的一瞥，然後轉過身去，大踏步地向監獄內院深處走去。

● 文藝園地 ●

佳文應共賞

中國之春編輯部：

副刊作家哈公在其專欄有一篇傑作，特剪報附呈參閱，我認為這種事實有必要讓中國留學生大家知道，是否可在中春再刊一次？作為讀者投書也好，作為廣告也好，祇要能在中春披露，我願付廣告費用。

沒有其他目的，但求好文章與祖國好青年共賞。

晨全中於夏威夷

據說，雷鋒同志的幽靈跟胡世英街內碰上了。

雷鋒馬上大喊口號：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胡世英跟著也振臂高呼：

三不怕貪汙，四不怕強姦！

雷鋒打個楞，翻看「毛主席語錄」，但從頭到尾，毛主席沒有說過「三不怕貪汙，四不怕強姦」的話。

胡世英冷冷地說：你那本「毛主席語錄」是「去年日曆」了，你只知道「四人幫」，我們現在是搞「四個現代化」。

雷鋒趕快請教：「四個現代化」我的確不懂。

不過，「三不怕貪汙，四不怕強姦」到底是誰的話錄？

胡世英哈哈大笑：我們現在不搞「個人獨裁」，只搞「集體領

再死一次



導」，「三不怕貪汙，四不怕強姦」是集體的智慧創造的，你叫它「資產階級自由化語錄」行了。

雷鋒：你們現在不是大張旗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嗎？

胡世英：反對當然要反對啦，不過給我們反掉的都是倒楣蛋，甚麼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之類，怎麼也反對不到我們「衙內階級」頭上來的。

「衙內」也成為「階級」？

請問閣下是那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衙內」？

胡世英冷笑道說：我就是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同志的衙內，我貪汙一千多萬人民幣；強姦幾十個婦女，阿胡叫法官審我，我爸爸就去旁聽，嚇得那個法官屁滾尿流，馬上宣判我無罪釋放！雷鋒一聽，突然暈倒——再死一次！

捐款九仟，獎勵留學生提供通訊錄

並免費訂閱中國之春

我們是東南亞的一對華僑兄弟。雖身在海外，但心向祖國，日夜盼望祖國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

最近國內蓬勃興起的學生運動，給了我們新的鼓舞，新的希望。我們看到，在民運中，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們（如方勵之、楊巍）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兄弟倆決定定期捐助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使之在傳播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觀念方面更上層樓。我們還決定首批捐出美金九千圓，供五百名大陸公費留學生免費訂閱中國之春雜誌。

按中國之春編輯部的意見，我請每位要求免費訂閱的留學生，在信中向中國之春編輯部提供至少一名外校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通訊錄，以便使自由民主的聲音到達每個學校。

東南亞華僑

葉世明
葉世昌

一九八七年三月

本刊徵求

報導稿·短評稿·理論稿

本刊已成為大陸留學生中流傳最廣的雜誌。然而，留學生們反映，本刊尚有很多值得改進之處：

一、報導稿較少，泛泛評論稿太多；談之乏味；

二、針砭時弊、一事一議的短評稿較缺；

三、理論性、學術性文章仍需要，但要加強深度和說理性，切忌空泛議論。

因此，本刊特徵求：

一、報導稿（以報導國內及留學生的人和事為主）；

二、活潑辛辣的短評稿；

三、有深度的理論性文章；

四、建議性文章；

五、國內文藝刊物上的好作品，以便本刊轉載。另，本刊正籌組如下專題，請大家撰稿：

▲如何打破「革命—專制—革命」的惡性循環；

▲中國駐外人員（包括外交官員）的待遇問題；

▲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模式設計；

▲鄧小平之後的中國政局探討。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歡迎您加入民運的行列！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
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46 號信箱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P.O.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洲雪梨聯絡站：

P.O. Box 404 Marrickville
Sydney, N.S.W. 2204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ee
Cedex 2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9505
4800 Bielefeld 1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 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A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1827 Haight St. Box 100
S.F., CA 94117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24654
Los Angeles, CA 9002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9453 Cloverdale Ct.
Burke, VA 22015

美國休士頓聯絡站：

P.O. Box 42821 No. 806
Houston, TX 77062

美國夏威夷聯絡站：

P.O. Box 8263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266 Commonwealth Dr.
Lexington, KY 40503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聯絡站：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 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亞利桑那州聯絡站：

P.O. Box 42561
Sun Station
Tucson, AZ 85733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中國民聯已在非洲、中南美洲、東南亞諸國建立了聯絡站，聯絡暫經總部。

■中國民聯已在廣州、上海、北京、南京、長沙、重慶、沈陽、山東、江西、河北、貴州和雲南等地建立了國內組織。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 46 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 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 3-7710410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8.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